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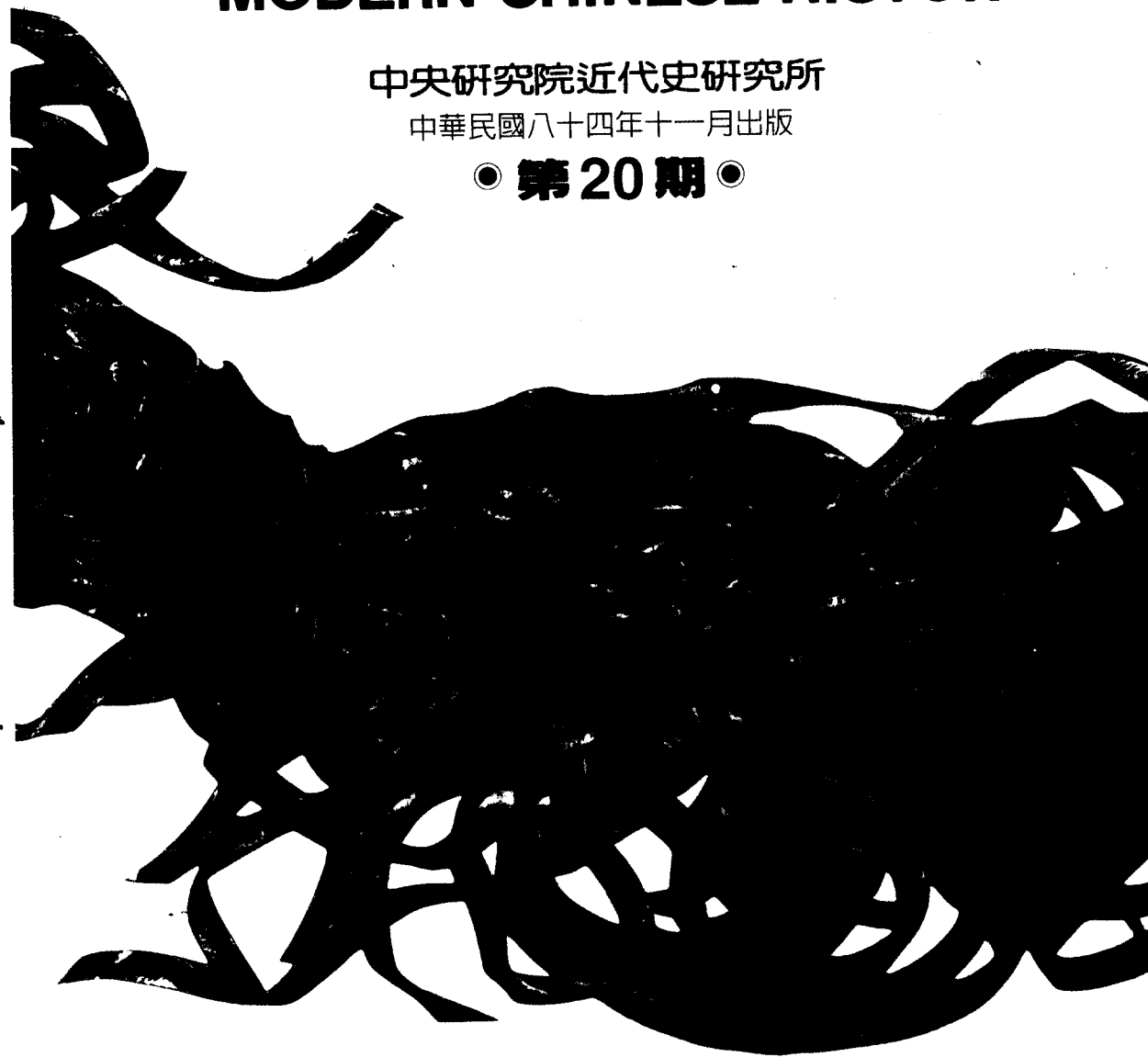
#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

NEWSLETTER FOR  
MODERN CHINESE HISTORY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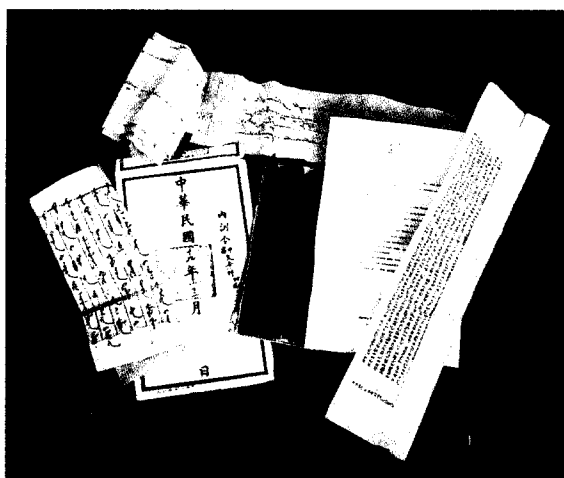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十一月出版

● 第 20 期 ●



# 漢蓮初地

▲ 乾隆皇帝題寫的匾文（西藏自治區檔案館藏）



◀ 不同文種檔案（西藏自治區檔案館藏）

▼ 民國檔案（西藏自治區檔案館藏）

▼ 366.6米藏文特長檔案  
（西藏自治區檔案館藏）



國民政府冊文

雪山肇迹作獅吼於三空若水誕靈與鷲  
拳為一教蓮類喇嘛護持正教頌戴中華  
薄化烏斯宏教象教宜追贈護國弘化普  
慈圓覺大師封號於嚴德音漸被共伊克  
昭廟以常新法統綿延並阿耨連山而永  
峙式頒冊命用示榮褒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二月十二日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 目錄 第二十期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九月出版

---

<b>學術會議</b>	慶祝抗戰勝利五十週年兩岸學術研討會 .....	楊維真	3
	海峽兩岸「傳統社會與當代中國社會史」		
	學術研討會評述 .....	定宜莊、許檀	12
	「求變求新的中國——二十世紀前半期的歷史經驗」		
	學術討論會 .....	葉文心	18

---

<b>學人簡介</b>	野澤 豊 .....	金丸裕一、弁納才一	23
-------------	------------	-----------	----

---

<b>研究概況</b>	引進・借鑒・變化——80年代以來		
	中國大陸近現代史學鳥瞰 .....	羅福惠、田彤	32
	大陸的中國近代教育史研究述評 .....	劉海峰	48

---

<b>史料介紹</b>	中研院近史所院史資料室簡介 .....	李慧玲	53
	四川及廣東省市檔案館簡介 .....	楊翠華	56
	西藏自治區檔案館館藏檔案資料述略 .....	卓 嘎	59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現藏國軍檔案概況 .....	陳天民	65
	〈林獻堂先生日記〉的史料價值 .....	許雪姬	79

---

<b>問題與討論</b>	「公共空間」及「公民社會」——		
	北美中國社會史的辯論 .....	陳永明	90
	對民初中美科技交流的兩種詮釋 .....	郭文華	98
	典範的危機與危機的典範：		
	黃宗智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		
	的綜合評述評論座談會紀錄 .....	陳南之紀錄整理	109

---

156

---

新書評介	楊珍著：《康熙皇帝一家》 .....	賴惠敏	125
	Chae-Jin Lee: <i>Zhou Enlai: The Early Years</i> .....	傅葆石	129
	呂芳上著：《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 .....	周昌龍	132
	Poshek Fu: <i>Passivity, Re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 Intellectual Choices in Occupied Shanghai, 1937-1945</i> .....	王克文	137
	熊秉真著：《幼幼：傳統中國的襁褓之道》 .....	劉仲冬	140

---

大事紀要	近代中國史研究大事紀要（1994年5月～1995年9月） .....	陳南之輯	146
------	------------------------------------	------	-----

---

封面設計：黃憲鐘

□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編輯委員會 □

主任委員 陳三井

編輯委員 王爾敏 陶英惠 黃福慶 熊秉真

楊翠華 羅久蓉

執行編輯 羅久蓉

助理編輯 陳南之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 半年刊 第二十期

編輯者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編輯委員會

發行者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華民國台北市南港區

郵撥帳號1034172-5

印刷者 日創社文化設計印刷有限公司(02)7402155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九月出版

定價 新台幣200元

## 學術會議

# 慶祝抗戰勝利五十週年兩岸學術研討會

楊維真\*

對日抗戰是中華民族史無前例的一次自衛戰爭，其影響深刻而廣遠，其歷史價值更非任何一次對外戰爭所可比擬。當抗戰勝利之際，位於雲南昆明的西南聯合大學曾由該校文學院院長馮友蘭撰文、中國文學系教授聞一多篆額，建立「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以誌當日之盛。碑文中說道：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九月九日，我國家受日本之降於南京，上距二十六年七月七日盧溝橋之變為時八年，再上距二十年九月十八日瀋陽之變為時十四年，再上距清甲午之役為時五十一年。舉凡五十年間日本所鯨吞蠶食於我國家者，至是悉備圖籍獻還，全勝之局，秦漢以來所未有也。

旨哉斯言。正因為抗日戰爭影響深遠、意義重大，故而自史學前輩梁敬錚、吳相湘等教授以降，國內陸續有學者投入抗戰史的研究領域；然因客觀條件的限制及史料未盡公開，研究成果僅能算是差強人意。

自1980年代以還，抗戰史研究開始有了新的進展；其原因一方面來自國內學術機構典藏檔案資料的開放與出版，另一方面則是受到大陸學界的刺激。就前者而言，近年來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下簡稱「黨史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國史館及國防部史政局等機構紛紛將其典藏資料公開出版，嘉惠學界甚多；尤其黨史會所出版的《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叢書係就總統府《大溪檔

---

\* 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

案》選編而成，最為珍貴，書成之後曾帶動國內抗戰史研究的風氣，新的研究成果相繼出現。就後者而言，隨著晚近中共開放部份史料，大陸史學界對於抗戰史的研究進入新的階段；除了出版大量的史料檔案外，更難得的是，若干著作已能突破過去的意識框架，如《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一書即較持平地論述國民政府對抗戰的貢獻，故而近日大陸學界的研究成果頗有推陳出新之處。

今年（1995年）是〈馬關條約〉簽訂一百週年，也是抗戰勝利五十週年，格外具有歷史意義；大陸、美國及香港華人學界紛紛為此召開學術會議。甫於去年成立的中國近代史學會有鑒於此，為慶祝抗戰勝利五十週年，同時亦思藉此促進海峽兩岸有關抗日戰爭史學術研究成果之交流，乃與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政治大學歷史系所、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等單位合作，廣邀兩岸學者，在台北舉辦「慶祝抗戰勝利五十週年兩岸學術研討會」，重新探討戰時之政治、軍事、外交、經濟與社會等各項問題。會議於1995年9月1日至3日假台北中央研究院學術活動中心舉行三天，應邀出席本次研討會的兩岸學者共計一百七十餘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本次研討會有31位大陸學者與會，這是此類研討會所空前未有的；兩岸學者齊聚一堂，益增此次會議之精彩性。

大會於9月1日上午，在中國近代史學會理事長、中央研究院院士張玉法教授主持下舉行開幕典禮。開幕後，隨即由兩岸知名學者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蔣永敬教授及華中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章開沅教授發表專題演講。蔣永敬教授的講題是〈從「團結禦侮」到「共赴國難」〉，略述中國從1931年提出「團結禦侮」，到1937年「共赴國難」的實現，其間變化與進展的過程。章開沅教授則以〈尊重歷史，超越歷史〉為題，呼籲與會學者正視日本侵華這一史實，不要受陳舊歷史眼光的侷限，更不要因襲過去的歷史偏見，務須喚起民眾以消弭戰爭根源。專題演講結束後，正式進入會議的重頭戲——論文發表與評論。此次會議共提出論文59篇，由於篇數太多，主辦單位乃分成A、B兩組同時進行，主講人及題目依次如下：

#### A組

李雲漢：抗戰期間的黨政關係（1937~1945）

楊天石：九一八事變後的蔣介石——讀蔣介石《日記類抄》

- 章開沅：讓事實講話——貝德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殺  
熊宗仁：國民政府準備抗戰之策略與何應欽——對「親日派」之我見  
蔡德金：抗戰時期汪精衛的「和平主義」  
石源華：論日本對華新政策下的日汪關係  
陳謙平：宋子文訪英與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的中英關係  
陳立文：從東北接收看中蘇友好同盟條約  
李朝津：抗戰時期中國對聯合國成立的態度  
周惠民：德國軍事顧問撤出中國始末  
王綱箴：從史迪威文件日記看史迪威事件  
傅寶真：從李曼與史迪威事件看軍事顧問在戰時盟邦所引起的爭議之比較分析  
楊光彥：抗戰時期日機空襲重慶和重慶反空襲鬥爭述論  
胡春惠：對中日桂南會戰的評價與反思  
張同新：忻口戰役評析  
劉鳳翰：抗戰期間台灣日軍活動  
樓子芳：論抗戰時期的台灣義勇總隊  
傅應川：抗戰時期中共軍事發展及其策略之研究（民國26.7~34.8）  
蔣永敬：論中共抗日統戰初期的「抗日反蔣」方針  
楊奎松：抗戰前夕陳立夫赴蘇秘密使命失敗及原因  
林能士：國民黨內派系之爭與國共商談——以《王世杰日記》為中心的探討  
張玉法：抗戰時期的魯蘇戰區  
金普森：論浙江省區的抗戰  
陳三井：抗戰初期上海對變局的肆應  
申曉雲：抗戰時期新桂系治皖  
楊維真：抗戰時期雲南與中央關係的演變——從合作到決裂  
王學莊：抗日戰爭和邊疆民族  
呂士朋：抗戰時期的社會動員  
王檉林：抗日戰爭時期中國人論中國的復興  
呂實強：試論抗戰期間的四川精神

## B 組

- 李吉奎：第一次近衛聲明之發表及其作用  
陳鵬仁：近衛文麿與中日戰爭  
邵銘煌：孔祥熙與抗戰初期的謀和試探  
張憲文：抗日戰爭時期中國高等教育評析  
馬 敏：抗戰期間教會大學的西遷——以華中大學和湘雅醫學院為例  
林桶法：戰後國民政府高等教育復員的困境  
何長鳳：抗戰時期的貴陽交通書局  
侯坤宏：由緝私到暴動：民國三十三年四川江油縣中壩鎮「三二八」事件  
查時傑：抗戰勝利後基督教會的再起（1945-1949）

- 張力：足食與足兵：戰時陝西省的軍事動員  
 韓信夫：第一戰區豫北游擊區——兼論國民黨抗日游擊戰場  
 鄭梓：〔光復元年〕台灣軍事圖像之一——戰後台灣的軍事受降、遣返與復員  
 馬振犢：德國軍火與中國抗日戰爭  
 鄭會欣：從南鎮、敘昆鐵路的談判與修築看抗戰初期的中法經濟合作  
 陳紅民：抗日戰爭時期的驛運事業  
 謝放：抗戰時期四川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  
 何一民：抗戰時期西南的經濟發展與人口變動  
 馮祖貽：抗戰期間內遷人口對西南社會經濟的影響  
 周啓乾：九一八後日本「開發」華北經濟及其實質  
 黃美真：華中振興公司：抗日時期日本控制華中淪陷區產業的壟斷機構  
 陳鐵健：抗日戰爭時期日偽在華中華南的金融統制  
 董長芝：日本帝國主義對東北工礦業的掠奪及其後果  
 霍遼原：日本在中國東北淪陷區實行的民族統治政策  
 解學詩：東北淪陷區鼠疫流行與日軍細菌謀略  
 呂偉俊：山東淪陷區研究  
 陳勝焄：論日軍侵粵對廣東經濟之影響  
 陳木杉：試論抗戰時期汪偽政權控制下的廣東省  
 吳天威：中國對日索賠之過去與財產損失問題之商榷  
 遲景德：從抗戰損失調查到日本戰敗賠償

在這59篇論文中，32篇為大陸學者所提出，一篇來自於美國，另一篇來自香港，其餘25篇為國內學者的研究成果。這些論文雖未能完全涵括與抗戰相關的所有領域，但卻已觸及了不少面向。除了向為學者所重視的戰時政治、軍事、經濟、外交、教育文化等問題外，還擴及到傀儡政權及淪陷區、戰後接收與復員、抗戰損失及對日索賠等重要課題。謹將各文要旨依序介紹如下：

A組方面，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主任委員李雲漢教授在〈抗戰期間的黨政關係（1937-1945）〉一文中，認為戰時國民黨與政府之間的關係可分三級。在中央是以黨統政，十分徹底；在省級是黨政聯繫，略有阻梗；縣級則採融黨於政，功能未彰。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楊天石教授在〈九一八事變後的蔣介石——讀蔣介石《日記類抄》〉一文中，根據蔣介石未刊日記闡述九一八事變後蔣的思想與作為，藉以彰顯一個有血有肉、個性強烈的蔣介石。華中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章開沅教授撰述〈讓事實講話——貝德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殺〉一文，係運用美國耶魯大學所藏親睹南京大屠殺之前金陵大學教授貝德士（Bates）



所留文獻，揭露日軍屠殺之罪行。貝德士係章教授就讀金陵大學之業師，章教授娓娓道來，更見感情。

貴州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熊宗仁教授在〈國民政府準備抗戰之策略與何應欽——對「親日派」之我見〉一文中指出，在近代史上所謂「親日派」的定義從未界定，何應欽不是「親日派」，只是國民政府執行「安內攘外」的一個工具；而國府內部並未出現「親英美派」與「親日派」的對立。北京師範大學法政所蔡德金教授廣續其對汪政權的研究，撰有〈抗戰時期汪精衛的「和平主義」〉一文，指稱汪氏鼓吹和平主義、走上叛國之路，實因個人權力慾過度膨脹、錯估抗戰前途和國際形勢，以及對日本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所致。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石源華教授亦以汪政權為中心，撰寫〈論日本對華新政策下的日汪關係〉，說明在1942、1943年之交，汪政權與日本間的相互關係曾有所調整。日本交還華租界及撤廢治外法權，然口惠而實不至；汪政府藉此統一華北、華中、華南各淪陷區，但亦無法改變其「可恥的」歷史評價。

南京大學歷史研究所陳謙平教授在〈宋子文訪英與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的中英關係〉一文中說道，1943年宋子文訪英是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英矛盾加深、關係惡化的情況下成行的。此行雖未消弭中英所有爭議，然維持中英合作關係此一主要目的已經達到，故宋子文訪英仍有其積極意義。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陳立文教授在〈從東北接收看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一文中，以春秋責備賢者之心，重新檢討中國政府在東北接收的交涉過程中所犯的錯誤，以為未來之借鏡。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李朝津教授以〈抗戰時期中國對聯合國成立的態度〉為題，探討中國近代對外關係中，理想主義及現實主義所扮演的角色。李教授認為隨中國對聯合國的期望不斷高漲，理想主義在中國外交決策中已佔有主導地位。

政治大學歷史系周惠民教授在其論文〈德國軍事顧問撤出中國始末〉中，從中、德、日三國不同的外交角度，探討德國停止對華銷售軍火及撤出在華軍事顧問的經過及其影響。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王綱領教授則撰有〈從史迪威文件日記看史迪威事件〉一文，認為1944年所發生的「史迪威事件」，中方雖佔了上風，但卻招致美國朝野非議，是為後來國共內戰國民黨失敗原因之一。彰化師範大學傅寶真教授在〈從李曼與史迪威事件看軍事顧問在戰時盟邦所引起的爭議之比較分析〉一文中，透過對一次大戰德國派至土耳其協助指揮作戰的李曼將軍與二次大

戰美籍駐華軍事將領史迪威的比較研究，說明外籍軍事顧問與駐在國領袖發生摩擦的癥結，主要是價值觀念與看法的問題。

西南師範大學歷史系楊光彥教授撰述〈抗戰時期日機空襲重慶和重慶反空襲鬥爭述論〉專文，探討日機轟炸下的重慶軍民如何展開反空襲鬥爭，以及其所取得的成就。政治大學歷史系胡春惠教授在〈對中日桂南會戰的評價與反思〉一文中，從較寬廣的視角觀察、反思此次桂南會戰之草率性，認為這是一場應避戰而不避戰的粗糙之作。中國人民大學黨史系張同新教授以〈忻口戰役評析〉為題，說明忻口戰役是抗戰以來，國共兩黨軍隊在統一的編制下，第一次攜手作戰，它所取得的經驗教訓，為以後的抗戰提供了借鑒。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劉鳳翰教授在〈抗戰期間台灣日軍活動〉一文中，歷歷詳述駐台日本軍隊的沿革及其活動。杭州大學歷史系樓子芳教授撰有〈論抗戰時期的台灣義勇總隊〉一文，說明台籍志士李友邦及其組織的台灣義勇總隊的抗日活動情形。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傅應川局長則在〈抗戰時期中共軍事發展及其策略之研究（民國26.7—34.8）〉一文中，以戰略學角度觀察戰時中共軍事發展，認為中共始終將黨的利益置於國家民族利益之上，殊屬不當。

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蔣永敬教授在〈論中共抗日統戰初期的「抗日反蔣」方針〉一文中指出，中共在1935年8月〈八一宣言〉提出「抗日反蔣」口號，係為結合國民黨地方實力派，以孤立蔣介石和分化國民黨。及至兩廣事變和平解決，中共見「抗日反蔣」難以為繼，乃一變而為「逼蔣抗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楊奎松教授在其論文〈抗戰前夕陳立夫赴蘇秘密使命失敗及原因〉中指出，1935年底至1936年初，中蘇之間曾有簽訂軍事互助條約的重要外交機會，陳立夫即膺此使命赴蘇。然因蔣介石決心自行解決共產黨問題，而錯失此一機會。政治大學歷史系林能士教授撰述〈國民黨內派系之爭與國共商談——以《王世杰日記》為中心的探討〉專文，從《王世杰日記》的記載中，論述國民黨內政學系及CC系因權力爭鬥，影響國共商談的情形。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張玉法教授撰寫〈抗戰時期的魯蘇戰區〉一文，詳論戰時魯蘇戰區國軍、共軍、日偽軍彼此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杭州大學人文學院金普森教授在〈論浙江省區的抗戰〉一文中，說明戰時浙江軍民對抗戰的重大貢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陳三井教

授以〈抗戰初期上海對變局的肆應〉為題，指稱上海在抗戰歷史的重要地位係來自三方面：八一三淞滬戰役、經濟力量和人力資源，以及群眾動員的良好表現。

南京大學歷史研究所申曉雲教授在〈抗戰時期新桂系治皖〉一文中，認為李宗仁、廖磊、李品仙等新桂系領袖戰時在安徽的治理十分成功。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楊維真所撰〈抗戰時期雲南與中央關係的演變——從合作到決裂〉，係以雲南為例，說明其與中央關係以合作始，以決裂終。由於國民政府始終無法真正融合地方，益增其對抗外敵之困難。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王學莊教授則以〈抗日戰爭和邊疆民族〉為題，論述各民族對抗日戰爭的貢獻。

東海大學歷史系呂士朋教授在〈抗戰時期的社會動員〉中，略述各階層人士奮起參加民族聖戰的情形。其中農民境遇最為艱苦，這是戰後國府失敗的主因；而婦女因投入生產，地位顯有提高。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王檜林教授撰有〈抗日戰爭時期中國人論中國的復興〉專文，說明戰時國人對於中國復興的看法與言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呂實強教授在〈試論抗戰期間的四川精神〉一文中指出，重慶精神內涵不清，宜改稱四川精神；而此精神不限四川，實為全國共有。

在B組方面，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李吉奎教授發表〈第一次近衛聲明之發表及其作用〉一文，認為近衛聲明收效甚微。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陳鵬仁教授在〈近衛文應與中日戰爭〉一文中指出，近衛對處理中日戰爭及防止對美作戰都束手無策，致使日本走上國破家亡的道路，實乃一悲劇性人物。專研汪政權的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邵銘煌則撰寫〈孔祥熙與抗戰初期的謀和試探〉一文，說明孔祥熙以行政院長之尊，秘密進行謀和的經過。孔在謀和期間，一方面時時請示蔣介石，另一方面不求躁進，致使日方計略未能得逞。

南京大學歷史研究所張憲文教授在〈抗日戰爭時期中國高等教育評析〉一文中指出，抗戰初期高等學校的西遷，對後方高等教育的發展及經濟的開發貢獻良多。華中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馬敏教授發表〈抗戰期間教會大學的西遷——以華中大學和湘雅醫學院為例〉專文，透過對華中大學及湘雅醫學院這兩所教會學校的分析，說明內遷學校對西南地區開發、建設的貢獻。輔仁大學歷史系林桶法教授在〈戰後國民政府高等教育復員的困境〉一文中指出，戰後教育復員的困難在於經費、設備的嚴

重不足，加以師資及學風低落，致使學潮不斷，為當時政局帶來負面影響。

貴州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何長鳳教授在〈抗戰時期的貴陽文通書局〉一文中，論述貴陽文通書局發展經過及其對後方文化事業的貢獻。國史館侯坤宏教授撰寫〈由緝私到暴動：民國三十三年四川江油縣中垌鎮「三二八」事件〉一文，透過對四川江油縣中垌鎮「三二八」事件與戰後台灣「二二八」事件的比較研究，說明民變的原因及其性質。台灣大學歷史系查時傑教授在〈抗戰勝利後基督教會的再起（1945-1949）〉一文中，說明基督教會在戰後全面復甦的景象，信徒、教堂數目快速增加，並在圖書、編譯及教育等方面取得重大收穫。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張力教授撰述〈足食與足兵：戰時陝西省的軍事動員〉一文，認為陝西由於動員過程中弊端百出，不僅未能達到有效動員的目的，反而造成軍民之間關係的惡化。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韓信夫教授在〈第一戰區豫北游擊區——兼論國民黨抗日游擊戰場〉一文中指出，國民黨軍隊在對日抗戰中，除了正面戰場外，的確還有敵後游擊戰場。由於韓教授充分肯定國民黨軍隊的貢獻，評論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陳存恭教授乃譽之「有董狐之筆」。逢甲大學鄭梓教授發表〈〔光復元年〕台灣軍事圖像之一——戰後台灣的軍事受降、遣返與復員〉一文，現場配合放映鄭教授費心蒐集的珍貴影片，引起眾人的迴響。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馬振犢教授在〈德國軍火與中國抗日戰爭〉一文中指出，德國軍火輸華在客觀上固然有助中國對日抗戰，然其本質實為一種商業生意。香港中文大學鄭會欣教授撰有〈從南鎮、敘昆鐵路的談判與修築看抗戰初期的中法經濟合作〉一文，說明抗戰初期法國援助中國修築鐵路的動機是利己的，而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中法之間短暫的經濟合作終因日軍進入越南而告終。南京大學歷史系陳紅民教授在〈抗日戰爭時期的驛運事業〉一文中，論述抗戰時期中國驛運事業的發展、貢獻，以及其缺失。

四川大學歷史系謝放教授在〈抗戰時期四川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一文中指出，戰時國府在四川重視農業生產，對四川農村經濟產生正面影響。然因農村社會經濟的落後，大多數小農生活貧困，此乃戰後國府亟待解決的問題。四川大學歷史系何一民教授撰寫〈抗戰時期西南的經

濟發展與人口變動〉一文，對於戰時西南經濟發展大體上給予肯定。貴州省社會科學院馮祖貽教授發表〈抗戰期間內遷人口對西南社會經濟的影響〉專文，詳述抗戰時期大量內遷人口對內地——尤其是西南的影響，包括促進城市繁榮、工商等業全面發展，以及加強邊疆與內地的聯繫。

天津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周啓乾教授以〈九一八後日本「開發」華北經濟及其實質〉為題，說明日本對中國的「開發」與掠奪，正是其「以戰養戰」策略的具體表現。復旦大學黃美真教授在〈華中振興公司：抗日時期日本控制華中淪陷區產業的壟斷機構〉一文中，以「華中振興公司」做個案探討，說明其對華中地區經濟的破壞與掠奪，並認為直至日本戰敗，日本始終握緊對重要產業的控制權。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陳鐵健教授在〈抗日戰爭時期日偽在華中華南的金融統制〉一文中指出，為了支付日軍戰費，汪政權大量發行中儲券，致使淪陷區通貨膨脹驚人。

遼寧師範大學歷史系董長芝教授發表〈日本帝國主義對東北工礦業的掠奪及其後果〉一文，歷歷敘述日本掠奪東北工礦業的具體事實，造成民族工礦業凋敝，東北經濟破產。吉林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霍遠原教授在〈日本在中國東北淪陷區實行的民族統治政策〉一文中，分析日本在東北所實行名為「民族協和」，實則製造民族牢獄的民族統治政策。吉林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解學詩則撰寫〈東北淪陷區鼠疫流行與日軍細菌謀略〉一文，揭發日軍石井細菌部隊在中國東北所進行慘無人道的細菌戰實驗。

山東大學歷史系呂偉俊教授（未到會）在〈山東淪陷區研究〉一文中，論述日偽對山東淪陷區所實行的殘暴統治，以及對淪陷區經濟進行瘋狂的掠奪和壓榨。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陳勝旻教授則以〈論日軍侵粵對廣東經濟之影響〉為題，說明日軍侵粵給廣東經濟災難性的破壞，並為廣東人民帶來極大的苦難。雲林技術學院陳木杉教授撰有〈試論抗戰時期汪偽政權控制下的廣東省〉一文，藉由《汪偽資料函電史料》的分析，探討汪政權如何控制廣東。

美國《日本侵華研究》季刊編輯吳天威教授在會中發表〈中國對日索賠之過去與財產損失問題之商榷〉一文，對於中國抗戰損失調查及對日索賠經過詳予論述，並呼籲兩岸當局要求日本歸還自中國掠奪的文物。國史館遲景德教授近年致力於中國抗戰損失調查之研究，在此次會

中以〈從抗戰損失調查到日本戰敗賠償〉為題，說明勝利之初中國政府對於戰敗的日本不採報復主義，而取「合理的寬大」政策，決非表示放棄要求日本賠償的權利。至於後來政府決定放棄對日要求賠償，則是受政府遷台、時局轉變等因素的影響。

以上對59篇論文所做的簡略介紹，雖未能盡其旨意，但從其中亦可略窺各文要旨所在。論文宣讀、討論結束後，隨即進行綜合座談，與會諸學者盡抒心中感言，會場氣氛熱烈。隨後中國近代史學會理事長張玉法教授舉行閉幕式，此次研討會乃順利完成。誠如張玉法教授所言，此次研討會是兩岸學者第一次大規模聚會研討中國抗戰問題，吾人希望此類研討會能繼續在兩岸交互舉行，並經由兩岸學者的合作與努力下，共同撰寫一套中國人的《中國抗戰史》。

---

## 海峽兩岸「傳統社會與當代中國社會史」 學術研討會評述

定宜莊\*、許檀\*\*

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籌備並具體負責、台灣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惠予資助的海峽兩岸「傳統社會與當代中國社會史」學術研討會，於1995年8月12日至14日在北戴河召開。來自台灣與大陸各科研機構與高等院校的社會史學者六十餘人到會，提交論文三十餘篇。開幕式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所長、著名歷史學家李學勤主持，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汝信致開幕詞，台灣政治大學教授王壽南致詞。會議氣氛活潑、融洽，雙方學者就有關問題進行了認真、熱烈的探討與切磋。在閉幕式上，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常務董事、台灣政治大學教授邵玉銘對會議的

---

\*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社會史研究室副研究員

\*\*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經濟史研究室副研究員

成功召開和取得的成果感到滿意，他強調了在兩岸的政治、經濟、文化交流中，學術文化交流對於中國未來的發展所具有的特別重大並深遠的意義，並表示了今後兩岸學者進一步合作的願望。

中國社會史作為專門學科，在大陸從80年代重新興起，在史學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之下，近十年來已開始形成一支頗具研究實力的隊伍，並成為史學研究的「熱點」之一。1992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正式成立了中國社會史研究室，集中了一些較為年輕的學者，表示了對這一學科發展的特別重視。台灣學者對於社會史的研究，起步早於大陸，在研究領域的開拓和對有關問題探討的深度上，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雙方都希望通過這次會議加強學術上的交流和了解，以促進中國社會史這一學科研究的深入發展。

這次會議，以「傳統社會與當代中國」作為關懷之重點。會議之籌備者邀約時特別點出希望結合中國社會史對傳統時期的研究與對當代問題的注意。要求學者在其論著中，立足史料，而心懷眼前，在析釋社會史上重要問題之際，不忘引證這些議題於現代中國社會中衍生之情況，以古今對照，並作長程而連續之思想。大陸的社會史工作者，因一向擁有並重視社會史研究與田野經驗及與社會調查之連合，無論在對秘密會社、宗族等研究上，都很能顯示此一特色。此次台灣赴會的學者中，亦有將其對姓氏、婚姻、家庭與宗教信仰之研究，與現代台灣社會之發展，聯想而共議之者。此史觀上古代與當代的聯合，在史學思想和史學方法上，都可說是一項新的嘗試。此次會議的成果，也顯示了此新方向可能帶有的活潑性與爭辯性。茲就有關近代史部份的論文摘錄於下：

### 一、關於宗族、家族、家庭

宗族與家族史研究一直是社會史研究的熱點。大陸自80年代以來，宗族活動重新復興，並有日趨普遍之勢，本次研討會的宗旨，既然是通過傳統社會的變遷和發展，了解當代中國社會的各種問題，那麼如何以對傳統宗族的認識為基點，對現代宗族的轉型或重構進行全面的評價，便成為這次研討會的中心議題之一。南開大學馮爾康教授提交的〈論宗族演變趨向〉一文，討論了當前大陸上宗族活動復興的現象，認為今日宗族活動的出現，基本上不是傳統宗族的死灰復燃，而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不能以傳統的概念出發看待當前的宗族活動。上海社會科學院錢杭

在〈農村宗族與基層社會〉一文中也認為，宗族的復興是在轉型社會中農村基層組織出現斷層的特定情況下，農民的一種「選擇」，具有積極意義。他們的提法引起兩岸學者很大的興趣與關注。台灣學者、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杜正勝，對這一問題的探討則取了別一角度，他在〈中國傳統家族特質之現代反省——特從服紀與法律的考察〉一文中，主要從結構性的服紀和法律著眼，討論作為中國傳統社會重心的家族中是否存在積極功能，如何對這一積極功能作出客觀評價的問題，以反省傳統家族在現代化過程中所面臨的命運，並且指出，傳統家族結構及其倫理對未來社會可能會有一定啓示。

注重將社會學、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方法引進史學，特別是社會史的研究，這在大陸社會史學界特別是南方一些學者中幾乎形成一種趨向。中山大學教授陳春聲等人通過對廣東潮州東風鄉陳氏宗族的個案研究，發現在這一具體社區的歷史文化情景中，以血緣原則建構起來的宗族和以地緣關係為紐帶的廟宇活動是可以整合的，從而懷疑到血緣與地緣這兩種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常用的分析工具，是否足以描述華南傳統農村社會漫長的歷史變遷和複雜多元的文化實態。與會學者則針對這一個案研究究竟屬於一般，還是特例，是否具有典型性等提出了問題。

社會史畢竟不同於社會學，在關注目前宗族問題的同時，仍有很多學者致力於對傳統家族、宗族的討論。南開大學教授常建華將族學置於宗族制度之下，對宋代以降族學的歷史演變和主要內容，進行了詳盡而全面的探討；廈門大學鄭振滿的〈清代閩南鄉族械鬥探源〉，描述了清代盛行於閩南的鄉族集團之間進行武裝械鬥的情形，認為這反映了社會控制權由官方向民間的轉移，是清朝由盛入衰的重要標誌之一。

相比之下，台灣學者則更多注意對家庭問題的研究。台灣大學哲學系教授鄔昆如從哲學的角度，提出「家」是儒家哲學文化的核心，它既是個人安身立命之所，也是社會最根本的形態，如何在這價值定位問題中找得調和，是目前社會哲學的迫切課題之一。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賴惠敏的〈近代中國的分家習俗〉在討論傳統分家一般通則的基礎上，特別注意了因社會階層和地域的不同在分家問題上造成的種種差異，闡述了宗法盛行的明清時代對婦女繼承權利的漠視。南開大學陳振江教授的〈晚清婚姻家庭的近代文明化趨向〉，則注意到社會大轉型時期作為社會有機體細胞的家庭所隨之發生的劇烈變化。



## 二、婦女與兒童問題

這一問題與家庭、婚姻問題密不可分，由於此次研討會關於這一問題提交的論文數量較多，討論的視角與層面也具有一定新意，形成宗族問題之外相對集中的又一熱點，有必要專列一段加以說明。

此次研討會直接討論婦女問題的論文有四篇。北京師範大學曹大為副教授的〈傳統社會對婦女的控塑及其社會效應〉與鄭州大學教授鄭永福的〈賢妻良母與賢妻良母主義〉，都是從宏觀角度探討婦女在傳統社會中地位問題的。前者認為，就漢文化圈的主流而言，生產方式長期未能突破自然經濟軀殼和宗族血緣紐帶的頑固滯存，是中國古代婦女從總體上無法擺脫傳統人格拘束、正統氣質形象格外強固的根本原因。後者認為，賢妻良母這一概念在歷史變遷中已帶上了特定的文化內涵和時代烙印，其中雖然包含了對中國婦女傳統美德的讚譽，畢竟是傳統文化的產物，如今若再沿用，則應對其內涵加以充實改造和界定。也有些學者注意到中國傳統社會的封建倫理觀念與婦女生活實態之間的歧異，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研究員郭松義的〈清代婦女的守節和再嫁〉一文，揭示了清代一方面在政府倡導、道學家鼓噪之下走上守貞持節道路的婦女人數有逐年增多之勢，另一方面，由於這一所謂的道德規範嚴重喪失人性，並且嚴重脫離人們的實際生活，又出現了道理和行動上的某種脫節。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定宜莊則通過對清代旌表「守正捐軀」婦女一事的具體分析，討論隱藏在這一現象背後的婦女精神上和心理上的壓力，並探討從中反映出來的社會心態。此外，雲南大學副教授方鐵的〈古代中國的生育觀〉涉及到了傳統社會中的婦女地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王戎笙教授的〈科學制度與兒童教育〉，則涉及到傳統社會對婦女特別是女童的教育問題。

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熊秉真的〈中國近世歷史上的兒童與童年〉，旨在以中國歷史上的實例，向學界提出一種以年齡群和生命歷程為著眼點的歷史，認為這是史學上繼地域史、階級史和性別史之後又一層深刻化和進一步反省與精緻化的重要嘗試。總的來看，對於這類以前較受忽視的課題的研究，表明了社會史研究領域的拓展和研究視角的變化，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 三、秘密宗教與秘密會社

這也是社會史研究中的傳統課題。在8月14日的全體會議上，台灣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李亦園與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秦寶琦分別作了〈傳統民間信仰與現代社會〉以及〈秘密結社從傳統社會到當代中國的運行軌跡〉的發言，引起與會代表的強烈興趣並引發了熱烈的討論。李教授的論文從人類學觀點探討傳統中國民間信仰對於宇宙與人類存在的基本假設，並進而探討這一基礎宇宙觀對現代社會生活的影響，他並且將傳統民間宗教的內在深層觀念理出一個系統，稱之為「三層面和諧均衡系統」。秦教授則對秘密社會在中國所經歷的漫長的發展演變過程進行了考察，強調其所存在的破壞社會秩序、危害人民生活的陰暗面。

另外，喻松青對有爭議的道教經卷《銷釋真空寶卷》的年代、撰著人進行了考訂，作者從寶卷經文的思想內容，瞭解它所宣揚的教義和信仰；即寶卷中所記載的法系——即傳承關係作為考據線索，探究它產生的年代。作者認為《銷釋真空寶卷》的撰著人是印宗，俗名為李元，撰著年代約在1596—1620年間。

### 四、地域社會史及其他

所謂地域社會史的研究，大約包括社會救濟、醫療、戰亂、市鎮人口等方面。台灣大學教授梁庚堯的〈中國歷史上的民間濟貧活動〉，分析中國歷史上民間濟貧活動的概況，分別從家族鄉里間的賑濟、佛教慈善活動的興起、世人對社會關懷的擴大、商人對濟貧活動的支持、當代宗教慈善事業的再興幾部份來討論。台灣中研院中山社會科學研究所研究員梁其姿提交的論文〈宋至明的地方醫療制度與醫療資源〉，不滿足於對歷史上各種醫療制度進行一般性描述，而重在探討宋至明三朝地方百姓所獲醫療資源的性質及其間的主要演變。再如台灣學者鄭梁生的〈明嘉靖間之倭寇與東南沿海地區的社會殘破〉，討論戰爭對地方社會的破壞影響。

許檀〈明清時期山東的城鎮與城鎮人口〉，探討明清時期山東城鎮發展起因於商品流通，許多行政中心的城市增加經濟功能，有些還成為重要的商業城市。作者在本文中，亦對城鎮人口進行數量估計，進而分析城鎮人口的職業。

此外，本討論會中還出現一些未構成主題性的論文，其原因主要是

兩岸的交流尚屬接觸階段，這固然造成對一些課題的討論無法集中的缺陷，卻也拓展了研討會的內容，有些課題也很有啟發性。其中如台灣政治大學教授沈清松的〈批判與溝通——道家的社會思想〉，剖析道家思想的特色與時代性；中國社會科學院商傳的〈下層社會與晚明宮廷文化〉考察了處於宮廷下層社會的宦官、宮婢生活及其對宮廷文化的再造所起的重要影響；人民大學副教授胡鴻保的〈轉型社會中的考古學家——李濟個案的社會史分析〉回顧了大陸考古學界對考古學家李濟評價的變化；西北大學教授周天游的〈姓氏學研究的現狀與出路〉提出了如何為姓氏學的研究尋找突破口以進一步深入的問題，譬如結合姓氏學與人口學、人類學、社會學等方面，發展綜合研究。

這是一次成功的研討會，它開創了兩個「第一」，一是台灣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與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第一次在大陸舉辦的學術活動，一是海峽兩岸社會史學者第一次坐在一起進行了社會史的探討與交流。通過這次接觸，雙方發現在研究課題、研究方法及對研究對象的解析等方面，兩岸學者雖然存在一些差異，但也有很多共同點，差異的存在，可以拓寬研究方法和思路，有助於將研究引向深入，而共同點的存在更為雙方的合作提供了諸多可能。作為一個歷史如此悠久，社會文化如此複雜豐富的國家，中國社會史的研究，理應具有比其它國家的社會史更為廣闊、獨特的內容和更豐富多樣的方法，也為中國社會史學者提供了一個極富吸引力的研究領域，兩岸學者攜手合作，本著百家爭鳴、求同存異和取長補短的精神，將這一研究引向深入，並使其對中國現代及未來社會的發展有所啟示和助益，是兩岸學者的共同願望，僅以此點來看，這次研討會就標誌著一個可喜的開端。

---

本通訊歡迎世界各地學者撰文介紹各該地區近代中國史研究情形、出版狀況、學術演講、會議消息，及傑出學人之貢獻，以廣學術交流。

---

Becoming Chinese: Passages to Modernity and Beyond, 1900-1950

「求變求新的中國——二十世紀前半期的歷史經驗」  
學術討論會

葉文心\*

這次討論會是由中央研究院中美人文及社會科學委員會跟美國學術團體總會及社會科學研究總會共同贊襄促成的，由柏克萊加州大學歷史系葉文心擔任召集工作，於6月2日至4日在加州召開。這個討論會是一系列五次討論會的第一次。這個系列討論會的主要目的，在綜合近年來各學科領域的新研究成果，一方面嘗試為二十世紀前半期中國的歷史經驗建立一個新的解釋架構，一方面進一步認定今後有待研究的課題，作為後續會議的議程。

會議首先由許倬雲及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兩教授簡單介紹緣起並談期許。這次會議雖然由葉文心計劃召集，然而關於主旨的確認，卻是於1993年10月間，在加州Monterey所舉行的一次籌備會之中討論通過的。許倬雲教授寄望這個系列討論會能夠在相關領域之中發生相當影響。魏斐德教授希望透過這一連串持之以恆的活動建立起一個中外學者共同參與的學術園地。

會議接著由葉文心報告Monterey會議的主要決議，指出二十世紀前半期中國歷史經驗的研究，近年來因為新材料的開放、新研究方法的採用，以及學者們對東亞新形勢的體會，提出了不少新命題，建立了新觀點。這些個別獨立進行的研究，不但超出了「西方衝激——中國反應」的框架，而且也挑戰了以社會主義革命為主導線索的歷史思維方式，然而這些新研究是否能凝聚成一種新的解釋架構，卻不是大家刻意經心過的問題。這次討論會邀集多人從跨學科的角度共同努力，主要的目的就是在解釋架構上

---

\* 柏克萊加州大學歷史系教授

作一番探索。

會議分四個單元進行。第一個單元圍繞著城市研究的主題，由David Strand、Sherman Cochran及Helen Siu分別提出論文，檢討城鄉關係、城市型態、城市間各種文化經濟網絡的形成、商業文化的政治意義、商人團體跟政治結構之間的關係，以及區域間等差性都市發展對全國性政治文化的影響。Strand的論文一方面檢討了urban hierarchy這個觀念在描述二十世紀前半中國城市間相互關係時的適用性，一方面對城鄉對立的構思模式進行質疑，然後綜合這兩個線索的討論，回顧近年來史學界有關公民社會問題的辯論，進一步指出我們談近代中國都市社會結構及文化特質，必須把城鄉關係、人口流動以及外來影響等因素考慮在內，因為這些因素都直接間接地影響了市政制度的建立及中產階層政治運作的空間。Sherman Cochran的論文，以黃楚九在上海所開設的中西大藥房為線索，敘述近代中國的西藥業如何在外國勢力的競爭之下，建立城鄉之間的貿易行銷網路。黃氏在推銷西藥的過程裡，大量使用商業廣告手段，約聘畫師繪製美女圖案月曆，打響貨品商號知名度。這些廣告圖像的文化意義，也是本文的一個分析重點。Helen Siu的論文著眼民國時期珠江三角洲商人家族在當地多變且豪強林立的政局裡，如何運用金錢自保並爭利。中央大一統與地方分治兩種理念之間的張力，也就在這種區域性社會結構的轉變中呈現。

第二個單元討論跟國家認同相關的問題。柯偉林（William Kirby）的論文討論南京政府以科技理工人才為主導的國家建設思想，以及南京市建構國民政府首都的建築規範。杜贊奇（Prasenjit Duara）的論文討論滿洲國時期若干社團組織如道德會的文化認同，以及此中引申出來的政治意義。Richard Madsen的論文討論天主教在華北地區傳佈的情況及其背後的社會架構。這三篇論文雖然取材各異，而且各是一部新著之中的一部份，然而在認同這個主題上，都接觸到對社團凝聚力、自我認知的討論，尤其是文化、宗教等因素在社群自我形象中所發揮的作用。在文化、宗教認同的基礎上所建立的社群固然未必與國家認同所畫的疆界完全重疊，這些認同感的建立有時也不能完全擺脫政治力量的操作。我們談近代中國的國家認同，不可不兼顧這三種力量的交互運作及內在張力。

第三個單元討論近代中國日用民生之中的現代性問題。汪暉的論文，透過對章太炎思想的再解讀，指出近代中國的思想界雖然在追求富強的情緒的籠罩之下，傾向民族主義集體認同，但是仍有人對個人立身、自我認

知問題作過倫理學上的思索。太炎思想就是一個例子，可以看出其中運用佛教哲理抵拒現代思想中泛政治社會化的某些趨勢，在經世功利之外，另築個體存立的空間。李歐梵的論文以上海商務印書館的出版事業為主要題材，談五四啓蒙運動在出版活動中商業面的表現，同時也透過對若干流行期刊及廣告藝術的分析，闡述中產階層生活中對某些現代物質文明的嚮往。論文說明了這些文化出版事業如何透過帶有市場取向的管道，重新佈置了現代文化資源、生活方式的秩序。王德威的論文則綜合分析小說中的暴力，以及此類營構的暴力跟現實生活中體驗的暴力之間的關係。所擇要作重點分析的小說，從《老殘遊記》中剛毅以清官殺人的場面寫起，一直縱述到1940年代丁玲等作家筆下的暴力革命。論文的主要論點是這些暴力場景逐步反應現實中許多範疇的崩解，以及近代中國知識心靈在劇烈社會變革之中的迷失感，以致於對何為正義何為不公這樣的基本社會約制規範都產生不知如何界定的不穩定感。這一單元的論文從不同角度顯現近代中國文化生活之中，中外文化符號交錯、時空結構重組、社會秩序倫理思想人文價值扭曲，暴力與活力、破壞性與建設性並存，市場機制與政治權力交相運作的特質。

第四單元的論文討論戰爭與暴力在二十世紀前半中國經驗中的意義，尤其是抗日戰爭與社會主義革命這兩個大規模運動對社會文化結構的影響。陳永發的論文以詳實的材料介紹了毛澤東在陝甘寧邊區如何策略性運用對日戰時動員逐步達成社會主義革命的目標，一方面孤立地方上有力分子予以消滅，一方面將共產黨組織的影響力深植進鄉村基層。魏斐德的論文以孤島時期的上海為背景，探索「漢奸」的定義，指出漢奸一詞固然有相當彈性，是政治鬥爭假民族大義之名運作出來的觀念，但是他也認為一個人必須首先被認識為「漢」才得為漢奸，「漢奸」這個觀念之中，「漢」的意義大於「奸」，而「漢」的觀念基本上是建築在種性族群認同上的。畢克偉（Paul G. Pickwicz）的論文談抗日戰爭之勝利在戰後許多人的感受之中如同敗仗。他以戰後上海地區所風行的電影如「一江春水向東流」等為材料，分析其中內涵，指出戰爭使許多家庭離散，家庭成員分處自由區、淪陷區，八年之中因政治環境的不同，有不同的遭遇，以致戰後家庭不能團圓，抗日勝利沒有帶來復合重生的感覺，反而令淪陷區中多年來仰望王師的婦孺老弱深刻體驗到新的屈辱及幻滅。這些影片的制作，既帶有構築成分，也帶有現實經驗中的元素，如何與當時社會心理契合是個

很有意思的研究課題。這一單元的論文交集在對抗日時期民族主義運作的討論上。共同的取向是打破黑白分明、忠奸立判的二分法思維模式。各篇論文中的若干論點，引發熱烈討論。與其他各單元的議題尤其交集在對「群體認同以什麼為基礎」及「群體界線究竟有多少構築性及可跨越性」這兩個問題的辯論上。

以上各論文在會前都已分發，所以在會議中僅由論文報告人提出10至15分鐘左右的簡短報告，由評論人作20至30分鐘的詳盡討論，然後以接近一個小時的工夫作充分問答。每組單元單篇論文討論完結之後並由該單元主席主持綜合性討論，以求進一步對單元主題有所發揮。

綜合會議的主旨及討論，孔飛力（Philip A. Kuhn）教授指出中國近代史領域中新解釋架構的建立，必須確切紮根在對豐富史料的掌握上，而不是浮光掠影式的借取社會科學時髦理論之皮相。余英時教授點明新解釋架構的建立，在於另闢新壤，不再把中國近代歷史經驗單純看待成追尋富國強兵的歷史，而當重視中國人文心靈追索價值意義的過程及進境。

二十世紀前半期的中國歷史經驗中存在著兩個主要脈絡。其一是政治型態的轉變及國家觀念的興起，其二是通商口岸的繁榮及現代都會的興起。這兩個發展的交互運作意味著社會生活中發生了結構性的大轉變。這些轉變落實在各社群的經驗裡，卻又有因時、地不同而產生的特殊組合，具體而微地表現在各社群對時間、空間不同的感受上。二十世紀前半期的中國是個生機蓬勃、變動迅速、思想活躍、文明鼎盛的時代，也是一個爭戰慘烈、保守貧困、暴力充斥、理性退卻，充滿破壞性的時代。如何將這些具有強烈對比性的因素織成一個敘述線索，並探究此中的意義，正待今後努力。

此次會議將以中、英文出版論文集。

茲將論文及報告人分列於下：

1. David Strand, "‘A High Place is No Better than a Low Place’: The Modern City in the Making of Urban China"
2. Sherman Cochran, "Marketing Medicine and Advertising Dreams in China, 1900-1950" (presented by Frederic Wakeman)
3. Helen Siu, "The Grounding of Cosmopolitans: Cantonese Merchants and Local Culture in Guangdong"
4. William Kirby, "A Nation of Engineers: Birth of the Chinese Developmental State, 1928-37"
5. Prasenjit Duara, "Of Authenticity and Woman: Personal Narratives of

Middle-class Women in Modern China”

6. Richard Madsen, “Conservative Modernization: Catholic Schools and Catholic Communities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7. Wang Hui (汪暉), “Sources of the Individual and the Question of Modern Chinese Identity”
8. David Der-wei Wang (王德威), “Crime or Punishment? On the Forensic Discourse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9. Leo Ou-fan Lee (李歐梵),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Modernity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 Theme and Variations”
10. Ch'en Yung-fa (陳永發), “Wartime Mobilization: Land Revolution and Open-Door Party Rectification”
11. Frederic Wakeman, “Treason between Ourselves: The Concept of Hanjian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12. Paul Pickowicz, “Victory as Defeat: Postwar Visualizations of China's War of Resistance”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特刊三種

#### (2) 郭廷以先生九秩誕辰紀念論文集

陳三井主編

本論文集為紀念近史所創所所長郭廷以(量宇)先生九秩誕辰,暨四十週年所慶的獻禮。收國內、大陸及海外知名學者論文廿八篇,均為最新之研究成果。全書分上、下兩冊,近八百頁。

#### (3) 郭廷以先生書信選

陸寶千主編

郭廷以(量宇)先生(1904~1975),河南舞陽人。早年執教於清華大學、河南大學、中央政治學校、中央大學;來台後任教於台灣大學、師範大學。民國44年起出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籌備處主任及首任所長。本書收郭先生致親友、同仁、門生,及海外學者書函百餘封;不僅反映近史所草創時期的艱辛歷程,亦為建構中華民國學術發展史的重要素材。

#### (4) 走過憂患的歲月——近史所的故事

陳三井主編

近代史研究所自1955年2月籌備成立,至1995年2月屆滿四十週年。經過多年的奮鬥,近史所終於逐漸邁開腳步,找到自己應走的方向,建立自家的風格與特色。收在本書裡的十餘篇紀念性文章,大抵以近史所創辦人郭廷以(量宇)先生為回憶的主軸,同時也兼及近史所其他個人和細節,應能部份呈現近史所成長的故事,及中華民國學術發展的一環。



## 野澤 豊

金丸裕一\* 舟納才一\*\*

### 一、大學教師的風範

野澤豊先生的半生，可以用「已經盡到大學教師該盡的職責」這一句話來形容。二次大戰結束後半世紀以來，先生一直處於日本學術界研究中國近現代史的先導地位。在這漫長的歲月中，不僅不被大陸的政治動向所左右，還從多方面去描繪中國近現代史，奠定今日日本學術界的研究基礎。在繁忙的職務之餘，仍然積極籌劃社會學術活動，如辛亥革命研究會、國民革命史研究會（即目前的中國現代史研究會）、五四運動研究會（民國史研究會）、中國近代史研究會等，都是在先生的指導下組成的。所謂「教育與研究並存」，言易行難等事，先生都完全實現了。

先生1922年7月24日出生於日本靜岡縣駿東郡，1943年4月考入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文科第五部，二次大戰結束前（1945.6），以特別甲種幹部候補生（迫擊砲科）的身分被徵召入習志野瓦斯學校，後轉入前橋預備士官學校。1945年9月返東京高師復學。1946年4月考入東京文理科大學史學科專攻東洋史學。1949年4月，任東京文理科大學東洋史學科副手（不久任助教）。1952年7月任東京教育大學文學部東洋史學科助教。1969年4月任中央大學商學部專任講師，1970年4月升教授，1975年4月轉

---

\* 日本京都市立命館大學經濟學部助教授

\*\* 日本金澤大學經濟學部助教授

任東京都立大學人文學部教授，1986年3月，屆齡退休。1987年4月任駿河台大學法學部教授迄今。先生於1981年8月，獨力創刊《近きに在りて》定期學術性刊物，至今仍在發行，廣受日本學術界的重視。

先生在培育研究中國近現代史的人材，不遺餘力。例如目前在日本研究中國近現代史上肩荷第一線任務的如中村義（二松學舍大學）、久保田文次（日本女子大學）、小島淑男（日本大學）、鈴木智夫（愛知學院大學）、姬田光義（中央大學）、今井駿（靜岡大學）、栃木利夫（法政大學）、小杉修二（駒澤大學）、笠原十九司（宇都宮大學）、三谷孝（一橋大學）、內山雅生（宇都宮大學）、味岡徹（聖心女子大學）、高綱博文（日本大學）等，不是在東京教育大學受過先生的教誨，就是在有「野澤學校」之稱的幾個研究會上受到治學訓練的一批很出色的研究人員。筆者於1980年代前半有幸搭上先生擔任的專題討論的末班車，因此對先生之人品及治學態度，有所瞭解，擬簡略加以介紹。

憶起筆者參加「野澤專題討論」當時，東京都會區各公私立大學約二十幾名被稱為「潛入」的研究生也慕名前來參加。當時曾與久保亨（信州大學）、高田幸男（明治大學）等人並桌而坐，這對筆者而言，起了很大的激勵作用。筆者早期也是「潛入」的研究生出身。先生對於這些非正式的學生不僅以寬容之心來對待，而且在課業的指導上，也與正式的學生一視同仁，極為嚴格。「野澤學校」之所以能跨越校際與世代，最大的關鍵在於先生有一股強烈的培養後輩的熱忱。

## 二、創刊《近きに在りて》

先生於1981年獨立創刊《近きに在りて——近現代中國をめぐる討論のひろば》學術性的綜合雜誌，作為年輕學子發表研究成果的園地，例如在日本國內，除「野澤學校」的門生外，其他如古廩忠夫（新潟大學）、西村成雄（大阪外國語大學）、本庄比佐子（東洋文庫）、狹間直樹（京都大學）、岸本美緒（東京大學）、上原一慶（京都大學）等不少學者在該誌上發表論文，此為先生獎掖後進的最大貢獻。該誌每年5月與11月發行，係半年刊，今（1995）年11月即將發刊第30號，目前它不僅已經超越了一般研究會機關誌的共同性，甚至包括海外的學者都認

爲中文名稱《近鄰——關於近現代中國的自由論壇》與該誌的內涵比較貼切。因此，國外學者的論文也在增加，如閔斗基（韓國）、丁日初（大陸）、張玉法（台灣）、陳明錄（香港）、白吉爾（法國）等學者，都有卓越的成果發表於此。由此可知，該誌的知名度已漸漸在國際間打開，而該誌也將成爲目前在日本研究有關中國近現代史必讀的文獻。年輕學子即以《近鄰》作爲發表園地，他們自1980年代以後，即不斷地發表與過去的革命史完全不同形態的研究成果。爲了綜合介紹這些成果彙輯而成的《日本の中華民國史研究》一書，由先生擔任主編，預定於1995年9月由東京汲古書院出版，屆時我們又可以清楚地確認身爲「教育者」的先生所走過的蹤跡。

### 三、對中國近現代史前瞻性的論點

以上，是將先生的貢獻作了概括性的介紹，惟僅靠不才的弟子介紹，實在還有很多遺漏的地方。還好，先生在〈辛亥革命80周年に際して自らの勉學の歩みを振り返る〉《中國——社會と文化》第6號，（東大中國學會，1991年）與辛亥革命研究會編，《中國近代史研究入門——現狀と課題》（汲古書院，1992年）一書的增補再錄一文中，對自己治學的歷程均有詳細的敘述，希望讀者參閱以補不周全的地方。

其實從先生的著作目錄中，可知其著作等身，其研究的課題雖以與辛亥革命或孫中山有關的研究爲中心，但是自清末至中華民國時期的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亦有涉獵。先生不僅留意中國問題，對於「大正民主」時期或抗日戰爭衝擊下的中日關係，也曾作過深入的研究。其次，也曾留意朝鮮史的動向，期能從東亞史中尋求給中國一個定位。從先生的論著中，也可以看出他也很留意各國各民族的解放與自由的歷史，以探討民主的發展過程。

1960年代，日本處於風雨飄搖的時期，由於學生參加安保鬥爭（日本與美國於1951年9月8日簽訂「日米安全保障條約」，該約於1960年修訂時引起日本大規模的反對鬥爭）等一連串的政治活動，無法上課，爲了提供學生學習的場地，激發了先生舉辦研究會活動的動機。中國大陸的文化大革命，對日本的中國史研究影響很大。只容許片面價值觀的狹

小的人民鬥爭史觀，瀰漫著日本學術界，而一向著眼於近代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先生，甚至被扣上「資本主義派」的帽子，然而先生卻不去迎奉潮流，始終堅持自己的研究理念。

先生的論著中，如《「中國統一化」論争の研究》，再次將戰前日本的中國研究成果加以檢討，其次又如《中國國民革命史の研究》（論文集），將日本當時近代史學界的趨勢——中國近代史＝革命史＝中共黨史＝毛澤東路線史的觀念，加以嚴厲批評，並將這些政治化的歷史認識，以實證的方式加以駁斥。這些可以說是1970年代前期先生的最大研究成果。先生的這種多方面而且對歷史的綜合認識，從《講座，中國近現代史》（共7卷）及《中國的幣制改革と國際關係》中，也顯現無遺。

先生在《〈中國統一化〉論争の研究》（1971年）一書中，認為中日戰爭前夕展開的這個論争，不僅僅是中國的問題，也是給涵蓋日本的亞洲，以一種科學的自我反省的機會。先生並認為日本對亞洲的認識，幾乎以日本當時的本身利益為著眼點。這種認識，在《辛亥革命》（1965年）中，曾經明確指出來。對歷史的基本認識，先生認為身為日本人，不僅要反省因「停滯的中國」這種錯誤的中國觀所造成的侵華事實，也應該要把辛亥革命後成立的中華民國，認真地加以探討，也不能忽略辛亥革命與日本之間密切的互動性。

先生所追求的不僅是一個國家的歷史，他試圖從多方面相互連鎖的關係與構造中去尋求給予東亞一個定位。這種論點，是很具有前瞻性的。先生在《孫文與中國革命》（1972）一書中，常自問「身為日本人，為何時至今日，仍以孫文作為研究對象」，在這一課題中，他亦明確地表示了同樣的研究態度。先生對「身為日本人，應如何以科學的態度去理解中國」所提出的質問，時至今日，仍然很具意義。如果從個別實證研究愈細分化，使整體的掌握愈形困難的現狀看來，確信先生的論點，將會更有意義。

#### 四、感人插曲

筆者要一提的是，先生在上學文章中的記述太過於謙虛，其實，在先生治學之中，有兩件感人的插曲，在此一提：

一、捐贈豐富的藏書 先生座落於東京都文京區目白台的寓所對面，另有一棟房子，而這一棟房子的一、二樓原來都堆滿了數以萬計的書籍。先生曾說其獎金的大半都花在購書上。目前這棟被稱為「野澤文庫」的建築物，已整理得乾乾淨淨。因為大學鬧學潮時，先生爲了想讓在其住宅參加研究會的學生導讀的教材而購買的書籍，毫不吝惜地捐贈了出去。目前大部分日文與西文書籍贈送給中國華中師範大學，而中文書籍則贈給漢城大學。此舉固然是由於先生考慮到兩地購書不易，然而我們卻認爲這是與先生灑脫與具有國際的性格有關。相信這些書籍，會被海外學者們廣爲利用的。

二、圍繞在家庭的溫馨 筆者等不僅在教室或研究會上受先生的指導，也常常承邀到其府上一面吃飯一面交談。有關這一點，似乎從我們的老學長在大學部學生或研究生時代起，先生就一直採取這種指導學生的方法。當我們在吃飯或交談時，我們習慣稱呼爲「おばさん」的師母，總是在場。照理說我們不應該稱師母爲「おばさん」，然而師母後藤稜子女士是在日本從事「精神薄弱兒」及啓明教育（按係指特殊教育）的先驅，目前在特殊教育事業上還是很活躍（參見《圖說教育人物事典—日本教育のなかの教育者群像》中卷，ぎょうせい，1984年）。當我們受到先生嚴厲的斥責而顯得沮喪時，「おばさん」總是會很慈祥地悄悄地勉勵我們，這種一嚴一柔真是一種巧妙的搭配。「野澤學校」之所以能形成的最根本的關鍵，在於先生與「おばさん」二人共同的理念，他們不僅容納周遭的學生，而且也製造了洋溢著治學氣氛的環境。

1996年3月，先生將從駿河台大學退職，相信先生在那兒也培植了不少年輕的人材。斯時先生將有充裕的時間來整理集一生研究成果大成的著作集。如果先生僅以「研究者」的身分去作研究工作，相信著作集的編輯工作早已完成，然而先生卻因栽培後進，沒有這樣去做，也因眾多學子之故，使他的研究工作的進展，受到影響，僅就這一點而言，先生之於我們，實在恩重如山。我們期盼先生的著作集早日問世，也祝福先生與「おばさん」永遠健康。

（原文係日文，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黃福慶先生譯成中文）

## 附録：野澤 豊先生著作目録年表

- 1951 〈辛亥革命の階級構成—四川暴動と商紳階級〉，《歴史學研究》150  
 〈民歌民謡は大衆門争の傳統的武器である〉（翻譯），《歴史評論》30  
 〈帝國主義〉，《歴史學の成果と課題II，1950年歴史學年報》，岩波書店
- 1952 〈中國の人民教育に學ぶ—齋藤秋男氏の業績によせて〉，《歴史評論》35  
 安藤彦太郎〈變革と知識人—建設期中國の思想と學問〉，東和社(共著)
- 1953 〈一二・九前後—抗日民族統一戦線の形成過程〉，《歴史評論》41  
 〈中國近代史研究へのてびき〉，《現代中國》18  
 〈一二・九以後中國學生の抗日救國運動〉，《歴史評論》44  
 〈中國における歴史教育の展望〉，《歴史教育講座》2，誠文堂新光社  
 〈下郷運動と新任務—抗日民族統一戦線と中國學生〉，《大學評論》7  
 〈「大東亞共榮圈」—アジアにおける革命と反革命〉，《日本歴史講座》6，河出書房
- 1954 〈「中國革命の思想」合評會に出席して〉，《現代中國》25  
 〈中國における近代史研究の動向—とくに思想史の面について〉，《史潮》52  
 〈革命いまだ成功せず—孫文とその時代〉，《世界歴史講座》5，三一書房  
 〈抗日民族統一戦線と文化の大衆化〉，《新中國の經濟と文化》，法律文化社
- 1955 〈中國研究への反省〉，《アジア經濟旬報》238、239  
 〈倉石武四郎編〈變革期中國の研究〉〉（書評）《歴史學研究》188  
 〈中國の半植民地化と企業の運命—張謇の企業經營と政治行動をめぐつて〉，《東洋史學論集》4，不昧堂書店
- 1956 〈マルクス主義のアジア觀—とくにアジアの社會構成と民族解放運動をめぐつて〉，《現代アジア史》4，大月書店
- 1957 〈中日戦争〉，《日本歴史講座》6，東京大學出版會  
 〈戦争の中の孫文像〉，《思想》396  
 〈新聞に描かれた孫文像〉，《思想》396  
 〈日本における孫文關係文獻目録〉，《思想》396  
 〈日本有關孫文文獻目録〉，《辛亥革命史叢刊》2，（中華書局，1980）
- 1958 〈民國初期の政治過程と日本の對華投資—とくに中日實業會社の設立をめぐつて〉，《史學研究》（東京教育大學文學部紀要16）  
 〈辛亥革命—中國近代史研究の手びき〉，《大安》4-8
- 1959 〈北山康夫〈近代における中國と日本〉〉（書評），《東洋史研究》18-1  
 〈中國における辛亥革命の研究〉，《歴史學研究》235
- 1960 〈辛亥革命と大正政變〉，《中國近代化の社會構造》教育書籍，《論集日本歴史12、大正メモクラシー》，（有精堂、1977）
- 1961 〈《國父年譜初稿》上・下〉（書評），《東洋學報》44-2  
 〈孫文〉，《歴史學研究》258
- 1962 〈ある友への手紙〉，《歴史學研究》268  
 〈孫文—革命いまだ成らず〉，誠文堂新光社

- 〈日本の敗戦と中國の情勢〉，《戦後日本史》5、青木書店
- 1963 〈研究體制と學術交流——一年たつたA F問題〉，《歴史學研究》276  
〈許濂新《官僚資本論》〉（書評），《現代中國》23  
〈日中學術交流について〉，《アジア經濟旬報》545《歴史評論》158  
〈軍部の制覇と日中戦争〉（共著）《岩波講座日本歴史》20、岩波書店
- 1964 〈中國における統一戦線の形成過程——第一次國共合作と國民會議〉，《思想》477  
〈日中學術交流を終えて〉，《歴史評論》163  
〈太平洋戦争の歴史的意義——朝日新聞社《太平洋戦争への道》批判〉（共著），《歴史學研究》289  
〈統一戦線の問題にふれて〉，《歴史學研究》292  
〈自力更生の歴史的展開〉，《現代の目》5-11
- 1965 〈中國文化大革命をめぐつて〉，《都歴研紀要》3  
〈舊民主主義革命期の經濟〉（共著），《經濟史學入門》，廣文社  
〈新民主主義革命期の經濟〉（共著），《經濟史學入門》，廣文社  
《孫文と中國革命》（岩波新書），岩波書店
- 1967 〈辛亥革命と日本（立憲君主制か、共和制か——アジア最初の共和革命の衝撃）〉，《エコノミスト》45-29  
〈代議制の展開〉，講座《中國》3、筑摩書房
- 1968 〈現代史の把握をめぐつて——尾崎秀實における日本と中國〉，《史潮》103  
〈衛藤瀋吉〉，《近代中國政治史研究》《東アジア政治史研究》（書評），《アジア經濟》9-12
- 1969 〈孫文〉，《中華帝國の崩壊》，世界文化社
- 1971 〈1903年の大阪博覽會と張謇の來日——近代中國における企業者像〉，《經理研究》（中央大學）14  
〈中國における企業史研究の特質〉，《商學論纂》（中央大學）12-3、4  
〈中國革命ロシア革命への思想的對應〉，《近代日本社會思想史》2、有斐閣  
〈中國の抗日民族統一戦線〉，《岩波講座世界歴史》28、岩波書店  
〈《中國統一化》論争について〉，《《中國統一化》論争の研究》，アジア經濟研究所
- 1972 〈日中戦争のなかの難民問題〉，《歴史評論》269  
《辛亥革命》（岩波新書），岩波書店  
《日中關係小史》（編），實教出版
- 1973 〈日中關係について——その科學的認識のための方法論的前程について〉，《學園・教科研究・中學校社會》15
- 1974 〈中國の國民革命についての序論的考察〉，《中國國民革命史の研究》（編），青木書店（歴史學研究叢書）  
〈日本資本主義論争と中國問題——マニユファクチュア論争によせて〉，《歴史評論》295
- 1977 〈沈玄廬の死——1920年代末の中國農村問題をめぐつて〉，《人文學報》118  
〈《アジア近現代史講座》の企劃をめぐつて〉，《歴史學研究》443

- 〈尾崎秀實の學問——《中國統一化》論争との關連において〉，《現代と思想》28
- 1978 〈日本ファシズムと東アジア——現代史シンポジウム〉（共編），青木書店  
 〈人物評價と學問，思想の繼承について——山本秀夫《橋樑》と山田豪——《滿鐵調查部》によせて〉，《現代と思想》31  
 〈資本主義の發達と辛亥革命——立憲派の《滿州市場論》を中心に〉，野澤豊、田中正俊主編，《講座，中國近現代史》3、東京大學出版會  
 〈總論——中國現代史とロシア革命〉，《講座，中國近現代史》4  
 《アジアの變革》（編）上（歷史科學大系13），校倉書房
- 1979 〈1979年臨時大會報告について〉，《歷史學研究》467
- 1980 〈新藤東洋男編著《ロシア革命とシベリア出兵——ロシアの民衆と日本の民衆》〉（書評），《歷史學研究》480  
 〈日露戰爭と東アジア〉《史潮》（新）7  
 《アジアの變革》（編）下（歷史科學大系14），校倉書房
- 1981 《中國の幣制改革と國際關係》（編），東京大學出版會  
 〈米騒動と五四運動〉，《近きに在りて》1
- 1982 〈辛亥革命と産業問題——1910年の南洋勸業會と日米兩實業團の中國訪問〉，《人文學報》154。〈辛亥革命與産業問題——1910年的南洋勸業會與日美實業團的訪華〉，《紀念辛亥革命70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下、（中華書局，1983）  
 〈辛亥革命70周年と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歷史評論》386  
 〈平心という人〉，《近きに在りて》2
- 1983 〈五四運動史研究についての往復書簡——狹間直樹《五四運動研究序說——五四運動におけるプロレタリアートの役割》をめぐる著者との對話〉，《近きに在りて》3  
 〈五四運動と省議會——民族運動の内部構造の検討にむけて〉，《人文科研紀要》（中央大學）2
- 1984 〈民國初期、袁世凱政權の經濟政策と張謇〉，《近きに在りて》5。〈民國初年袁世凱政權の經濟政策與張謇〉，《社會科學戰線》26
- 1985 〈野原四郎《歷史への視點》〉（書評），《史學雜誌》94-2  
 〈第一次國共合作と孫文——國民會議の運動を中心として〉，辛亥革命研究會編，《中國近現代史論集——菊池貴晴先生追悼論集》，汲古書院。  
 〈第一次國共合作與孫文——以國民會議運動爲中心〉，《中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論叢12  
 〈第三章東アジア第二節中國VI現代〉，《日本における歷史學の發達と現狀》VI，山川出版社  
 〈アジア研究の戦前戦後〉《アジア現代史》（編）5，青木書店
- 1988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の日本の朝鮮支配と中國〉，《駿河台大學論叢》創刊號
- 1989 〈五四運動與日本〉，中國社會科學院科研局・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編，《五四運動與中國文化建設——五四運動70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社會



- 科學文獻出版社
- 1991 〈辛亥革命と日本外交—日本における袁世凱認識との関連において〉，  
《近きに在りて》20（辛亥80周年討論會の報告）  
〈戦前日本の上海研究—言語學者・新村出を手掛かりとして〉，《近き  
に在りて》20（上海建城700周年討論會の報告）
- 1993 〈日本文獻中的張謇和南通〉，南京大學外國學者留學生研修部編《論張謇  
—張謇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1995 〈中華民國（1912-1949）と日本—連鎖反應的な相互關係〉，野澤豊  
編，《日本の中華民國史研究》，汲古書院（預定1995年9月出版）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口述歷史叢書

#### （54）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上><中><下>

許雪姬、方惠芳訪問 吳美慧、曾金蘭、丘慧君、林世青、蔡說麗紀錄

本書係由高雄市政府委託本所執行的訪問計畫，其目的為發掘並保存二二八事件相關史料。全書共60萬字，193篇，依發生時間、發生地點與職業性質分成三冊。第一冊共61篇，分成要塞司令部、市政府、火車站、高雄中學等單元；第二冊計80篇，包括左營煉油廠、高雄監獄、警察、路途遇難、自宅受難、槍決、出獄後亡故，及卒於牢獄、失蹤等部份；第三冊共50篇，包含被捕、受傷、證人、外地傷亡等單元。書中除訪談所得資料及相片外，並佐以當時的報紙《國聲報》、《民報》、警備總部、大溪檔案、高等法院等相對資料，希望能在政府的官方資料與受訪者的說辭間做一個對照，更有助於瞭解事情的真相。可說是目前為止，所有討論區域性二二八相關事件中，徵集資料最完整、也最豐富的一套書。（一套1000元）

#### （55）藍敏先生訪問紀錄

許雪姬訪問 曾金蘭紀錄

藍敏女士系出名門，為藍鼎元之九代孫。父藍高川曾任台灣總督府評議會議員，與林熊徵、辜顯榮同受明治、大正、昭和天皇之授勳。1939年畢業於台北一高女後，赴日本東京女子大學外文系就讀，後因驟遭父喪，哀痛之際，轉赴上海，先後於聖約翰大學、金陵大學進修。抗戰時，曾為盟軍登陸台灣一事，冒生命危險，向中美合作所主任戴笠建言，並為政府地下工作人員攜發報機回台。1946年與徐永昌將軍次子徐元德結婚。光復後，先後投資過台灣貿易公司、金山農場，並一度取得可口可樂公司的台灣代理權。藍女士一生多采多姿，智慧與風範流露於其人生各階段，其不為困厄所擊倒的個性，誠為堅強女性之典範。（精裝450元）

## 研究概況

# 引進·借鑒·變化

## ——8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近現代史學鳥瞰

羅福惠\*、田彤\*\*

80年代初，中國大陸史學剛從禁錮和迷惘中走出、正在思考和探索自己的發展道路時，國門開啓，域內外史學界開始了從人員到成果的交流，西方的一些代表性成果、一些有影響的學派的理論和某些研究方法，被介紹進來，從而引發並促成了大陸史學尤其是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巨大變化。

### 一、典範：由單一而多樣

史學與政治的關係應當如何，是中外史學界都曾遇到、並引起長期關注的問題。這個問題實際上包括兩個層次的意義。其一是，史學應當研究什麼？是僅僅研究軍國大事，即人們通常所說的「政治」，還是應當研究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方面在內的整個社會？其二是在研究過程中，史學工作者應當如何對待和處置現實政治形勢政治要求的影響的問題。

就第一層意思而言，在西方狹隘地理解歷史的現象並非沒有，像朗克學派按照政治史的模式治史就是突出例證，其流風遺韻至今仍很明顯。同樣不可否認的是，中國大陸史學存在著研究對象狹窄的問題，在很長一段

---

\* 華中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

\*\* 華中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講師

時間裡，史學主要圍繞著亞細亞生產方式、中國奴隸制社會與封建制社會的分界、近代史的分期、農民戰爭、漢民族的形成、資本主義萌芽和資本主義發展等幾個有限的問題打轉，因而在史學研究中留下了不少空白。同時在指導思想上又「過份地不恰當地突出了階級和階級鬥爭的觀點」，<sup>1</sup>農民鬥爭的意義被拔高，而統治階層的所作所為被一概罵倒，從而使域外學者得出了如下的評價：「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評價農民運動在中國歷史上的作用是今天中國共產主義史學研究的中心問題。」<sup>2</sup>由於研究中突出的只是政治鬥爭史，歷史過程就被表述為矛盾——危機——革命（武裝鬥爭）——成功或失敗的圖式。中國近代史也被簡化為「二條線索」（「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把中國變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過程」，「中華民族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把中國變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過程」）和「三次高潮」（太平天國、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

在第二層意義上，客觀地說，中外各國的史學工作者被動地受到現實政治的影響，或者主動地「趨時」為某種政治主張效力，也並非偶然或個別的現象，關鍵在這種政治理念的是非和不因政治理念而曲解歷史。80年代以前中國大陸史學界的問題，一是在「政治統帥一切」的氛圍之中，史學工作者失去了個性，史學完全為政治所左右，「禁區」很多，觀點結論大同小異，史學「只具有論證現行政策正確性的功能」。<sup>3</sup>二是在「文革」中「影射史學」、「捧場史學」盛極一時，要否定現實中的某件事或打倒現實中的某些人，就援引歷史上的事件或人物作例證；要頌揚現實中的某件事或吹捧某些人，也可以借助歷史來比附和製造輿論。評《水滸》、評海瑞、批李秀成、批《清宮秘史》、「批孔」、「評法批儒」，吹捧秦始皇和武則天等等，都有史學緊跟其後。這種成了政治工具的史學既使人畏懼，又使人感到可悲，它跟在政治的風向後面亦步亦趨，因其缺乏真實性而喪失了學術價值，風頭過後就成了笑柄和一堆文字垃圾而無人問津。

「文革」結束之後，「解放思想」之說甚囂塵上，史學工作者強調，「從長遠的歷史來看，政治不是目的，它主要是實現各個歷史時期經濟目的的手段，同時也是實現各個歷史時期其他社會目的的手段；社會主義的

1 蔣大椿，〈對四十年史學指導思想的基本估計〉，《中國歷史學年鑑》，1990年，頁10。

2 （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當代史學主要趨勢〉，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頁217。

3 張芝聯，〈當代中國史學的成就與困惑〉，《史學理論研究》，1994年第4期。

政治，是實現勞動人民經濟文化目的的手段」，也是「實現人民經濟文化需要最重要最強有力的手段」；政治的「功能」的正常化，有助於釐清史學與政治的關係。此外，他們也指出，「歷史科學滿足政治需要的正確理解應該是：歷史向社會也向政治提供新的科學研究的成果，而社會和政治則利用這種成果作為自己活動的嚮導。」<sup>4</sup>儘管政治左右史學的思維定式決非短時間可以完全突破，但上述提法畢竟為史學研究提供了較為寬鬆的環境。

「歷史學的獨立品格的尋找」，<sup>5</sup>促成了史學工作者對史學研究的深入反思，這無疑形成歷史學科的發展動因。它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與域外「社會科學史學」的趨勢相互耦合，從而給中國近現代史學帶來了盎然生機。

從80年代初以來，反映西方史學理論、現代化理論及年鑑學派理論的著述，在中國大陸廣泛傳播，如沃爾什的《歷史哲學導論》、克羅齊的《歷史學的理論與實際》(Benedetto Croce, *History: Its Theory and Practice*)、柯林烏的《歷史的觀念》(R. G. Collingwood, *The Idea of History*)、古奇的《十九世紀的歷史與歷史學家》(G. P. Gooch, *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波普的《歷史主義的貧困》(Karl Popper, *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勒高夫的《新史學》(Jacques Le Goff, et al (eds.), *La Nouvelle Hstoire*)、魯濱遜的《新史學》(James H. Robison, *The New History*)、布羅代爾的《物質文明》(Fernand Braudel, *A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巴勒克拉夫的《當代史學主要趨勢》(Geoffrey Barraclough, *Main Trends in History*)、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Max Weber, *Protestant Ethics and the Spirit of Captialism*)、托波爾斯基的《歷史學方法論》(Jerzy Topolski, *Methodology of History*)等等，無不貫穿著自己的哲學理念，給單調、僵滯的大陸史學帶來了一股新風，從而在人們面前展現了一系列新的思維空間。《劍橋中國晚清史》、《劍橋中華民國史》和《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則被認為從兩個方面提供了示範，一是「從政治史、經濟史、制度史、軍事史、外交史、思想史、文化史、學術史、地

<sup>4</sup> 〈中國史學會重新建立〉，《中國歷史學年鑑》，1981年，頁361。

<sup>5</sup> 章開沅，〈關於孫中山研究的思考〉，《辛亥革命研究動態》，1994年第3期。

方史、邊疆史以及民情風俗等側面、多學科、多層次」<sup>6</sup>地對中國進行了全面的分析研究，二是「從世界版圖的視野看中國問題」。<sup>7</sup>此後，「整體史觀」，「把中國歷史作為世界史的一部份來研究」等提法，逐漸出現。由吳于廑教授策劃，經武漢大學、華中師範大學兩校史學工作者合力撰寫的五卷本《從分散到整體的世界史》已在1989-91年出版。

在現代化研究方面，大陸史學工作者最先關注的，是台灣歷史學家張玉法、張朋園等人從70年代開始進行的「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1860-1916）」和社會學家楊國樞的研究成果。緊接著，不是以經濟成長或工業化為主線，而是以社會結構和政治現代化為軸心進行全面綜合分析的布萊克的《現代化的動力》，強調社會發展最終要求是人的素質的變化的英格爾斯的《人的現代化》；重視對文化整體研究的依田熹家的《日中近代化比較研究》、集現代化研究諸家之長的羅茲曼等人的《中國現代化》等，繼續被介紹進來。由於大陸的現代化建設正需歷史借鑑，於是以現代化為模式或至少是以其為線索的中國近現代史研究就興旺起來了。

到目前為止，大陸史學界關於現代化研究的成果已為數不少。而有組織有計劃以群體形式進行此項研究的，主要有兩處：一是北京大學羅榮渠教授等人側重於世界範圍的國家、區域比較課題組。羅榮渠教授已發表多篇論文論述現代化問題，具有代表性的有：〈現代化理論與歷史研究〉（《歷史研究》1986年第3期）、〈西方現代化史學思潮的來龍去脈〉（《歷史研究》1987年第1期）、〈建立馬克思主義的現代化理論的初步探索〉（《中國社會科學》1988年第1期）、〈從「西化」到現代化〉（《人民日報》1989年2月21日）、〈論現代化的世界進程〉（《中國社會科學》1990年第5期），並出版了專著《現代化新論》和《中國現代化歷程的探索》，其研究明顯已具有相當的理論深度。二是華中師範大學章開沅教授領導的課題組，他們「從歷史學的角度，對中外近代化進程作多方面、多層次的比較研究，力求在辨別各國近代化的共性與個性的基礎上，尋找某些帶規律性的經驗教訓，作為現今『四化』建設的借鑒」。<sup>8</sup>先後出版了近十本「中外近代

6 李華興，〈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評《劍橋中國晚清史》〉，《歷史研究》，1988年第2期。

7 黃萬盛，《危機與選擇——當代西方文化名著十評》，上海譯文出版社，1988年，頁237。

8 《中外近代化比較研究叢書》總序，《辛亥前後史事論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0年，頁412。

化比較研究」叢書和此一課題的最終成果：《比較中的審視：中國早期現代化比較研究》。該項研究視角廣而且新，舉凡中國社會各個領域的現代化狀況分析，相應地同其他國家的歷史比較，都體現出一定的創意。

大陸的現代化研究雖然從域外的現代化研究中得到不少啓發和借鑒，但並非亦步亦趨的生硬模仿。大陸史學工作者認為，西方學者對現代化的研究「大多是從發展經濟學或發展社會學的角度進行研究」，「至於從宏觀史學進行整體考察，則幾乎還沒有人嘗試過」。<sup>9</sup>而且西方現代化理論中存在的「西方中心論」，認為後發展國家現代化的動力乃是外來衝擊，或者認為中國早期現代化挫折的原因在於中國的「反應太軟弱」<sup>10</sup>等，都有違歷史真實。因而大陸史學工作者的現代化研究是綜合的，無論是討論現代化的「動力」，還是檢討現代化挫折的原因，對外部因素和內部條件都有考察；不僅考察經濟狀況，而且把反帝反封建視為早期現代化的內容，全面分析政治、社會、教育、內政、外交等有關歷史。其中，城市化的問題，早期現代化的責任主體問題，傳統文化、民族性格與現代化的關係問題等的討論，都具有極大地豐富人們的歷史認識的意義。大陸史學工作者對現代化研究的態度正如吉爾伯特·羅茲曼所希望的那樣：用現代化的方法研究中國是一種手段，而不是目的，是一種只要能證明有用便操將起來的工具，而不是一種意識形態。<sup>11</sup>

如果把上述變化用理論來總結，一句話，就是「典範」出現了多樣化。「典範」(paradigm)是美國科學史家孔恩(Thomas Kuhn)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論證「科學革命」的動因時提出的概念，他所說的「典範」，係指「一個科學共同體成員所共有的東西」。<sup>12</sup>這些「共有的東西」包括共同理論基礎、原則、研究方式、價值標準，甚至思維方式、心理素質等。孔恩認為，科學革命亦可以說體現為「典範」的裂解和重構，「典範」在不能解決「反常」問題時，就會出現科學危機，直到新的「典範」取而代之，產生新的科學革命，於是形成典範危機→典範重構→科學革命的「反應鏈」。孔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問世兩年之後，即1964

<sup>9</sup> 羅榮渠，《現代化新論——世界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序，頁2。

<sup>10</sup> (美)吉爾伯特·羅茲曼，《中國的現代化》，江蘇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頁670。

<sup>11</sup> (美)吉爾伯特·羅茲曼，《中國的現代化》，頁8。

<sup>12</sup> (美)托馬斯·孔恩，《必要的張力》，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292。

年，納德爾就提出了史學研究中典範問題，並從理論和實踐上作了探討與發揮。<sup>13</sup>

現在看來，1986—89年出現的有關「史學危機」的討論，其中心內容正是圍繞著「典範」進行的。由於長期以來大陸史學已拘守在一個單一而狹窄的「典範」之中，因而無論是左衝左突或修修補補，終究未脫藩籬，八股氣十足。首先是史學工作者自己不滿意，於是有了「史學危機」之說。故究其實質，「史學危機」主要是「典範危機」，這種危機感正反映出史學工作者對「典範」問題的自覺思考，它預示著史學新發展的到來。果然，從80年代後期開始，仍舊注重政治史，尤其是注重階級鬥爭史，且把「矛盾——危機——革命」作為線索和「典範」的研究成果逐漸減少；而以社會及其多樣構成為對象的研究得到加強，以「發展」、「現代化」、「轉型」等作為取向的研究正陸續出現。這些變化充分證明年鑑學派所主張的「綜合史」原則，「為歷史研究擺脫政治史的束縛，把重點轉向經濟、社會和文化領域並同其它社會科學的結合打開了大門」。<sup>14</sup>

## 二、價值：由偏執而客觀

與典範緊密相關的是價值判斷和情感投注問題。在這方面對大陸影響最大的西方社會學者，當首推韋伯，價值無涉（或稱價值中立、價值祛除）是韋伯社會科學論的一個重要前提。他有一句名言「一旦做學問的人帶上了個人的價值判斷，就沒有對事實的全面了解了」。<sup>15</sup>此外現代政治學中的行為主義學派也具有濃厚的「價值祛除」的特色。行為主義學派要求「注重政治現象的客觀情形，而不太注重探討政治的『道德標準』和理想目標。」<sup>16</sup>這種主張對歷來強調「懲惡揚善」、「動機與效果統一」、重視道德判斷和區分階級敵我的大陸史學工作者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1987年第8期《讀書》雜誌發表署名文章，適度肯定了「價值中立」對學術研究的重要性。「社會科學研究者作為一個理性的生物體，不可能

13 參見楊豫，〈法國年鑑學派範式的演變〉，《史學理論研究》，1992年第2期。

14 同上。

15 轉見賈東海、郭卿友，《史學概論》，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2年版，頁410。

16 〈美國行為主義簡介〉，《國外社會科學》，1983年第6期。

沒有情感、沒有價值判斷地去研究社會問題，完全的價值祛除，是不可能的，但相對的做到這一點，即避免以自己的價值偏見影響到對於社會現象的正確觀察，避免放任各種簡單化的價值評判妨礙我們正確理解和認識客觀發生的事物，則不僅是可能的，而且也為繁榮社會科學研究所必需。」<sup>17</sup>客觀地說，任何社會科學工作者都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的「赤子」，他所處的社會環境影響、他在成長過程中所受到的教育及初步定型的知識——價值體系，不可能不在他的研究中發揮作用，韋伯和當今新儒家對中國儒學的看法隔如霄壤，正好說明了雙方都難以完全做到價值中立。當然另一方面，價值偏執的情況在80年代以前的中國大陸史學工作者中確實普遍存在，凡屬敵人（又常把敵人的範圍擴大化）的所作所為皆壞，而自己所作所為皆好，往往成為研究歷史問題的先入之見。因為否定歷史上的革命者，貶低歷史上的勞動人民，或者「美化」歷史上的統治者和反動階級，就意味著現實中的「顛倒敵我，混淆是非」。這種價值取向顯然遏制了歷史學的健康發展。80年代以來，客觀地研究和評價改良與革命、傳教士與教會大學、買辦階級和一些具體人物，反映出有了較多變化。

在大陸的歷史研究中，改良也曾一度被予以肯定。如1958年紀念戊戌變法60周年學術討論會曾肯定戊戌變法具有挽救民族危亡和促進思想解放的意義。但自從60年代戚本禹發表〈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一文，斷定戊戌變法「宣傳改良主義」毫無革命性以後，改良就成了十惡不赦的罪名。統治者的改良就是欺騙，非統治階層的人贊同或提倡改良就是投降。於是洋務運動、維新運動均遭否定，清末「新政」也被冠以「假」字而一筆抹煞。改良派被視為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幫凶」，改良運動被視為阻礙和消弭革命的陰謀。

80年代初，李時岳在《歷史研究》（1980年第1期）刊出〈從洋務、維新到資產階級革命〉一文，把洋務運動、維新運動視作辛亥革命的先階，並認為其具有進步的意義，因而引發了一場討論，但當時李先生尚處於「曲高和寡」之勢。此後情況逐漸改變，到1983年，由北京大學與北京歷史學會舉行的紀念戊戌變法85周年學術討論會，多數人站出來批駁了「凡是改

---

<sup>17</sup> 鄭永年，〈科學價值相對說和社會科學——讀韋伯關於社會科學方法論的論著〉，《讀書》，1987年第8期。



良主義必然是反動」的一孔之見，承認改良有其歷史合理性。<sup>18</sup>此後，不僅肯定維新運動，肯定康梁，乃至局部肯定洋務運動和清末「新政」的研究成果，也不再引起人們的驚訝了。

隨著「改良」逐步表述為「改革」，並對「革命」的實質含義重新討論，不加分析地肯定暴力鬥爭的價值觀產生了動搖。在這一過程中，西方社會科學家有關的理論觀點得到了一定的傳播和認同。如哈佛大學教授杭廷頓認為，革命和改革（改良）的界限「有時可能模糊不清」，兩者的區別「只能以政治和社會制度變化的速度、規模和方向來加以區別」。確切地說，革命就是「價值準則、社會結構、政治體制、政府政策，以及社會—政治領導的迅猛、徹底的變化」，改革只是「領導班子、政策和政治體制的規模有限而速度緩和的變化。」<sup>19</sup>羅伯特·塔克承認革命與改革的共性，即雙方「都在尋求社會變革」。在此基礎上，指出兩者差異的「可能基礎是他們採取的策略」。改革者的特點是「以漸進的、和平的策略去尋求變革，它強調的是說明」；而革命者則「以極端主義的策略，包括使用暴力，來達到變革的目的。」<sup>20</sup>除此以外，杭廷頓認為改革者比革命者面臨的問題更為棘手的觀點，頗能引起大陸史學工作者的共鳴。因為他們既要兩線作戰（反對保守的同時，又要反對激烈的革命），因而要比革命者更善於操縱社會力量和控制社會變化，還須注意區別「各種變化類型的孰先孰後，以及怎樣加以選擇的問題」，這就迫使改革者「必須在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和政治體制的變化之間取得平衡，必須把兩者結合得彼此都不受阻礙。」<sup>21</sup>大陸史學工作者聯繫中國歷史的實際，在總結歷史上改革運動屢遭挫折的原因時，不再簡單地歸咎於改良派的軟弱和脫離群眾，而是全面地考察分析改革所面對的重重阻力，以及無力保持各種力量和趨勢的平衡等問題。如朱英在〈清末新政與清朝統治的滅亡〉（《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2期）一文中，一方面肯定了「新政」「較大幅度地改革舊的封建體制」、「是一次資本主義性質的改革」的進步意義；一方面指出，由於「新政」既未解決舊有的社會矛盾，又引發了一系列的新矛盾，缺乏整合

18 〈北京舉行紀念戊戌變法八十五周年學術討論會〉，《中國歷史學年鑑》，1984年，頁342-343。

19 （美）塞繆爾·杭廷頓，《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版，頁372。

20 （美）羅伯特·塔克，《政治領導論》，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頁103。

21 《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頁373,374。

守舊派和革命派的條件和機制，終於導致了王朝政府的垮台。

有的大陸史學工作者採取中立態度，認為改良與革命是社會發展的不同形式，「激烈的革命（通常表現為武裝鬥爭）和溫和的改良，既有對立的一面，也有統一的一面，兩者都是社會發展中新事物取代舊事物的形式，暴力革命是在溫和改革走不通的情況下的選擇，而且必須在有關條件具備時才能發動和成功，不能指望暴力革命解決一切社會問題，更不能讓它無休止地進行下去，尤其是在革命階級掌握政權之後的建設時期，溫和改革將成為社會前進的主要形式。」<sup>22</sup>但是近年來肯定新權威主義和新保守主義的趨勢漸強，以至有少數研究成果肯定康、梁的主張和清政府的「體制內改革」而否定辛亥革命，當然這種觀點未能得到多數人的認同。

關於傳教士和教會學校的研究，也體現了研究者價值觀念的變化。就像中國近代史上的「愛國主義」容易和「排外主義」相混淆一樣，80年代以前，學術界對來華傳教士及其在華所辦事業曾一概予以聲討斥責，視其為「文化侵略」及至「間諜」和「別動隊」。80年代以後這種狀況有所改變，至少可以說是出現了多種聲音。

傳教士大都受過高等教育，儘管他們還負有別的使命，但其首先是文化傳媒。因而目前對傳教士的研究，不是首先著眼於政治，而是著眼於文化教育方面。胡思庸認為，在近代中國，傳教士承擔了最早介紹西方科學的使命。鴉片戰爭後，湧入中國的除傳教士之外，只有商人、鴉片販子、軍人和政客，「科學家幾乎沒有」，清廷既想「師夷之智」而又足不出國門，除了讓傳教士介紹西方科學外，別無它途。傳教士在文化傳播上「起了媒介作用和啓蒙作用」。<sup>23</sup>顧長生在〈傳教士與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一文中，也是重點考察傳教士在中西文化雙向交流的中介作用，並認為文化交流催化了社會轉型。<sup>24</sup>

羅榮渠先生則認為傳教士在中國事實上起了雙重作用：主要職能是使中國人皈依基督教，附帶也傳播西方的知識與文化。他肯定了傳教士在傳播知識、創辦學校、引發教育改革、培養了最早的留學生的作用。但特別

<sup>22</sup> 章開沅、羅福惠，《比較中的審視：中國早期現代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頁31。

<sup>23</sup> 胡思庸，〈西方傳教士與晚清的格致學〉，《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6期。

<sup>24</sup> 顧長生，〈傳教士與近代中西文化交流〉，《歷史研究》，1989年第3期。

指出：「傳教士帶來的西方文化知識，是經過教會『淨化』的思想與知識，而近代西方文明的精華如理性主義、民主思想、自由主義學說等都是傳教士所迴避和不願介紹的。」<sup>25</sup>這種評價被認為比較公允客觀。

郭大松、曹立前以美國傳教士梅耐德不惜傾家蕩產於1887年在登洲（今蓬萊市）創建中國近代第一所啓明學校（聾啞學校）為背景，勾勒出近代中國啓明教育的發展輪廓，肯定其在提高殘疾人的社會地位、推動近代教育事業的全面發展等方面，對促進整個社會文明與進步都具有積極意義。<sup>26</sup>這些研究使人們認識到，傳教士的情況是複雜的，他們來華的初始動機也很難說都是出於高尚的「博愛」和傳播「福音」，其客觀作用也不能簡單地一概而論，還需要對一個個案例作具體分析，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

教會學校是傳教士活動的一個重要內容。「過去人們曾經將中國教會大學單純看作是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工具，殊不知它也是近代中西交流的產物，它的發展變化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組成部分」，且是「中西文化交流較高與較深的層次」。<sup>27</sup>為促進這一學術領域的交流，推動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工作，華中師範大學曾於1989年主辦了中國教會大學史國際學術研討會，就教會大學研究的意義、教會大學的緣起、結構、社會功能與歷史地位、教會大學與中國教育現代化、與民族運動、與知識分子等問題展開了廣泛的討論，集中反映了近年來的研究成果。<sup>28</sup>目前這些研究尚在進行之中。

對買辦的評價也表現出很大的變化。近現代史上的買辦，因為不僅屬剝削階級，而且同外國資本主義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因而一直被視為敵人和走狗。直到1982年出版的黃逸峰、姜鐸兩先生所著《舊中國的買辦階級》一書，仍持這種傳統觀點。80年代中期，上海《文匯報》副刊曾刊登過討論租界和買辦的短文，丁日初先生最早談到近代前期買辦的若干正面作用。1988年，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了華籍華人學者郝延平的《十九世紀的中國買辦：東西間橋樑》一書，才真正引發了對買辦的重新考察

25 羅榮渠，〈論美國與西方資產階級新文化輸入中國〉，《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2期。

26 郭大松、曹立前，〈傳教士與近代中國啓暗教育〉，《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6期。

27 章開沅、林蔚，〈中西文化與教會大學〉，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序1，詳見頁447-469。

28 同上。

和全面認識。

石志新在承認買辦「確實充當過助紂為虐的角色、充當了西方對中國殖民掠奪的幫凶」的前提下，從買辦在近代的產生、發展和變化入手，對買辦溝通中外經濟往來的作用作了肯定，並指出買辦對推動中國的早期現代化也發揮了積極作用。如買辦從事的進出口貿易帶動了國內工業、商業和金融業的發展，「為中國資本主義近代化的實現提供了重要的歷史前提」。全文結論是：「買辦也是中國從被動到主動走向世界市場、邁向資本主義近代化的一個必然結果」，因而主張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上為買辦留下一個「恰當的位置」。<sup>29</sup>吳國民也把買辦在政治上的反動與經濟文化上的進步區別對待。肯定買辦對中國早期經濟發展的工業化、近代思想文化的轉變及對西方文化的移植都有客觀積極效能。<sup>30</sup>此類研究不僅是對郝延平先生的呼應，還豐富了若干新的內容。不過一般人認為，如果說19世紀和20世紀初，當民族資本主義尚未得到發展、中外交流還不暢通時，買辦確實起了某些進步作用的話；那麼從20年代起，買辦的確起了摧殘民族資本主義的壞作用，尤其是他們勾結帝國主義，操縱中國政局，甚至直接勾引策劃帝國主義的侵略和鎮壓行動（如廣州商團事件），顯然是反動性越來越強。

價值判斷上向客觀公允的轉變也體現在對某些歷史人物的重新評價和對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經濟發展的肯定。前者如對曾國藩，人們不再僅視其為鎮壓農民革命的劊子手，卞哲的《曾國藩傳》（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首次對曾國藩的洋務活動給予某種肯定。章繼光的《曾國藩思想簡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成曉軍的《曾國藩與中國近代文化》（湖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則把曾國藩作為學者、理學大師加以剖析。<sup>31</sup>後者如已有少數研究成果對1927—1937年經濟發展的「黃金十年」的成績，對南京政府的修約活動、幣制改革和土地改革等，表示了並非全盤抹煞的態度。

<sup>29</sup> 石志新，〈淺析買辦在近代化過程中的作用〉，《青海師範大學學報》，1994年第2期。

<sup>30</sup> 吳國民，〈對十九世紀中國買辦階級的再認識〉，《人文雜誌》，1994年第2期。

<sup>31</sup> 詳見成曉軍，〈120年來曾國藩研究著作和資料出版述評〉，《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2期。

### 三、視野：關注系統和各個細部

80年代從西方傳入了控制論、信息論、系統論，總稱「三論」。其中系統論對人文和社會學者的影響最大，史學工作者開始將「系統方法」用於自己對社會和歷史的思考。

所謂「系統方法」就是「按照事物本身的系統性把對象放在系統的形態中加以考察的一種方法。即從系統的觀點出發，始終著重從整體與部分（要素）之間；整體與外部環境的相互聯繫、相互作用、相互制約的關係中綜合地、精確地考察對象」。整體性、綜合性原則是其最顯著的特點。「整體的性質和規律，只存在於組成其各要素的相互聯繫、相互作用之中」，因而它要求「從整體與部份相互依賴、相互結合、相互制約的關係中揭示系統的特徵和運動規律」。綜合性則「要求對任一對象的研究，都必須從它的成份、結構功能、相互聯繫方式、歷史發展等方面作綜合的系統考察。」<sup>32</sup>傳統思維方式和研究方法存在一個致命的缺陷，即只重視單一的線性因果關係、尤其是經濟決定論，從而使複雜多變和豐富多彩的歷史只給人留下蒼白和公式化的印象。系統論的應用引起了歷史思維的變革，它促使史學工作者從多層次、全方位的視角及相聯的「合力」論出發，去考察和詮解歷史的真相。

1980年初，金觀濤、劉青峰在《貴陽師範學院學報》上發表〈中國歷史上封建社會的結構：一個超穩定系統〉一文，嗣後又擴展成題為《興盛與危機》的專著，繼爾縮寫為《在歷史的表象背後》的小冊子，首開應用系統論研究歷史的先例。一些中青年學者頗讚賞他們思路的新穎和思維的邏輯性，但老年學者認為兩位作者係從自然科學界「半道出家」而來，缺乏感性的歷史經驗基礎。不過在1985年於上海召開的以「現代自然科學方法論與歷史研究」為主題的史學理論討論會上，與會代表大多數認為，系統方法可以適用於歷史研究。<sup>33</sup>表明系統論在史學研究中得到了認可。

系統分析法在羅榮渠先生的《現代化新論——世界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一書中體現得較為突出。這是一部從「宏觀歷史學的角度」，把現代

<sup>32</sup> 魏宏森，《系統科學方法論導論》，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頁76-77。

<sup>33</sup> 詳見達春，〈「現代自然科學方法論與歷史研究」討論會綜述〉，《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4期。

化作為全球性變革的進程，進行「整體性」研究的論著，該書首次明確「提出以生產力為社會發展中軸的一元多線歷史發展觀」，「突出以生產力標準代替生產關係標準作為衡量社會發展的客觀主導標誌，並按照大生產的形態演進的主線，著重闡述了現代工業生產力引發的第三次社會大變革的偉大歷史意義。」<sup>34</sup>尤其是根據「系統方法」的要求，廣泛全面地探討了經濟、政治、文化、思想各個領域在現代化過程中的變化，並深入分析了社會組織和社會行為的相關演進。

系統論強調大系統內的各個分支系統的狀況及相互關係，而西方的「結構—功能主義」學派和年鑑學派也著重提出了「結構」的概念，如年鑑學派的布羅代爾認為「所有的結構全部具有促進和阻礙社會發展的作用。」<sup>35</sup>當然由於「結構」一詞分別出自哲學家、社會學家和歷史學家，他們對「結構」的理解不完全相同。「對於我們史學家而言，一個結構也許是一種集合，一個建築體，但更是一種現實。」<sup>36</sup>大陸的史學工作者所理解的「結構」，基本上也如布羅代爾的作法，把「結構」限定為「社會上現實和群眾之間形成的一種有機的、嚴密的和相當固定的關係。」<sup>37</sup>這一特定的結構通常指由社會集團和社會群體體現出來的社會結構。

近代中國社會是一個過渡型社會，其中的階級、階層也都具有過渡的性格，某些新生階級還帶有不成熟的特點，它的區分還不明晰。因此早在1983年，章開沅教授就指出了研究社會集團的重要性，他建議「多做一些集團（如資本集團、行業、商會以至商團、會館等等）的研究，然後再進行類型的歸納與區分，所得結論可能比簡單的上中下層劃分更切合實際一些。」<sup>38</sup>後來他又就此主張作進一步的闡發，強調要「研究實際存在的社會集團豐富的內蘊」，不要急於「尋求階級定性」。也只有大力提倡社會集團的研究，才能「彌補過去階級分析簡單化造成的缺點。」<sup>39</sup>

近代商會是社會集團研究中的一個「熱點」，通過幾年的努力，關於

34 羅榮渠，《現代化新論——世界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序，頁2、3。

35 （法）F·布羅代爾，〈歷史和社會科學：長時段〉，《史學理論》，1987年第3期。

36 布羅代爾，〈論歷史〉，轉引自姚蒙，〈文化·心態·長時段〉，《讀書》，1986年第8期。

37 〈歷史和社會科學：長時段〉。

38 章開沅，〈關於改進研究中國資產階級方法的若干意見〉，《辛亥前後史事論叢》，頁64。

39 章開沅，〈關於孫中山研究的思考〉，《辛亥革命研究動態》，1994年第3期。

蘇州、天津、上海、武漢等地的商會研究已有一批成果問世。除了數十篇有關論文之外，朱英的《辛亥革命時期新式商人社團研究》是商會研究中有較大影響的專著。它不僅對商會、商團作了詳盡的論述，而且對人們比較生疏的晚清商人自治團體以及文化教育、學術研究、消防、風俗改良等新式商辦社團，也作了具體介紹與深入論述。馬敏則從商會研究深入到對紳商群體的研究。紳商是中國社會的一個奇特階層，是「晚清到民國初年一支舉足輕重、極其活躍的社會集團力量」。作者分別從紳商階層形成、紳商類型及社會屬性、社會功能、政治參與等各方面進行探討，並與西方早期資產階級作多層面的比較。特別考察了現代化進程中的官商關係，肯定了特定歷史時期的紳商合流，認為其具有促進近代社會階級結構的轉型，催生新興資本家階級的進步作用。這一研究證明紳商既不再是傳統意義的紳士或商人，也不具備近代工商資本家的資格，而是介於兩者間的「過渡體」、「中介物」，兼具新舊兩個時代的特徵，「集中體現了近代中國社會轉折、過渡的歷史行程」。因而作者認為對紳商的研究「構成一個觀察近代社會階級關係轉型的絕佳歷史透視點。」<sup>40</sup>

對新式學生和知識分子群體的研究也取得了可觀的成績。姜義華的〈我國近代型知識分子群體簡論〉（《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1期），何曉明的〈近代中國先進知識分子論綱〉（《福建論壇》1988年第4期），桑兵的〈1905-1912年的國內學生群體與中國近代化〉（《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5期）等，都是具有一定影響的文章。專著則有王金鈺的《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歷史軌跡》（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李喜所的《近代留學生與中外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桑兵的《晚清學堂學生與社會變遷》（台北稻禾出版社，1991年），王奇生的《中國留學生的歷史軌跡》（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等都是前所未有的開拓之作。通過對近代意義的知識分子成長道路的重新認識，使人們更清楚地認識到，知識分子是導引社會的積極力量、社會變遷的重要因素。他們的成長軌跡也反映了近代社會的曲折發展。

研究「心態史」是年鑑學派的另一重要主張，年鑑派創始人費弗爾首倡歷史學與心理學的結合，而後布羅代爾在《物質文明和資本主義》、《法國的認同》中正式提出「心態史」概念。「心態史」即應用心理學的理論

40 馬敏，《官商之間：社會劇變中的近代紳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頁3。

和方法研究歷史上人們的心理狀態，藉以了解和說明人的精神、心理與時代和社會的各種關聯。「心態史」的傳入，引起了大陸史學界的廣泛關注和仿效，最初的此類研究屬於「個案」類型，多為討論一些著名人物和學者在社會轉折關頭的心緒，側重於社會和時代對人的心態的主導；其後範圍逐步擴大到群體，並開始探討群體心態對事物和社會的影響作用。樂正在心態史研究方面成果最多，有〈認識空間的擴展與近代心態的演變〉（《上海社會科學院學術季刊》，1988年第3期）、〈晚清「泰西近古說」的心態分析〉（《學術研究》，1988年第1期），尤其是專著《近代上海人社會心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可說是心態史研究的一部力作。周岩的《百年夢幻——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心靈歷程》（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也是研究群體心態的成功之作。

章開沅教授在〈辛亥革命與只爭朝夕〉（《「紀念辛亥革命8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中華書局，1993年）一文中，從社會心態上著眼，探討中國近現代史上的一個重大問題，即中國的現代化緣何屢遭挫敗？他通過重點考察戊戌變法、辛亥革命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認為領導者都共同存在著「歷史緊迫感」和「變革急性病」相互伴隨的狀況，進而分析這種心理的歷史根源。指出由於民眾的過高期望和領導者的過高許諾給自己造成了極大的心理壓力，領導者因此往往採用超現實的急進政策，而急進政策的冒險性又極易導致失敗，從而引起領導集團的快速更替。這就構成了中國革命和現代化屢遭挫折的社會心理根源。<sup>41</sup>

也有研究精神世界和心理狀態，並加以肯定的文章，如陳為在〈淺析中國近現代歷史發展的主要動力〉（《社會科學輯刊》，1993年第6期）中提出，在中國近代社會的特殊條件下，「真正能推動中國近現代歷史發展的主要動力，應該是作為一個整體的中華民族的核心願望」，這個願望植根於中華民族悠久的文化歷史傳統中，表現為趕超西方強國的願望，代表了「整個民族在特定歷史時期的奮鬥目標」。作者強調主體意識推動客觀歷史進程和社會發展的作用，認為它具有超越經濟基礎，提昇和放大文化的功能的作用，變不可能為可能。

此外，在以前基本上是空白的社會史、風俗史、婦女史等各個方面，近幾年也出現了不少研究成果，如喬志強的《中國近代社會史》（人民出

<sup>41</sup> 參見章開沅，〈關於孫中山研究的思考〉，《辛亥革命與只爭朝夕》。



版社，1993年）、馮爾康的《清人社會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嚴昌洪的《中國近代社會風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鄭永福、呂美頤的《中國婦女運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和《近代中國婦女生活》（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等等。對這些社會細部的研究，仍然貫穿著系統考察和結構、功能分析，並反映出歷史研究向「下層社會」和「弱者的生存狀況」逼近的趨勢。

#### 四、結束語

在中國大陸涉足中國近現代史研究者為數眾多，80年代以來出版的有關專著數以百計，發表的文章數以千計，我們的這一「鳥瞰」只側重於分析受到外來影響而出現的若干變化，而且顯然只是涉及到其中的一部份。好在域內外各種關於中國大陸近現代史研究狀況的「綜述」、「評介」已多，彼此參照補充，庶能使世人大體了解我們的工作狀況，我們自己也可藉此總結反思，爭取更上層樓。

不可否認的，當前中國大陸的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普遍存在著困難和不足。「困難」是指客觀的環境條件，因為大環境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現實的問題尤其是經濟問題和科學技術問題，吸引了人們的高度關注，人文社會科學特別是其中的史學相對受到冷遇，讀者群萎縮，嚴肅的、學術性強的著作，更少有出版者和讀者問津。「不足」則是史學工作者在主觀上難免有「趨時」和「媚俗」的傾向，雖然再無強制，但研究者仍難擺脫長期形成的把史學視作為中心工作服務的工具的慣性；還有一些人迎合書商和讀者的要求，大談「性文化」、「酒文化」、五行八卦、宮闈秘史、青樓傳奇、風水神算等等，人物研究中「諛墓文」大行其道。凡此種種，說明有的史學工作者缺乏批判和超越現實的人文精神，既沒有終極關懷，也未能著眼於歷史學科自身發展的需要。因而不難揣測：要造就中國的湯因比、費正清、李約瑟，要出現新時代的范文瀾、侯外廬、陳寅恪、錢穆，尚須俟以較長時日。

---

本刊「研究概況」欄，歡迎讀者撰文介紹各學術機構有關中國近現代史之研究情況，以及對各個研究領域進行回顧與檢討。

---

# 大陸的中國近代教育史研究述評<sup>\*</sup>

劉海峰<sup>\*\*</sup>

教育史是一門介於教育學和歷史學之間的交叉性質的學科。作為歷史學的分支，教育史與政治史、經濟史、社會史等一樣，是歷史學中的專門研究領域，但歷史學者研究政治史、經濟史和社會史成果頗多，對教育史卻很少涉及。作為教育的一門基礎學科，教育史是教育學的歷史延伸，受到教育學界相當程度的重視，自近代以來，治教育史者大多數是教育學界的研究者，治近代教育史者亦不例外。

大陸的中國近代教育史研究在「文革」前開展得十分有限，較有份量的專書已出版者只有舒新城編的《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其他一些講義如華東師範大學的《中國教育史綱要》和北京師範大學的《中國近代教育史》並未正式出版，僅在一些師範院校教育系內部交流使用。由於受多次政治運動的衝擊，發表的教育史論文也不太多。「文化大革命」十年間，大陸的近代教育史研究基本中斷。

70年代末以來，大陸的近代中國教育史研究也像其他社會科學一樣，走上了繁榮發展的道路。特別是近年來，中國近代教育史的研究議題逐漸拓展，研究方向逐漸增多，研究方法有所改善。大體而言，大陸的近代中國教育史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 一、重視教材編寫

許多中國近代教育史著作是以教材的形式出現的。如陳景磐著《中國近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華東師範大學教育系與教科所編《中國現代教育史》（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3）、高奇主編《中國

---

\* 本文原係作者就中國大陸教育史研究所作述評，因限於本通訊之性質，經徵得作者同意，略作刪節，保留有關教育史研究通論及近代教育史研究概況部份，特此說明。——編者按

\*\* 福建廈門大學高等教育科學研究所教授兼副所長

現代教育史》(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1985)、毛禮銳主編《中國教育史簡編》(教育科學出版社, 1984)、孫培青主編《中國教育史》(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2)、高時良著《中國教育史綱》(上冊, 古代之部)、董寶良著《中國教育史綱》(下冊, 近代之部,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1)等等, 這些教材注重對中國近代教育史的全面介紹, 對中國近代教育史的教學起了重要作用, 也為進一步深入研究打下了基礎。

## 二、注重資料蒐編

在重版舒新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三冊之後, 近年來大陸又出版了多套相關的教育史資料。陳學恂先生在主編《中國近代教育文選》(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3)的基礎上, 又主編出版了《中國近代教育史教學參考資料》上、中、下三冊(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6-1987)。朱有瓚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四輯共七冊(第七冊與高時良共同主編,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1983-1993), 陳元暉、陳學恂主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匯編》十冊近七百萬字(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0-1995), 這兩套大型資料工具書為中國近代教育史研究奠定了堅實的資料基礎。此外, 李楚材編著的《帝國主義侵華教育史資料——教會教育》(教育科學出版社, 1987)、武強主編《東北淪陷十四年教育史料》(吉林教育出版社, 1989)、李桂林主編《中國現代教育史教學參考資料》(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7)也都編得各有特色。

## 三、側重出版套書

大陸的中國教育史研究陣容較強, 以研究中國教育史為主的教學科研人員不下二百人, 另外還有大量的地方教育史志和校史編寫人員。通過多方協作, 有利於快出成果, 加上受大陸出版界近年來好出叢書、套書的風氣的牽引和推動, 因而出版了許多有份量的中國教育通史叢書和套書。例如毛禮銳、沈灌群主編的六卷本《中國教育通史》(山東教育出版社, 1985-1989)、王炳照主編的《中國教育思想通史》(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4)、《中國教育史研究叢書》已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四本、教育科學出版社出版多本, 沈灌群、毛禮銳主編的三卷本《中國教育家評傳》(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8-1989)、宋恩榮主編的《中國近現代教育家系列研究》、陶愚川著《中國教育史比較研究》古代、近代現代部份(山東教育

出版社, 1985-1988)、李國鈞主編《中國書院史》(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4), 這些大部頭的著作集合大陸各地中國教育史專業研究者的力量, 在以往零星研究的基礎上集其大成, 分工合作, 有計劃地、系統地研究中國教育史制度、思想史以及著名教育家, 對中國近代教育史研究的全面展開, 助益甚大。

大陸較早的中國教育史研究偏重通史性綜合性的教材和專著的編寫, 近年來一些研究者的視角逐漸轉移到斷代教育史和專題教育史、地區教育史等方面上來。近代教育史方面, 如白莉民的《西學東漸與明清之際教育思潮》(教育科學出版社, 1989)、張建仁的《明代教育管理制度研究》(台灣文津出版社, 1993)等。專題教育史在中國高等教育史、中國教育管理史、中國留學教育史、中國教會學校史、科學考試史、書院教育史等許多方面都有不少著作問世, 尤其是科學和書院不僅地位重要、內容廣博、形式獨特, 可為現實提供參考借鑒, 而且研究成果豐碩, 已逐漸形成了「科學學」和「書院學」這樣專門的學問。地區教育史如熊明安等主編的《四川教育史稿》(四川教育出版社, 1993)、王鴻賓等主編的《東北教育通史》(遼宋教育出版社, 1992)、李才棟的《江西古代書院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3)等也有不少。

以上所述, 只是列舉一些有代表性的著作, 限於篇幅, 還有大量的論著無法一一列舉, 現在每年出版中國近代教育史著作數量豐富, 成果琳琅滿目, 蔚為大觀, 已進入繁榮發展時期。尤值一提的是, 《教育史研究》季刊於1989年創刊之後, 為廣大的研究者提供了一個發表論文和溝通信息的園地, 有力地推動了大陸教育史研究的向前發展。

然而, 綜觀大陸的中國近代教育研究現狀, 也可發現存在不少問題, 筆者認為, 較明顯的問題至少有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 著作的數量雖多, 專精的成果不足。長期以來, 由於種種歷史的和現實的原因, 其中包括以往受政治運動衝擊的影響, 大陸的「教育史研究者普遍注重述而不作, 注經疏義, 長於鋪陳, 拙於分析, 陳陳相因, 人云亦云, 缺乏創新; 缺少個性」。<sup>1</sup>有的教育史著作內容僅限於對時代背景的泛泛敘述。對當時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的一般分析和介紹, 較少將中國教育的發展放在整個歷史發展的廣闊背景中加以系統的、全面的考

<sup>1</sup> 周洪宇, 〈教育史研究改革管抒〉, 載《教育評論》, 1991年第2期。

察，由於視野有限，因而阻礙了研究深度和廣度的拓展，這與一些研究者學科知識較為單一、學術視野不夠寬廣、素養不夠深厚有關。大套的叢書雖不少，但真正稱得上精品的著作卻不多。一些叢書中各個單本及大部頭書中各篇章水平參差不齊，有些叢書為求整套叢書選題的完整性，將某書交由對該專題並無多少研究的人承擔，以致出現在該專題範圍內從未發表過任何研究論文，卻在短短的一兩年中寫出幾十萬字的專著的情況，這種匆忙趕就的著作很難會有高質量。加上教育學本身不像政治學或社會學等學科那樣較易引起整個學術界的關注，教育史的研究成果較少引起社會科學界的重視，更難以產生重大的社會反響。

第二，重覆勞動較多，缺少交流爭鳴。在以往的近代教育史研究中，許多論著選題雷同，一再重覆，不厭其繁。有時只是為了使用自己編寫的教材而出版專書，這些專書與已有的著作相比，從結構到內容皆大同小異，談不上有多少創新。研究中國教育家的論文有半數左右是專論孔子和陶行知的。由於缺少海外資訊，不了解台港、日韓及歐美學者的研究成果，一些已被研究得相當深入的問題在大陸還被低水平地重覆研究著。與此相關，便是許多論著很少列出參考文獻，引用他人成果較少註明出處，有的論文通篇沒有一個引文注釋，有的雖大量參考或摘錄他人論著卻只標明很小的一部份是參考他人論著的，只在全書自序或後記中用一句「本書多有參考前人、同人成果，謹此摯誠致謝」了事。不太注意註明引文雖是大陸整個教育學界乃至社會科學界的通病，但對中國近代教育史研究而言，問題尤為突出。從學科內容上看，教育史從屬於教育學，但從研究方法和認識結構來看，教育史更多與歷史學有關，相關於大陸的歷史學界來說，近代教育史研究界在引文註釋方面做得是不夠的，更不用說與海外學術界相比了。另外，研究者之間也缺少學術交流，許多人各自為戰，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全國教育史研究會自開過三次年會和1987年的代表大會以來，就再也沒有召開過學術會議，使這一全國性的研究組織處於半癱瘓狀態。同行之間缺少交流切磋的機會，難以在思想的碰撞交鋒中提高總體水平。另外，教育史學界也缺少爭鳴商榷的風氣，大家各寫各的，互不干涉，一團和氣。即使觀點相左，也盡量不指名道姓進行商榷，以致於從論著中看不出到底討論的對方是誰，這也影響了研究的深入。

第三，研究方法陳舊，定量分析偏少。近年來，大陸的中國近代教育史研究在方法上雖有所改善，但總的說來仍不盡如人意。在80年代以前，

不少人簡單照搬機械唯物主義的研究方法，在研究教育史問題時也套用環境論、兩分法和階級分析法，因此不能客觀評價歷史上的一些教育家和教育制度。就是現在，在運用系統方法、結構方法、心理學方法、計量方法等，以及其他學科的理論和方法來研究教育史問題方面做得還很不夠。尤其是缺少定量的實證研究。多數人習慣運用定性分析，定量研究多滿足於初級描述性統計學的範圍，使用現代科技方法作歷史定量性研究者還寥若晨星。因此，研究過程中，雖然質的規定性已經確定，但由於缺少必要的量度為依據，致使論點不夠鮮明，論據不夠精確，進而導致既不能科學地反映教育史的一般規律，也影響對其質的規定性本身的評判。<sup>2</sup>

當然以上所談三個方面的問題並非不可克服。可喜的是，這些問題和困難有的已逐漸引起重視，有的正在解決，總的趨勢還是朝好的方向發展。例如許多研究者已認識到應將思辨的方法和實證的方法結合起來，思辨的方法有助於我們對問題的深層次作出哲理性思考，對於把握事物的本質有重要的意義，而實證的方法、計量的分析則有助於我們準確地、具體地認識事物的現象和特徵，在一些教育史論著中採用定量分析的材料也日漸多了起來。而在學術交流方面，全國教育史研究會雖仍未舉行全國性的學術活動，但一些研究者通過召開叢書編委會或某一部書的書稿討論會、某一教育家的紀念學術討論會，在一定範圍內有機會進行座談交流。特別是中國高等教育史的研究方面，學術活動仍較活躍。1994年10月在廈門大學召開了全國首屆高等教育史學術研討會，1990年以來還在廈門大學、西安交通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四川聯合大學分別召開過四屆高等學校校史研討會。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自1989年以來，中外學者先後在武漢、南京、台灣、美國、香港、成都等地召開了六次中國教會大學史國際學術研討會，組織聯合有關學者長期進行教會大學史的專題研究。<sup>3</sup>而且由於研究教會大學史本身需使用大量外文資料，又有不少海外歷史學者共同研究，因而有關論著較多地參考引用了海外的研究成果，也較注意註明引文出處，從研究群體上說，這無疑是大陸的中國近代教育史研究界走向規範化、國際化的一個良好開端。

<sup>2</sup> 參閱曾天山，〈教育史研究的新思維〉，載《教育史研究》，1991年第1期。

<sup>3</sup> 參閱劉海峰，〈高等教育史學科建設再探〉，載《高等教育研究》，1995年第1期。

## 史料介紹

# 中研院近史所院史資料室簡介

李慧玲\*

中研院近史所（以下簡稱本所）院史資料室（以下簡稱院史室）成立於民國76年11月16日。庫藏檔案主要有本院朱家驊、王世杰、錢思亮三位故院長之個人檔案，及中英庚款會檔、院務雜檔等。

王世杰檔是民國72、74年間，分三批前後由其公子王紀五、本院總務主任趙保軒兩位先生送至本所保管的。本所隨即派請所內同仁進行初步的整編工作，從而完成《王世杰先生檔案目錄》初稿。民國79年1月院史室將此目錄整理影印十餘冊，內容大略分為：（一）日記，（二）聘書，（三）信札，（四）函稿，（五）收發文簿，（六）照片，（七）實物，（八）著作，（九）演講，（十）雜著，（十一）剪報，（十二）雜檔等。同年3月將本檔案中最完整而極具史料價值的日記部分，影印出版，名《王世杰日記手稿本》，共分十冊（79年3月出版），做為王世杰先生百年冥誕之紀念。

錢思亮檔於民國72年10月，由其長公子錢純先生送達本所。本所亦隨即派請同仁進行初步整編，並完成《錢思亮先生檔案目錄》初稿。內容大致分為二十大類：（一）院士會議，（二）美國分區院士會議，（三）評議會，（四）院務會議，（五）設立新研究所案，（六）學術會議，（七）紀念會，（八）立法院質詢，（九）教育會議，（十）徐氏基金會，（十一）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十二）出席證，（十三）函稿，（十四）聘書，（十五）信札，（十六）講演，（十七）著作，（十八）實物（已

---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約用助理

於75年12月移交化學所錢思亮先生紀念室珍藏），（十九）相片，（二十）雜檔。

朱家驊檔在院史室中佔最大部分，於民國52年由本所故所長郭廷以先生洽商朱夫人王文淵女士送本所保管。朱家驊先生之重要言論稿，已由前所長王聿均先生與孫斌先生合編成《朱家驊先生言論集》（66年5月出版）一書。而本檔中有關韓國獨立運動資料，亦已出版為《國民政府與韓國獨立運動史料》（77年6月出版）一書。

朱家驊檔案的整編工作，目前仍在持續進行中。編目大致依他所擔任職務之先後，所關涉事務之類別分為：（一）交通部長，（二）浙江省政府主席，（三）參事室主任，（四）中央黨部秘書長，（五）中央調查統計局局長，（六）組織部部長，（七）中央研究院院長，（八）考試院副院長，（九）教育部長，（十）行政院副院長，（十一）總統府資政，（十二）黨務（包括各省、市、路、軍、海員、學校等黨務、黨務言論、海外黨務等），（十三）政黨，（十四）學術，（十五）教育（包括各大、中、小學教育），（十六）言論，（十七）故宮古物、中央圖書館遷移，（十八）民意代表選舉，（十九）人事資料名冊，（二十）邊疆，（二十一）中國國聯同志會、聯合國中國同志會，（二十二）中德關係，（二十三）中印關係，（二十四）中韓關係，（二十五）中日關係，（二十六）聘任，（二十七）酬酢，（二十八）洋文雜件，（二十九）出版雜件，（三十）人才人事，（三十一）雜項等（詳請參閱王聿均先生在《朱家驊先生言論集》中所撰之〈緣起〉）。

在朱家驊檔案中，還有一部分中英庚款會檔：民國20年4月8日，「管理中庚庚款董事會」正式成立，隸屬於行政院，以朱家驊先生任董事長。32年，中英平等新約簽訂後，該會更名為「中英文教基金董事會」，仍隸行政院，並由朱先生繼續任董事長，主持會務。38年，該會之印信及檔案全部運來台灣。在移交本所部分，其內容大致分為：（一）總類（包括董事人名錄、人事任用、銓敘與證明、員工薪餉計算表、生活補助費、會址建築設備、租用房屋契約、宿舍工程施工說明書圖表、會所建築費支付書、京渝總發文簿等），（二）會議（包括庚款會半年刊、購料會年刊、庚款聯會會議卷、董事會、常務董事、教育委員會、技術委員會、財務委員會、事務所、公債基金保管會會議紀錄等），（三）財務（包括各機關購料卷、借款契約、借款預算書、息金用途支配標準、息金明細表、公債、與銀行



來往函件及送金存根、資產負債表、收支月報表、概算書、收支概算表、經費決算書等等），（四）文教補助（包括文教基金會日記帳、補助教育文化事業費明細分類帳、補助各大學、學術機關撥款簽呈卷、留學生經費、歷屆留英生回國就業一覽表、中國文化教育建設會通訊等），（五）會計師查帳（包括行政院訓令會計事宜、會計師查核年度概算書、年度會計報表底冊、查帳報告書、款字信貸案等），共計98函。

此外，尚有五大木箱中英文教基金會檔案，一直放在本院總辦事處倉庫之舊報紙堆中，經本所研究員陶英惠先生（時奉調兼任秘書組主任）發現後，深恐這些寶貴資料如被當作廢紙丟棄，將是無可彌補的損失，乃簽請院長准予移交本所保管、整理，供作研究之用。於民國76年11月16日運至本所，近期將著手整理、編目。

至於院務雜檔則有院史資料剪報、院務會議、評議會紀錄、院士會議籌備情形及各所工作報告、各所人事資料、合作社資料等等。<sup>1</sup>來台之後的院史資料，在本院總辦事處秘書組闢有檔案室，可供查閱。

<sup>1</sup> 遷台以前的院史資料，藏於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計有2,667卷。主要內容分為：（一）總類，（二）學術評議，（三）國際學術交流，（四）自然科學研究，（五）社會科學研究。中研院首任院長蔡元培先生的個人檔案，共有421卷，主要內容分為：（一）黨政機關的文件，（二）文化、教育與科研機構的文件，（三）函電與稿本（詳請參閱《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簡明指南》，第三章，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檔案，二一，〈中央研究院〉，全宗號393；第五章，人物檔案，一二，〈蔡元培〉，全宗號3034）。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之(76)

### 從變亂到軍省：廣西的初期現代化，1860-1937

朱宏源著

614頁 平裝500元 精裝550元

作者以新創的四民分析法，細部探討中國的一個區域——廣西，從十九世紀中葉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在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四個面向上的變化。本書不只提供有關廣西現代化初期的詳情，而且更能澄清若干習焉不察的刻板印象。其中包括對「現代化」與「衝擊」的重新解釋，對經濟決定論與「社會——國家對立」論的批駁。

# 四川及廣東省市檔案館簡介

楊翠華\*

四川全省有311個檔案館（包括省、縣、市、區綜合檔案館，以及其他企業、專業等專門檔案館），四川省檔案館是省級綜合檔案館，位於成都市西城區花牌坊街。新館落成於1988年，佔地25畝，可容納檔案300萬卷冊。目前館藏量計有120餘萬卷冊，佔全省綜合檔案藏量之四分之一，館藏量之大，列全國省級檔案館前茅。

其中清代檔案有11餘萬卷，主要是清代巴縣檔案。上自乾隆22年（1757年），下迄宣統3年（1911年），跨時154年，相當完整的記載了巴縣內政、外交、財政、經濟、文化、軍事、司法、文教衛生等狀況，不但是研究巴縣歷史的第一手資料，更是研究清代四川及西南地區歷史以及重慶城市發展史的重要史料。由於清代地方政府檔案奇缺，而這份檔案正足以反映清代地方政府的一個縮影，再加上涉時久遠，數量眾多，內容豐富，史料價值益形珍貴，大陸及海外學者利用這些檔案者也特別多。四川省檔案館也在開放檔案的政策下，在巴縣檔案的基礎上，先後編輯了《四川保路運動選編》（1981年）、《四川教案與義和拳檔案》（1985年）、《清代乾嘉道巴縣檔案選編》（1989年）、《清代巴縣檔案匯編—乾隆卷》（1991年）等。

民國時期檔案約有43餘萬卷，包含四川省政府及少量的西康省級機關檔案，內容有四川民政、財政、建設、教育衛生、司法、黨團等機關，以及參議會、防空司令部等檔案，是研究民國時期四川政治、軍事、社會、經濟以及抗日戰爭史的重要史料。1949年以後的檔案佔館藏的大多數，約有65餘萬卷，不但包括了西南大區以及四川省人民政府檔案，同時也涵蓋了中共川陝蘇區革命歷史檔案以及四川省委與各地黨組織檔案。利用這些檔案，四川省檔案館編輯出版了《國民黨追堵紅軍長

---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征檔案史料選編（四川部份）》（1986年）、《川陝蘇區報刊資料選編》（1987年）、《四川工人運動史檔案資料選編》（1988年）、《近代康區檔案選編》（1990年）等。此外，有關該館館藏內容，可參閱《四川省檔案館館藏檔案概述》（1988年）。

成都市檔案館是四川省內第三大檔案館（第一是省檔案館，第二是重慶市），館藏量約有54萬卷冊，加上檔案資料約4萬卷，佔全國省級檔案館之第八位。十六層樓高的新館於1992年落成，可容納檔案100萬卷。館藏內容包羅了清代以來三百多年成都市發展的各方面，尤其是民國時期的檔案約有15萬卷，乃成都近現代政權機構、黨派社團、工商經濟、市政建設、文化民俗以及重大歷史事件的原始史料，系統相當完整。該館是市政府領導下的文化事業機構，基本任務是負責成都市現行文書的歸檔管理工作，倡導檢查各部門的建檔管理工作。各機關具有永久性、長期保存價值的檔案，於五~二十年後，送檔案館保存。根據檔案法的規定，該館正著手將屆滿三十年的檔案分批向社會開放。除了開放檔案以外，該館亦不定期舉辦展覽，例如：成都市近現代檔案史料展、館藏票記展覽、外事禮品展，抗戰五十週年展等等，因此成都市委命之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此外，該館亦開辦檔案人才培訓班，每年約培訓來自鄉鎮、市縣的檔案人員200~300人，主要在學習國家、省市的檔案標準規範，以及檔案現代化的新知識。館內亦設有編輯研究科，吸收大學歷史系、檔案專業的畢業生，編輯《30~40年代成都市金融檔案》、《七七事變與川軍抗戰》、《成都市政建設》等史料選輯。

廣東省檔案館位於廣東省委辦公廳內，現有編制60人，目前正計劃遷建新館。館藏檔案約10萬卷，其中海關檔約有1萬卷左右，民國檔案則有5萬餘卷。館藏量少的原因，一部份是因為民國時期完整的省政府檔案下落不明，一部份是因為檔案館面積狹小，無法收藏。因此1949年以後的檔案僅接收至1968年，預計三、五年後新館落成時，再徵收各機關已登錄而未建檔的檔案。該館為配合國內各項運動、政策，開放給社會大眾利用，尤其在1983至1986年間，利用者最多。一來是因為全省編史修志的高潮，二來是文化革命以後，為落實知識分子平反政策，到館查閱學歷、政治運動問題檔案者不少。該館檔案藏量雖少，資料卻達20萬卷冊，大部份是1949年以後的圖書和報紙。廣東省內各機關各地方的出版品（包括地方史誌），均贈送檔案館典藏。該館也編輯出版了《民國時

期廣東省政府檔案史料選編，1925~1949》(11冊)、《廣東革命歷史文件彙集》(70本)、《中山艦事件》等史料選輯。同時也計劃與新加坡檔案館進行合作交流，展開有關華僑資料的縮微拷貝工作，將來可能對外發行。

廣州市檔案館是廣州市政府領導之下的事業單位，1959年開創，1987年遷入新館，現有編制65人，館藏檔案24萬卷冊。其中民國檔案有8萬餘卷，包羅了自1921年廣州市政府建立開始的檔案。但是檔案並不完整，抗戰時期廣州淪陷，汪偽政權時期的檔案完全缺漏，而且1949年以前，部份廣州市政府檔案被運往海南島，卻遭燒燬之厄運，因此現存檔案多屬事務性文件，有關廣州市之重大決策檔案已不可考。至於1949年以後之檔案，則有12萬卷，包括撤銷了的黨政機關檔案以及每十年接收一次的現行機關檔案，此外還有科技、會計、企業等專業檔案。自1988年開放部份屆滿三十年的檔案以來，僅有171人次至該館查閱，除了查訪學經歷、某些特定社會事件以外，一些透過中山大學在廣州做研究的外籍或港澳台學者、學生，也利用該館檔案，進行「廣州水上居民之搬遷」、「民國時期廣州市政建設」、「廣州紡織等輕工業之發展」等研究課題。該館除了負責根據各單位彙送的報紙、內部文件，每月編輯大事記，供廣州市政府與市委參考以外，亦負有監督指導中外合資企業及境外企業的檔案管理之責。同時該館編研處也計劃出版一些專題性的史料選編，例如《民國時期廣州市政策、法令彙編》、《廣州市工業、市政發展狀況》等。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目錄彙編二種

#### (4) 海內外圖書館收藏有關婦女研究中文期刊聯合目錄

精裝400元 平裝300元

本目錄以海內外162所圖書館收藏有關婦女問題之中文期刊為收錄對象，計收錄文獻2,775筆，期刊671種。

#### (5) 近代中國婦女史中文資料目錄

精裝1000元 平裝900元

本目錄收錄有關自17世紀迄今，海內外討論婦女問題的中文書籍、學位論文及期刊文章，共收錄13,533筆資料。

# 西藏自治區檔案館館藏檔案資料述略\*

卓 嘎\*\*

西藏自治區檔案館是保存我國地方古代歷史檔案最豐富的檔案館之一，是國家檔案寶庫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其館藏檔案真實地記錄和反映了自古生息在西藏雪域高原的藏族先民在這片古老、神秘、地域遼闊、山川壯麗、資源豐富、自然氣候獨特的土地上，創造出的別具一格、光輝燦爛的藏民族文化歷程。折射出西藏地區政治、經濟、文化發展、演變的歷史，它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之奇珍，也是世界文明寶庫中的瑰寶。

## 一、館藏歷史檔案的特點

同內地的歷史檔案相比，西藏的歷史檔案是在一種特殊的地域環境和特殊的文化背景下產生的，因而具有其自身獨特的地方。所以在介紹我館館藏檔案時，著重談一談藏文歷史檔案的特點。

### (一)藏文歷史檔案數量浩繁

作為集中統一管理西藏檔案的重要基地，西藏自治區檔案館現館藏以藏文為主的舊政權等檔案，共120多個全宗，300多萬卷（冊）。這些檔案包括幾十份元代檔案，上萬卷（冊）明代檔案，二百多萬卷（冊）清代檔案，六、七十萬卷（冊）民國時期的檔案。如按1985年國家公布的全國歷史檔案總量為1450萬卷的統計數計算，本館館藏的歷史檔案就超過了五分之一，可以說除了漢文檔案以外，高踞其他少數民族文字檔

---

\* 本文原係卓嘎局長提交1995年8月9日至11日在拉薩舉行「西藏檔案國際研討會」的報告，可說是西藏檔案館庫藏資料的首次公開，對西藏歷史的研究，極具參考價值。茲徵得卓局長的同意予以刊出，以饗讀者。唯因限於篇幅，作了部份的刪節，謹向作者、讀者致歉。

\*\* 現任西藏自治區檔案局長、館長

案之首。由此可見館藏的藏文歷史檔案數量是十分豐富的。至於拉薩市、日喀則、山南、阿里、昌都等地檔案部門、文物部門、各大寺廟以及散存於民間的歷史檔案數量，也相當可觀。這就說明我們今後徵集、收集歷史檔案的任務依然非常繁重。

## (二)館藏歷史檔案的文種多

館藏檔案的文種以藏文爲主，尚有八思巴文、漢文、滿文、蒙文、阿拉伯文、印地文、尼泊爾文、英文、俄文等十餘種文字。

## (三)館藏歷史檔案的載體形式多樣，規格不一

館藏歷史檔案主要是紙質檔案，其他還有縑帛檔案、木質檔案、葉質檔案、金質檔案、石質檔案等載體檔案。紙質檔案主要以藏紙爲載體，藏紙除以樹皮爲製成材料外，一般以生長在日喀則和尼木地區一帶的狼毒草的草皮和根部作爲原料，用傳統手工技術製作而成。這種藏紙不易被蟲蛀、手感好、富有纖維、堅韌耐揉。字跡多用質地很好的藏墨書寫，經久不變。也有不少用金、銀、銅、朱砂、珊瑚、翡翠、珍珠等粉末調製後，書寫於磁青紙面、裝幀富麗典雅，可謂珍本。這些紙質檔案大小、長短、薄厚不一。即有長達366.6米的超長檔案，也有僅7、8公分的微型檔案。縑帛檔案，除了書寫重要檔案內容外，還有一部份是繪畫和繡製品，俗稱西藏唐嘎。木質檔案與古代甲骨文、金文、石刻、木牘和竹簡檔案的刻寫方式一樣，是把藏族先民的社會活動和名人專著刻在質地優良的核桃木板上的文字記錄。這些木質檔案工藝精細，形式多樣，規格不一。葉質檔案主要指貝葉經，是用墨書寫於古代多羅樹樹葉上的古梵文檔案，是罕見的奇珍。

## (四)館藏歷史檔案年代久遠、內容廣泛

目前國內歷史檔案主要是明朝以後的，明朝以前的歷史檔案雖然也有，但不成完整系統，而我館館藏的藏文歷史檔案，僅從已整理的一百多萬卷（冊）來看，其時間跨度長達七百多年，內容也較爲完整，且自成系統。元朝（西藏地方薩迦王朝時期）檔案中有八思巴文蒙古語皇帝聖旨、古藏文皇帝帝師法旨和古藏文宣慰使文告等。其中也有孫鐵木爾皇帝冊封斡節兒堅贊爲朵甘軍民萬戶府萬戶長的聖旨。有1321年貢嘎羅

追堅贊貝桑布帝師遵皇帝聖旨冊封旺杰爲千戶長的法旨等。

明朝（西藏地方噶舉派法王帕木竹巴時期）所形成的藏文檔案反映了明襲元制，行使對吐蕃地方的主權，支持噶舉派，並採取了「多封眾建」、「朝貢賞賜」、「茶馬互市」等特殊政策。檔案中有明太祖朱元璋1373年（洪武六年）設俄力思（今阿里地區）軍民元帥府並封搠思公失監的詔書；有明永樂皇帝、宣德皇帝、正統皇帝、成化皇帝等頒發給西藏帕木竹巴地方政權的漢文、藏文、蒙文三種文字的敕諭和詔書等。

清朝（西藏地方噶丹頗章政權時期）的藏文檔案。清朝皇帝頒發給達賴喇嘛、班禪、攝政等政教首領的漢、滿、蒙、藏四種文字的敕諭和詔書比明朝更多，其內容更爲豐富。有清順治皇帝（1652年）給五世達賴的敕諭等有關文件；有康熙39年（藏曆鐵龍年，公元1700年）塔布地區發生地震的藏文歷史檔案，其中具體記載描述了地震的方位、徵兆及破壞程度；有康熙52年（1713年）第五世班禪被封「班禪額爾德尼」的詔書；有康熙59年（1720年）清軍分由青、康兩路入藏，擊敗準噶爾軍隊以及依照定制舉行第七世達賴喇嘛坐床大典並賜「宏法覺眾」封號的文件；有雍正元年（1723年）賜七世達賴喇嘛金印、金冊（印上銘文爲「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喇恒喇達賴喇嘛印」）的詔書；有乾隆16年（1751年）欽命創設噶廈公所的有關文件；有乾隆22年欽命創設達賴喇嘛未親政時的「攝政」制度的文件；有乾隆57年（藏曆水牛年，公元1792年）制定的治藏章程，即後來所說的《欽定二十九條章程》，此份藏文檔案原件中記載了關於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等大活佛轉世、駐藏大臣的職責和權限、任免噶倫、代本、孜本等官職、稅收差徭的徵發攤派等事項。各種制度都以文字的形式固定下來，並頒於噶廈地方政府，飭令地方各級官員遵行。在此後的一百多年中，除個別條款的修訂外，西藏地方事務原則一直是遵循「二十九條」章程規定處理的。嘉慶皇帝到宣統皇帝期間，亦形成了大量內容廣泛的檔案。在這裡特別需要強調指出的是，道光10年（藏曆鐵虎年，公元1830年）駐藏大臣會同西藏地方政府組織要員對西藏的衛、藏地區貴族、寺廟和政府各自所佔有的土地、奴隸、牲畜、差賦進行全面而詳實的清查登記。這就是西藏歷史上著名的《鐵虎清冊》，藏語稱《Lcjaks Sdak Kshib Shung》。還有大量的檔案反映舊西藏廣大農奴沒有人身自由的事實。如：藏曆土虎年（公元1938年）拉薩貴族、七品官頓珠巴云，將自家女

奴朗吉卓嘎換取地方政府的農奴尼瑪頓珠父子之事，呈送噶廈政府的報告，以及攝政同意這一農奴交換的批覆文件，這些檔案充分說明了舊西藏農奴主可以把農奴轉讓、交換、抵押給其他領主的真實記錄。

這些檔案對研究「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社會的生產關係和社會結構，具有十分重要的參考價值。

民國時期檔案有蔣介石給達賴喇嘛的親筆信；有藏曆水雞年（公元1933年10月10日）十三世達賴喇嘛圓寂、國民政府追封十三世達賴喇嘛為「護國弘化普慈圓覺大師」的冊封文書；有西藏地方政府先後在北京、南京、重慶等地設辦事機構，加強與民國政府聯繫的文件等。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檔案，有毛主席、周恩來總理、朱德總司令等領導給達賴喇嘛的親筆信和達賴喇嘛給毛主席的頌詞；有《中央人民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十七條協議》的漢、藏兩種文本原件等。

西藏檔案與內地不同，藏文歷史檔案往往是一文多事，除了記載和反映上述不同側面的內容之外，大量的檔案記錄和涉及了數百年間舊西藏的政治、經濟、軍事、科學、文化、宗教、法律等內容，包羅萬象，無所不有。

### （五）館藏大量古典藏文圖書資料

有各個歷史時期西藏著名的佛學家、歷史學家、醫學家、文學家、政治家、藝術家所撰寫的典籍。它包括佛學、歷史文學、星象學、曆算學、藏文文法學、醫藥學、聲明學、工藝學、建築學、因明學、藏戲、舞蹈、音樂以及名人個人全集、傳記、小說、故事等作品，題材廣泛，具有政教合一的特點和濃厚的民族特色。在上述藏文經典中，一部份為孤本、珍本。有苯教經典、《蓮花生傳·如意樹》、手抄本《大藏經》、《怖畏金剛法源》、《嘎當師徒問道錄》、《印度宗教源流》、《梵藏對照聲明學論》、《大般若經》、《五部陀羅尼經》、《寶積經》、《五世達賴喇嘛傳》、《六世達賴喇嘛傳》、《七世達賴喇嘛傳》、《頗羅雍傳》、《多仁班智達傳》、《顯示取舍之清明晶鑒》、《十三世達賴喇嘛傳》、《漢地天花治療法》、《詩學明鏡》等等，這些典籍如同一部藏族的百科全書，反映了西藏歷史發展的各個方面，對藏學研究等參考價值甚大。



### (六)藏文歷史檔案的傳統保管方法有其特色

歷史檔案保存形式以卷疊為主。封號、冊文、典章、戒律等重要檔案書寫在黃緞子上。兩頭夾軸，既可掛，也可捲放。有的寫在優質的藏紙上，然後用紅、黃、藍各色綢子和上等布以手工托裱，卷疊保存。有的用寬幅的布做成長短不同的插袋，每個插袋裡用細線縫好留出若干寬約10厘米左右的格子，每個格裡插進一兩份文件，然後按藏文數字編好順序號，捲成一個大卷，放入木、竹、金屬、牛羊皮做的箱子裡進行保存。一般的藏文歷史檔案捲疊好後用各色布包好，其文件內容提要寫在包布上，便於查找。內地所用檔案包裝卷皮、卷盒難以用上。藏文經典以張、頁為主，張頁兩面都寫有文字，每部經典著作均按藏文字母分函編目，用紅、黃綢子包嚴後，夾在特製的優質核桃木板中，然後用黃色寬帶子捆好放在網格式的木架上。此外還有不少的兵冊、戶籍、簿冊、印譜、清冊、日記等裝訂成冊，放入精製的木盒、金屬盒等特殊裝具中，不再一一列舉。總之，大量年代久遠、系統完整的古代藏文歷史檔案之所以能夠保存下來，是同前人積累的獨特檔案保護技術有直接關係的，這方面的豐富經驗，很有借鑒意義。

## 二、開發利用檔案資源

我館館藏的藏文歷史檔案，不僅是藏族人民歷史的原始記錄，而且是藏民族這一人類群體的經驗和智慧的結晶。這些檔案不同於其他一般的歷史遺物，它具有很強的憑證作用和很高的查考價值。爲了開發利用這些檔案信息資源，三十多年來我們不斷加強了檔案的各項工作，積極爲科研單位、大專院校、黨政機關、群眾團體、工礦企業等單位，提供了大量的歷史檔案，利用者達數萬人次。利用檔案的內容涉及爲領導編寫個人傳記或文章材料，中外邊界、中外關係、農牧業、財經金融、草山爭端、農墾水利、天文氣象、醫藥衛生、房產爭執、交通運輸、築路架橋以及舊西藏農奴人權狀況查考等問題，取得了較好的成效。

我們在完成上述工作的同時，進一步加強了編研出版工作。我們認爲，編研出版工作不僅是開放利用檔案的重要方式之一，而且是保護檔案原件、最大限度地延長其壽命的重要方法。因此，我們先後編纂出版

了《西藏地震檔案史料匯編》、《西藏與祖國關係史料匯編》、《西藏歷史檔案薈萃》、《寺廟戒律匯編》、《鐵虎清冊》、西藏歷史檔案叢書等。同時，提供底本鉛印出版了《道次師承傳》、《五世達賴喇嘛傳》、《六世達賴喇嘛傳》、《七世達賴喇嘛傳》、《多仁家族史》、《大司徒降曲堅贊遺教》、《甘珠爾目錄略部》、《竹巴袞烈傳》、《西藏通覽》、《書信常識》等圖書。

我館館藏檔案的文種是以古藏文為主（約佔95%以上），把這些檔案整理編目出來，已是很艱難的任務，再將檔案翻譯成其它文種，工作量更是十分繁重。但爲了進一步挖掘藏文歷史檔案資料，充分發揮檔案效益，使檔案信息資源社會化，我們做了大量的翻譯工作，把部份重要檔案的目錄翻譯成漢文，向社會提供利用。同時，我們發揮館藏檔案優勢，舉辦了專題檔案展覽，這是藏文歷史檔案集中、迅速、直接向社會各界做宣傳的一種嘗試，取得了顯著效果。我們舉辦「歷史的縮影和結論」檔案陳列室以來，先後接待了來自歐洲議會、英、法、義、日及港、澳、台等二十幾個國家和地區的專家、學者、政府官員、外交人士、新聞記者數百人次。接待了中央代表團、西藏自治區人大代表、政協代表以及全區各種會議代表和學生數千名，前來參觀的國內外貴賓普遍認爲，舉辦檔案陳列很成功，很有說服力。

總之，我們在檔案管理和開發利用方面，作了大量艱苦細緻的工作，付出了不少心血。同時，國家也非常重視西藏檔案工作，並爲之在人、財、物方面給予了大力支持。但是面對如此浩瀚的檔案海洋，面對如此獨具特色的民族檔案，面對保管和利用如此珍貴檔案的重任，我們感到力不從心，主要還是因爲缺少人力和財力。我們缺少大量的專業人員，如果僅現有的人員把現存的歷史檔案規範化整理，需近百年，如果規範化保管這些檔案需將現有的庫房和裝具擴大和增加兩倍。這種培訓人才、擴大庫房建設等急需的是大量的資金，而在國家還不富裕、經濟還相對落後的情況下，超越現實的投資是不可能的。這就要求我們檔案工作者在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努力工作的基礎上，積極爭取外援，爭取社會方方面面的支持。保護和搶救藏文歷史檔案，不僅僅是西藏的事，也不僅僅是中國的事，而應該引起全世界的重視，因爲藏民族文化遺產是整個人類文化寶庫的重要組成部份。

#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現藏國軍檔案概況

陳天民\*

## 一、前言

提起國內軍事史的提倡與研究，便不能忽視國防部史政編譯局（以下簡稱「史編局」）的重要性。但是，史編局對史學界而言，仍是個相當陌生的地方。史學界固然久知史編局所藏國軍檔案之豐富及其史料價值，然而對於難窺其堂奧，終不免耿耿於懷。

事實上，史編局有其光榮的歷史傳承；其所珍藏國軍檔案，亦有其一定的管理借閱程序，絕非如外界所認為的那般保守、封閉。為澄清外界對史編局之誤解，並對其歷史暨所藏檔案，能有進一步的認識，本文擬就其歷史沿革、局藏檔案概況及相關借閱規定，稍作介紹，期能於史料提供、史學研究上，有所助益。

## 二、史編局簡史

### （一）、設立沿革

史編局事實上是「史政局」和「編譯局」兩個不相統屬機構的合併。史政局的前身，最早可追溯至北伐時期軍事委員會參謀廳所設的「軍事編纂委員會」，以編纂軍事史籍和蒐集北伐戰史為主要職責。<sup>1</sup>江西剿共時期，於南昌行營第一廳設「剿匪戰史編纂處」，負責剿匪戰史之編纂。迨抗戰軍興，國軍的史政機構並未因此而中斷。民國28年，除在軍令部第一廳第四處下設有「戰史科」以掌理國軍史政業務外，另設有「戰史編纂委

\*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史政官，現就讀於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班

<sup>1</sup>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沿革史》（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77年），第一章，頁1。

員會」，專司抗日戰史之編纂工作，其組織規模、編制員額之眾，為國軍史政機構設立以來最完備的時期。<sup>2</sup>抗戰勝利後，各級組織均開始縮編，國軍的史政機構亦相繼緊縮。民國35年6月國防部成立，軍令部戰史編纂委員會改組為「史料局」，首任局長為吳石中將；36年4月正名為「史政局」。民國38年11月遷渝，再改為「史政處」，組織更形縮小。39年來台後，業務暫受「戰略計畫委員會」指導，至民國45年1月始脫離戰略計畫委員會，直屬於參謀總長。46年4月，第十二次軍事會談，奉先總統蔣公指示：「加強史政機構」，方由「史政處」改為「史政局」。<sup>3</sup>

至於國軍編譯業務，早於民國24年5月，即在當時參謀本部第二廳戰史編纂處設「編譯股」，負責國際戰史之編譯工作。<sup>4</sup>民國25年，並於當時軍事委員會辦公廳第四處設「編譯科」，負責中西參考書報及文書之編譯。至35年夏，則由國防部第五廳第六組主管軍事基本書籍與美軍軍事基本書籍之編印業務。47年以後，又改由「聯合作業研究督察委員會」接掌。迨59年2月，奉先總統蔣公「重視軍事書籍編譯，加強編譯工作人員」之指示，成立編譯局，以掌理國軍軍事書籍之編譯工作。<sup>5</sup>

民國62年5月1日，國防部為實施組織精簡方案，乃將「史政」、「編譯」兩局合為「史政編譯局」迄今。《參見附件一》

## （二）、現行組織概要

在史編局草創初期，其組織、職掌各方面，頗受美國史政體系的影響。尤其是在「史料局」階段，其二處一室的組織架構和任務職掌，即接受美方建議，採自「美國陸軍部歷史局」的業務大綱。<sup>6</sup>雖然如此，但在史編局因時代變動而演進的過程中，其自身的努力與調適，更不容忽視。尤其在歷任主官的慘澹經營及現任局長傅應川中將的領導下，對於軍事史研究的開展和國軍檔案、文物的整理，皆正邁向更光明的遠景。

本局現有人員七十餘人，局長室下轄五個單位。在貴陽大樓局本部內辦公的有三個單位：第一組，負責計畫、綜合、政戰、行政等事務；第二組，負責軍（戰）史編纂及史政政策；第三組，負責軍事書籍編譯、軍事

2 史政編譯局局藏國軍檔案，《軍令部戰史編纂委員會大事記》，檔號157/3750.2。

3 同註1。

4 同註2。

5 同註1。

6 史政編譯局局藏國軍檔案，《史政局組織職掌編制案（一）》，檔號581.1/5004。

刊物發行工作。在外圍有二個單位：一為國軍歷史文物管理組（簡稱史管組），負責國軍永久檔案、文物、圖書管理，史蹟陳展及隊史館業務；一為國民革命忠烈祠管理組（簡稱忠管組），負責烈士入祠祭典、祠園管理等相關事宜。

現行本局編組有兩點值得一提。第一，本局之編組將史政與編譯合一，這是沿用「戰史編纂委員會」之編組精神。其間雖時分時合，但是史政與編譯之結合確有需要。<sup>7</sup>例如本局出版的軍事史書籍，包括外國戰史與軍事理論之研究等。這些出版品有許多都借助翻譯部門，單獨的史政部門則不易為功。第二，史管組今天的業務已經使之成為文物、圖書、檔案之統合管理單位，期能於組織型態上，追求具備現代史館之基本功能。

### 三、局藏檔案概況

外界對史編局最感興趣的，莫過於所藏國軍檔案現況。眾所周知，史編局珍藏有數量豐富且史料價值極高的軍事史方面的檔案。但事實上，史編局所藏的檔案，實不限於軍事史方面，其所涵蓋的範圍和層面，皆相當廣泛，值得史學界挖掘、重視。以下僅就檔案概況及重要檔案舉隅兩部分，稍作介紹，以窺其大要。

#### （一）、檔案概況

本局幾經輾轉播遷，其在大陸時期所蒐藏的檔案資料，一部分留在大陸，為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所收藏，共計9170卷，文件所屬年代為民國14年至38年間。<sup>8</sup>民國57年以來，本局負責接管各軍種單位移轉來的檔案，加上本局既有的檔案，設「國軍檔案中心」統籌管理。國軍檔案中心負責接管國防部各聯參單位及各軍總部移轉結案滿十年，在行政上已過時效，經鑑定具有史料參證或法律信證價值，需永久保存之案卷，經編製成冊後典藏，備供查證或史籍編纂參考用。

截至民國83年底止，本局現典藏檔案數總計47537卷，《參見附件二》分藏於博二大樓和木柵指南山莊庫房，主要內容如下：

<sup>7</sup> 傅應川，《國軍的史政體系與軍事史研究》演講稿，民國83年12月14日於政大史研所；另參見註2。

<sup>8</sup> 施宜岑、趙銘忠主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簡明指南》（北京，檔案出版社，1987），頁94-96。

- (一)國軍之沿革史、年鑑與要案紀實等檔案，共計4914卷。其內容有：
- 1.《沿革史》部分，數量最多，計4648卷。主要包括陸、海、空軍、聯勤等各單位之沿革歷史。其中以陸軍最完整，計1147卷，約佔四分之一。
  - 2.《年鑑》部分，計192卷。主要包括國防部、陸、海、空軍、聯勤等單位每年的重要工作紀錄。
  - 3.《要案紀實》部分，計174卷。包括重大演訓，計30卷；重大戰役計9卷；重大工程計14卷；其他要案計21卷。為國軍建軍備戰，最直接、原始之史料。
- (二)戰史資料：
- 1.主要有各軍事機關、部隊呈報之戰鬥詳報、陣中日記、大事紀要、作戰及整訓日記，以及史政單位徵集的作戰計畫、工作報告、會議記錄與來往文電、私人回憶錄、剪報等原始史料。
  - 2.有關北伐、剿共、抗日、戡亂等重大戰役史料，此類檔案數量亦不少。
  - 3.另外本局歷年蒐整編纂之中外戰史書籍計約378項，578冊。
- (三)重要將領檔案：
- 1.包括何應欽、顧祝同、陳誠、黃杰、王叔銘、余漢謀、蔣鼎文、胡璉等將領，共計782卷。
  - 2.其中以顧祝同將軍的資料最完備。其一生與國民革命之重大經歷與事蹟，皆完整地移轉給本局，計104卷。
  - 3.其他以回憶錄原件居多。
- (四)各重要單位工作報告及會議紀錄：
- 1.軍事委員會、軍令部、軍政部等年度工作報告暨重要會議紀錄。
  - 2.國民參政會、國民大會、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中央執行委員會等，有關軍事部分之報告。
- (五)其他：
- 1.南海諸島嶼，包括東、西、南沙群島的史料，計98卷。
  - 2.有關戰後接收與復員的史料，計142卷。
  - 3.有關漢奸、戰犯、叛亂、貪污等方面的檔案，計267卷。
  - 4.來臺後的建軍備戰與美國軍事援助等檔案，數量亦多。

以上乃針對本局檔案所作的面的觀察。事實上，本局所編《國軍檔案目錄彙編》第一輯，幾將全部檔案，依國軍檔案分類法，提供更完整的目錄索引，給各單位極大的便利。<sup>9</sup>惟現有國軍檔案分類法，固然涵蓋面廣，且便於國軍各單位檔案之移轉，但尚不能滿足史學研究工作者的需求。本文僅再就移轉單位、分類性質兩方面稍加補充，應有助於對本局檔案的瞭解與應用。《參見附件二、三》

- (一)由移轉單位來看，以總辦室移轉來的檔案數量最多，共計10993卷。幾佔本局總檔案數的四分之一；其次為本局既有的檔案。
- (二)由分類性質來看，其中以人事類所佔的比例最高，約佔十分之三；其次依序為行政類、作戰類。

以上乃就局藏檔案現況，從移轉單位和分類性質兩方面所作的分析。以下再將本局檔案，依「時間 限」來觀察，當更能看出其特色與價值所在：

《附表一》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局藏檔案概況							
時 期	清末——1949					1950迄今	合 計
	清末— 1911	1912— 1928	1929— 1937.7	1937.8— 1945	1946— 1949		
卷 數	40	150	1315	2986	7035	33423	44949
小 計	11526					33423	44949
百分比	25%					約75%	100%
備 考	依據《國軍檔案目錄彙編》第一輯，民國82年3月。						

- (一)本局檔案以民國38年以後的檔案居多，共計33423卷，佔本局總檔案數的四分之三；民國38年以前的檔案數計11526卷，約佔四分之一。
- (二)再就民國38年以前的檔案稍作分析，可知以戡亂前期（1946-1949年）的檔案最多，約佔此時期檔案數的十分之六，其次為抗戰時期。<sup>10</sup>

綜觀本局檔案，基本上仍以軍事史方面的檔案佔大多數。另一方面，抗戰

<sup>9</sup>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國軍檔案目錄彙編（第一輯）》（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82年）。

<sup>10</sup> 民國38年以後的檔案，由於數量太多，且不在開放之列，本文暫不作分析。

前的檔案數量較少，尤其以北伐統一前的檔案尤少，這可能是因為此時期大多數檔案還遺留在大陸，未及攜出的緣故。

## (二)、重要檔案舉隅

由於本局所藏檔案數量甚多，本文僅就其中史料價值較高且檔案數較多的主題，稍作介紹，以饗讀者：

(一)《國共軍事調處檔案》：計223卷，文件所屬年代為民國35至36年間。主要內容包括軍事調處執行部的會議記錄、工作報告及有關國、共雙方軍隊整編執行情形和此期間國、共雙方軍隊動態等。

(二)《汪偽政府檔案》：計121卷。包括汪偽與日本之協定、借款，戰後國民政府對汪偽軍隊、資產之接收及汪偽海軍等檔案。其中有關汪偽海軍的資料較完整，計57卷。

(三)《台灣光復初期檔案》：計245卷，文件所屬年代為民國34年至38年。主要內容包括：

- 1.對在台日俘（僑）之處理。
- 2.台灣警備總部、台灣省保安司令部、高雄、基隆要塞司令部等工作報告、會議紀錄。
- 3.戰後台灣地區之接收與復員史料。
- 4.有關日據時代各要塞兵力部署圖及各重要設施史料。

(四)《顧祝同將軍專檔》：計104卷。主要內容為：

- 1.〈抗戰紀實〉，計24卷。包括相關戰役、交通、戰地黨政督導、糧政等資料。
- 2.〈江蘇省主席時期〉，計19卷。包括主政江蘇時期，有關軍政、黨務方面之重要史料。
- 3.〈第三戰區資料〉，計22卷。包括蔣委員長之電令、各種軍事報告、會議紀錄、新四軍案、受降文件等。
- 4.〈陸軍總司令、參謀總長、國防部長時期〉，計24卷。包括此時期之各種意見、報告、文件等。

(五)〈梁氏三兄弟專檔〉：主要為抗戰史料。本局一組前組長趙聚明上校已有專文介紹，茲不贅述。<sup>11</sup>

<sup>11</sup> 請參見《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10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民國79年），頁204-212。



此外，有關我國軍各時期建軍備戰的重要檔案，尤為本局最珍貴的典藏，向為史學界所重視。其中特別是國軍來台後整軍備戰的重要史料及有關美國軍事顧問團的軍援檔案，為數不少，深值吾人重視、探究。

#### 四、檔案的管理與運用

國軍檔案管理與運用，有其法令規章以資依循。依「國軍檔案管理手冊」，檔案管理作業區分為接管、分類、編檔、典藏、防護、借調等項目。現簡要說明本局檔案的管理暨運用情形。

##### （一）、編制

本局設「國軍檔案中心」，統一接管全軍案管單位移轉之檔案，由編階上校之檔管官乙員負責管理。另有聘員二名襄助之，一負責檔案之整理與借調；一負責攝製微卷。

##### （二）、整理與開放

檔案的整理，包括接管、分類編檔、典藏與防護等。各案管單位之「中心案卷」，結案屆滿十年，且連續十年無借調紀錄者，於每年9至12月間，依單位逕移本局國軍檔案中心點收接管。<sup>12</sup>接管後的檔案，本局以原卷保管，並保持原分類為原則，另加國軍檔案封面，編製分類目錄卡以便管理。目前為強化對檔案之維護，不僅於檔案之裱補、縮影，至為積極，且正朝向檔案資訊化管理的方向前進。

至於有關檔案借調的規定如下：

##### （一）一般規定：

本局除對國軍各單位開放借調外，亦對民間機構及外界人士開放。原移轉單位借調檔案，須填具借檔證，由單位主管簽證後向本局檔案中心提出申請，經簽奉核准後始得借調。其他單位借調檔案，須正式備文，說明用途，呈奉核定後再填具借檔證始准借調。至於民間機構及外界人士需借閱檔案者，則依「國軍檔案史料對外公開及借閱規定」辦理。《參見附件四》

##### （二）開放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8時至11時30分，下午1時至4時30分。星期六上

<sup>12</sup> 國防部編印，《國軍檔案管理手冊》（台北，國防部，民國78年），頁40。

午8時至11時30分，下午暨國定假日不開放。

(三)調閱數量：

本局借閱檔案，原則上以提供縮影片為主。每次借閱數量不得超過五件，每次期限不得超過兩個月，期滿如欲續借，應辦理續借手續。

(三)、運用情形

本局檔案主要提供國軍各單位及政府各機關查證之用。因國軍永久檔案本具有史料參證和法律信證之價值，故凡涉及往昔國軍個人權益、身份鑑定等資料查詢，本局檔案多能提供鑑別功能。目前至本局查證之單位，除國軍各單位外，尚包括國史館、監察院、新聞局、教育部、外交部、僑委會等單位，其中仍以國軍各單位查證資料居大多數。<sup>13</sup>

本局檔案同時亦開放給學術界利用。自民國76年始，為提供史學界有效運用本局檔案，並順應未來檔案開放之趨勢，特訂定「國軍檔案史料對外公開及借閱規定」，以擴大適用對象。於是至本局參閱檔案之各界人士日益增多，其中尤以國內外學者及研究生佔大多數。以83年一年的統計人數來說，來局參閱檔案的中外學者、研究生計49人次。其涵蓋地區包括美、加、英、澳、日、韓、新加坡、香港等地。而上述研究學者中仍以借閱有關軍事史方面檔案佔多數，因此而完成學位論文者，亦不乏其人。

惟從上述觀察可知，本局檔案似尚未充分廣泛地為史學界所利用。此固由於史學界對本局檔案缺乏了解之故；另一方面，有關本局檔案開放上的限制，可能亦為原因之一。<sup>14</sup>

(四)、檔案目錄之出版

「國軍檔案目錄」於民國59年出版第一輯，至民國72年止，共計出版八輯，均分發至國軍各單位及史學界供參考運用，惟使用情形並不廣泛。民國82年3月，本局根據國軍檔案中心檔案，編製完成「國軍檔案目錄彙編」第一輯，完整而翔實地將本局現有檔案，依國軍檔案分類法作有系統的整理。總計收錄檔案目錄共44949卷，可謂工程浩大。此後凡各單位移轉入本局之檔案，每隔三至五年，本局會陸續編印檔案目錄出版，以供各界參考。

<sup>13</sup> 自民國81年至83年，本局共支援查證檔案數量計3996卷，其中國軍各單位約3000卷以上，佔四分之三。

<sup>14</sup> 最主要的應為檔案之解密與開放範圍之擴大。

## 五、結論

史編局所藏國軍檔案，為我國建軍備戰最直接最原始的史料。不論就典藏檔案之數量或內容之豐富而言，在軍事史研究上的價值無可置疑。惟檔案本身並不成為歷史，必須由歷史工作者的不斷研究，賦予其生命，才有歷史價值。因此，如何讓史學界廣為研究、運用典藏的史料，發揮檔案的效益，而勿使其束之高閣，實為我國史政機構責無旁貸的責任。另一方面，隨著國內民主政治的發展，帶動社會風氣的自由開放，為因應各方資訊上的需求，軍事史研究亦日益蓬勃。然而，法制的修訂尚跟不上社會發展的腳步，以致保密問題遂成為提供資訊的一大障礙，也因此檔案解密及擴大檔案的開放範圍，將成為我國史政機構日後的努力目標。

〈附件一〉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沿革概要表

北伐時期	安內攘外時期	北伐時期	軍事編纂委員會
民國26年		剿匪(民國23年秋)	剿匪戰史編纂處
		民國24年5月	戰史編纂處
民國27年2月	抗戰及戰後時期	民國27年2月	軍令部戰史編纂處
民國38年		民國28年1月	戰史編纂委員會 (38.4裁撤)
		民國35年6月	史料局
		民國36年4月	史政局
		民國38年10月	史政處
民國39年3月	遷台時期	民國39年3月	史政處 (國防部在台改組)
迄今		民國46年7月	史政局
		民國62年5月	史政編譯局

資料來源：史政編譯局局藏國軍檔案，《軍令部戰史編纂委員會大事紀》，檔號157/3750.2。

〈附件二〉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國軍檔案中心檔案接收一覽表

單位／卷數	57年	58年	59年	60年	61年	62年	63年	64年	65年	66年	67年	68年	69年	70年
總統府									186					
戰略顧問委員會					43									
部本部		102		130										
總辦室	229	74							1213				501	
陸軍總部	606	89		343	222	192	122	151	126	230	350	369	507	464
海軍總部	4102		311		148		178	749		358				
空軍總部	345	101	37	154	134			148		134		400	255	1536
聯勤總部	266	927	2467	61	141	3								
軍管部	226			60										
憲令部	53							40						
雲南反共救國軍							98							
史編局						7867					250		200	149
三軍大學														
政戰學校														
國防醫學院														
中正理工學院														
國防管理學院														
中正預校														
國防語文學校														
統一通信指揮部														
軍法局														
小計	5827	1293	2815	748	688	8062	398	1088	1525	722	600	769	1463	2149

(續前頁)

單位／卷數	71年	72年	73年	74年	75年	76年	77年	78年	79年	80年	81年	82年	83年	合計
總統府														186
戰略顧問委員會														43
部本部				269										501
總辦公室				456					6399		826	450	1169	11317
陸軍總部	273	347		688	562	386		532	163	161	277	385	167	7712
海軍總部							94	206		229	27	29	9	6440
空軍總部	659	290		303		51	969	64		94	134	111	60	5979
聯勤總部					468		121	58			15	4	16	4547
軍管部				168			133		96		17	8	23	731
憲令部											23		70	186
雲南反共救國軍														98
史編局	100	100	200	224	261	10				161	113			9635
三軍大學														0
政戰學校														0
國防醫學院														
中正理工學院											4		2	6
國防管理學院						49								49
中正預校														
國防語文學校														
統一通信指揮部												36		36
軍法局												71		71
小計	1032	737	200	2108	1291	496	1317	860	6658	645	1436	1094	1516	47537

〈附件三〉國軍檔案分類數量統計表（統計時間至82.6.30）

卷數類別	總類	行政	財務經濟	人事	教育	作戰
區分	000	100	200	300	400	500
現有檔案	3,431	9,104	355	10,135	1,317	5,545
卷數類別	交通	後勤	醫務	建築	新檔號	合計
區分	600	700	800	900	01-19	
現有檔案	601	843	38	3,107	10,640	45,116

資料來源：本局國軍檔案中心

#### 〈附件四〉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國軍檔案史料對外公開及借閱規定

一、目的：為期以國民革命軍之光榮史實，提供史學界作有效運用，以達至駁斥共匪篡改歷史之統戰陰謀，並為順應檔案史料開放之趨勢，特訂定本規定。

二、做法：

(一)本規定適用之對象：

- 1.國軍各級史政單位、各級學校需參閱各項檔案史料者。
  - 2.國軍各級編制內人員，有志研究國民革命軍史或已有研究成果者。
  - 3.本局外聘之各項編纂委員會委員。
  - 4.國軍退除役將校，對史學素有研究者。
  - 5.國內（國軍之外）政府機關、公私立學校及民間各史政、政治、社會科學學術研究機構及其所屬人員。
  - 6.國外（自由地區或國家）之史學研究機構及個人。
- 以上1、2項之單位人員通稱對內或國軍內部，3至6項通稱對外、外界、外人。

(二)借調檔案史料手續：

- 1.國軍內部單位借調，依「國軍檔案管理手冊」規定辦理。
- 2.國軍編制內個人借調，由所屬單位具文附個人研究計畫或大

綱，由本局依權責核准。

3. 外界學術研究團體借調，由單位具文，經評議委員會決議後辦理。
4. 監察院為行使調查權暨立法委員因質詢需調閱索借某項檔案資料，經由權責單位長官核准後，可不經評議委員會決議。
5. 外界個人借調檔案史料者，除具備個人研究計畫或大綱外：
  - a. 由所屬學術機構備函推薦。
  - b. 無法獲得單位推薦函之個人，確屬有研究需要者，得填具「申請單」（如附表一）經評議委員會決議供主官裁示後辦理。
  - c. 本局外聘之編纂委員（或戰史會委員）得由所屬組推薦，填具「申請單」，惟借閱檔案、史料之範圍仍須經評議委員會決議。
  - d. 外籍單位及個人除需經有關單位或人員推薦外，先經評議委員會決議，再簽會本部相關單位辦理審查後，憑以決定是否同意借閱。
6. 以上有關借調手續須先行會知本局相關單位。

(三) 檔案史料對外開放之範圍：由評議委員會決議，定期印製目錄，公開發行，未列入目錄者，則不予公開，在未完成決議前，檔案史料之公開原則如下：

1. 戡亂時期（含）以前之檔案史料，非機密性及敏感性者全部公開。
2. 復興基地建軍備戰時期檔案經評議委員會評議後公開。

(四) 前述1.2.項中之檔案史料若屬機密性質者，經評議委員會決議公開後，仍需循行政系統、逐級呈核、核准之權責：

1. 「限閱」級：副局長。
2. 「密」、「機密」：局長。
3. 「極機密」、「絕對機密」：呈副總長核准。

(五) 評議委員會無法及時召開會議時，得以會辦方式代之。

三、個人閱檔應遵守事項：

- (一) 限於本局內指定之地點閱覽。
- (二) 應保持檔卷及史料之完整，不得有挖孔、塗改、污損、抽換、註記、打點、撕頁及增損其內容等行為，亦不得偷攝。

- (三)除機密資料外，一般資料可抄錄或交由本局價印，但嚴禁攜出。
- (四)凡經本局核准依當初寫作計畫發表之論文、報告、著作者，應送副本五份至本局備查與典藏。如對國軍聲譽形象有不利或惡意影響者，本局將行必要之追究處理。
- (五)借閱機密檔案史料者，於奉准後，應先填具「保密切結書」方行借閱，保證人資格：軍職少校（含）以上，文職薦八（含）或七職等（含）以上，教職講師（含）以上。
- (六)進出營區之行動應遵守營區之一切規定。
- (七)不得使用本局之信箱作為個人對外連絡之用。
- (八)借用本局電話亦應遵守電話保密規定。
- (九)閱檔人如有違反上述各項規定者，本局將循法律途徑處理。
- 四、本規定自76年元月1日起實施，未盡事宜得隨時修訂。

資料來源：國防部編印，《國軍檔案管理手冊》，民國78年。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期刊

第五期（日據時期台灣人赴大陸經驗專號之一） 定價450元

本期共分兩部份，第一部份為日據台灣時期，以不同身分，在不同時間赴大陸的台灣人士訪問紀錄，共16篇。包括藍敏、黃清俊、林坤鐘、陳正添、李太平、吳左金、吳金川、楊蘭洲、蔡西坤、謝報、林鳳麟、黃洪瓊音、陳許碧梧、盧昆山、李謹慎、梁許春菊、梁金蘭、梁育明等人之訪談。第二部份為彭孟緝、李天民、侯吉定等三人對戰後台灣的回憶。

第六期（日據時期台灣人赴大陸經驗專號之二） 定價200元

本期共分兩部份，第一部份延續第五期之專題，為台灣人赴大陸之訪問紀錄，包括許顯耀、李佛續、林櫻、戴秀麗、戴秀美、黃順鏗、藍金塗、黃海波、黃順記、吳憲藏等9篇。第二部份為日本群馬大學教授所澤潤先生的訪問經驗談，由政治大學黃紹恒教授翻譯。

函購九折，郵撥帳號1034172-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帳戶



# 〈林獻堂先生日記〉\*的史料價值

許雪姬\*\*

## 一、前言

民國83年10月1日筆者接受「財團法人台灣省台中市素貞興慈會」之委託，執行〈霧峰林家的歷史研究計劃——日治時期篇〉，預計在兩年內完成以林獻堂為中心來建構日治時期霧峰林家的歷史。一星期後，林獻堂先生之長孫林博正先生提供一套〈灌園先生日記〉二十七本，及楊水心女士（林獻堂夫人）1934年的日記一本，<sup>1</sup>做為此一研究最重要的參考資料。林獻堂先生開始寫日記之時可能甚早，<sup>2</sup>但現存者以1927年為最早，惟並不完整；一直到1930年起才開始逐日寫日記。<sup>3</sup>這部日記1946年以前的部分，在1959年葉榮鐘先生開始著手編輯《林獻堂先生紀念集》中的年譜時，向林之長子林攀龍先生借得。1974年葉赴美途經日本時，在東京發現日記六冊，起自1948年迄1955年（即逝世前一年），但生前所見到的日記缺1928、1936、1939、1946、1947，共五年。<sup>4</sup>葉曾託友人影印在日本的日記帶回台灣二次，但皆被台北機場海關沒收。當林博正先生在葉生前向葉索回1946年前的日記時，葉以「這日記是屬於全台灣人民的，不是林博正一人的」為由繼續借用，迨葉先生過世，林博正先

\* 林博正先生為之取名為〈灌園先生日記〉。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sup>1</sup> 林博正先生復於民國84年9月6日提供楊水心女士日記一本，另一本則藏於中研院文哲研究所籌備處，為1942年的日記。見林耀椿，〈霧峰林家贈書整理——兼談林攀龍先生〉，《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三卷第三期，頁59-67。

<sup>2</sup> 葉榮鐘推測可能始於民前1年或民國10年。見葉榮鐘，《台灣人物群像》（台北，帕米爾書店，民國74年），頁47-48。

<sup>3</sup> 〈灌園先生日記〉，1930年1月1日：「昭和四年日記方始完全無缺一日，余之日記能得完全無缺一日者，則自此年始也。」

<sup>4</sup> 《台灣人物群像》，頁45-46。

生才由葉家取回。至於戰後的大部分日記，則由長年追隨林獻堂於日本的秘書林瑞池保存，林博正先生鑒於當時尚未解嚴，先將這部分日記帶到美國，再輾轉運回台灣。以後又在霧峰家中找到幾本，一共二十七本。<sup>5</sup>以現存的日記和葉於1975年撰寫的〈關於林獻堂先生的日記〉一文所載的日記目錄相比，1939年、1946年、1947年並無遺失，但1952、1955年各缺兩個多月。

## 二、林獻堂先生生平

林獻堂諱大椿，號灌園，生於1881年（光緒7年10月22日），父允卿為前清舉人，屬霧峰林家頂厝林奠國系。甲午之役，年方十五，奉父之命率全家四十餘口避難泉州，事平回台。1898年與彰化望族楊晏然先生之長女楊水心女士結婚，1901年任霧峰區長，1911年為台中廳參事。1921年任總督府評議員，後因不滿評議會無議決權，遂向日本帝國請願建設台灣議會，賦與台灣自治。同年與蔣渭水等人組織文化協會展開啓蒙運動喚起民族精神，被選為總理。後因會員中有部分逐漸左傾，1927年乃告分裂為左右兩派。林乃與穩健者另組台灣民眾黨，仍以鼓吹自治、喚起民族精神為宗旨。是年為採取歐美自治之精神做為台灣自治之指南，遂赴歐美遊歷。回台後仍鼓舞民族自治之精神，民智漸開，惟總督府猜忌日甚，遂於1930年解散文化協會，幹部中多人入獄。1934年，林等人十四年間所努力組成的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赴東京請願之舉，亦不得不中止。

1936年赴上海，在華僑聯合會致詞時言「此番歸來祖國視察」，因「祖國」兩字，回台後受軍部嚴厲責難，謂林獻堂認支那為祖國而不認日本為祖國，真是大逆不道。參謀長荻洲立兵與《台灣日日新報》社共謀，在林參加6月17日的始政紀念日園遊會上，使流氓批其頰，遂辭評議員，並避居日本。<sup>6</sup>回台後於1941年被指定為皇民奉公運動委員會委員，

<sup>5</sup> 許雪姬訪問、傅奕銘紀錄，〈林博正先生訪問紀錄〉，民國84年8月7日，未刊稿。按葉只借十六本，缺1939年份。

<sup>6</sup> 葉榮鐘，《林獻堂先生紀念集：年譜、遺著、追思錄》二（台北，文海出版社，民國63年），頁122-123；楊肇嘉，《楊肇嘉回憶錄》（台北，三民書局，民國56年），頁314-315。

11月6日復任總督府評議員。1942年又因《南方雜誌》重刊其赴歐美之遊記《環球遊記》中的〈滯英雜感〉所描寫的英國，有過譽英國之嫌，被檢舉。經不斷解釋，再寫一篇〈大東亞戰〔爭〕吾人之覺悟〉一文方才勉強過關。<sup>7</sup>1945年4月3日，總督府為收攬民心敕賜林為貴族院議員。8月15日日本投降，9月9日往南京參列受降典禮，並歡迎陳儀長官；被命接收彰化銀行。1946年3月29日被選為縣參議員，後辭縣參議員而於4月15日當選省參議員，8月16日復當選參政員，29日參加台灣光復致敬團，往南京會蔣主席。1947年先後任台灣政治研究會（原台灣建設協進會）理事長，2月28日任彰化銀行董事長。而是日二二八事件爆發後，參加台中處委會，並救財政處長嚴家淦脫困。4月29日任省政府委員，1948年魏道明省主席任命為通志館館長，再改為文獻會，復任主任委員。後因不滿政府的糧食、土地政策，加上有頭眩之疾，遂於1949年9月23日赴日養病。翌年辭省政府顧問、文獻會主委。「因是謠言誹語百出，謂林獻堂之辭退公職是已加入共產黨，或言是加入獨立黨，令人聞之不快，故不得不仍滯留於日本也。」(1951.1.20、2.2)1955年7月16日次子猶龍驟逝，遂有回台協助照顧遺孤之打算；再加上是年美國反對中共進入聯合國，林認為「台灣現狀保持無變動矣，歸台之念不禁倏然而生」(1955.9.21)，歸台只在早晚之間。惟林獻堂在親友勸阻下，復怕回台後成為籠中鳥，再也無法出國，故仍滯日。後因病體支離，於1956年1月入院醫治未能好轉，退院治療亦無起色，遂於9月8日病逝。

### 三、日記的內容

(一) 起訖日期：日記始於1927年止於1955年，前後二十九年，其中1928年、1936年缺。1939年10月27日、1952年9月25日、1955年10月31日起迄12月31日亦缺。最可惜的是1946年3月1日起到3月5日二二八事件期間的日記亦告闕如。1936年缺的原因不詳，是年即為「祖國事件」發生時，缺此年份至為可惜。1928年缺則因林於1927年5月12日起到歐亞各地遊歷，一直到翌年5月才回台，此年分缺，尚有《環球遊記》可以參考。1939年10月末起缺兩個月乃因9月26日林跌斷足骨，在病床上將日記

<sup>7</sup> 〈日記〉，1942年6月9日、10日、16日、18日、23日、25日。

寫在小記事本，後來只補抄了一個月在正式日記本上。1952年缺兩個月的原因不明。至於1955年年底至林於1956年9月8日去世為止，可能是已在病中，無法寫日記。

(二) 內容：林獻堂以十分工整的筆跡要言不煩紀錄每天發生在他身上的事，大至國家大事，小則日常生活的細節亦可在日記中發現。每天的天氣、所讀的書、起床上床的時間，病狀、醫療情形，甚至服何種藥都一一紀錄，所以這部日記是林獻堂一生中最重要的見證。日記中所包含的資料可大別為如下數類：

1. 家族資料：這部日記以林獻堂為中心展開，因此其家族、親族、朋友、詩友、事業夥伴、佃農都是日記紀錄的對象，其中以家族的資料最多。林獻堂在日治時期儼然是霧峰林家頂厝、下厝的領導人，而其親族中林階堂（弟）、林資彬（堂弟）、林瑞騰（堂弟）是他事業的合夥人，更是慈善事業、政治運動的重要支持者。舉凡家族中的甲寅公、景山公公業的管理，《林家族譜》、《林氏家傳》的刊行，林獻堂都是重要管理人之一；而親族間分家，或因分產而起糾紛均請其居中調解，親族間組成的財團法人共榮會、蘭生慈善會都在林獻堂的建議下成為重要的慈善事業團體。林家的日常生活，由日記中可知男性成員的娛樂為到大肚球場打高爾夫球（曾在萊園設一個小球場以供練習，並舉辦比賽），或騎馬、吟詩、聽戲、看電影。女性成員以林夫人為代表，她是標準戲迷，看戲為其最重要的娛樂生活。日記中林獻堂將家人所看的每一齣戲的名稱都記錄下來。

婦女史的資料也十分豐富，霧峰林家婦女的活動，以霧峰林家為中心展開的婦女親睦會、一新會、一新義塾，<sup>8</sup>日記中均翔實記載。如「一新義塾女生徒22名外，婦女11名，潘瑞安、林啓東為統率於29日將往台北觀博覽會，四時余與猶龍、成龍〔溫成龍，林獻堂秘書〕、瑞安為之注意服裝行動及團體秩序諸事」（1935.10.26），又如該會每次活動由何人主持，何人主講，參加者有誰，有誰發言，亦不憚煩一一詳述。至於林家的婚姻圈和板橋林家以中國大陸大家族、南洋僑領締姻者大不相同，大半和本地士紳結婚，如清水楊家、斗六吳家、台南劉家、三角仔呂

<sup>8</sup> 有關霧峰婦女活躍的情形可參閱楊翠，《日據時期台灣婦女解放運動》（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3年），頁557-562。唯書中有部分錯誤，不贅。

家，但日治以後也有和日婦結婚者，如猶龍（獻堂次子）、雲龍（獻堂三子，先娶楊子培女楊雪霞）、夔龍（獻堂侄、階堂子）。

2.經濟活動資料：到目前為止研究林獻堂的篇章中，大半重視其政治、社會、文化活動，鮮少提及其經濟活動，如果有也僅提到大東信託及彰化銀行。如果參閱日記即知他曾參與霧峰信用組合、宏業會社、大東信託、台灣製麻會社、海南製粉、大成火災保險、東華會社、三五會社、南洋倉庫會社、彰化銀行、振南會社、大安產業株式會社、台灣民報社、大公企業、東南商事會社、台灣電力公司、火柴公司等企業的投資與經營，而在日記中他出席重役（董事或監察人）會議的紀錄也隨處可見。出現最頻繁的有大東信託、彰化銀行、台灣民報社、大安會社、大成火災保險。如1939年5月15日：「大安會社四時開第十八回總會，出席者五弟〔階堂〕、瑞騰〔資鏞〕、猶龍、夔龍、雲龍、映雪〔澄堂妻〕、阿麵〔澄堂妾〕、阿雨〔垂明妻〕及余計九名，…本期因粟價較高，收入增加六千餘，純益金四萬七千餘圓，每株增配十錢（一株一圓），本年租額升三千二百餘石。」(1939.5.15)事實上，林獻堂及其家族所從事的事業，基本上本身帶有強烈的民族資本意識，並未與日本勢力發生太深的關係，其中南洋倉庫株式會社是唯一的例外。它是依台灣總督府與台灣銀行的指示而創設的，霧峰林家也投資，且任該社總裁，然林獻堂加入主要是以增進中日兩國親善為目的。<sup>9</sup>

3.政治相關資料：林獻堂一生所從事的政治運動，誠如葉榮鐘所言：「先生自民國元年起至15年止，此十五年中，曾首創捐資興學，參加同化會，呼籲撤廢六三法案，領導民族運動，鼓吹文化運動，尤為先生精神最為興奮、於民運最為熱烈之時期，惜均為日記所未載，至覺遺憾！」然文化協會分裂後，台灣民眾黨、自治聯盟等相關資料，在日記中亦時有詳述，而光復初期，林獻堂投入議員、議長選舉，當選後復又選參政員，在擔任省府委員後(1947.4)，所參加的委員會，主要會議內容皆有敘述。如：「第九次委員會政府提案八條，就中重要者〔台灣各縣市經營企業標售民營實施辦法案〕、〔台灣省政府訴願審議委員會組織規程案〕，其餘無甚關重，皆從原案可決，近十時閉會。」(1947.7.11)

<sup>9</sup> 涂照彥著、李明俊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台北，人間出版社，無出版年），頁422。

至於其1949年赴日後，他也記載了當時台灣人中以廖文毅、黃國鵬、藍國城、黃紀男、吳振南為主的台灣獨立黨（分裂為台灣獨立黨、台灣獨立聯盟，後建立台灣共和國）；這部分的資料因林獻堂與他們關係密切所載亦翔實，如：「獨立黨外交委員長陳哲民、宣傳委員長楊杏庭〔即楊作舟〕十時餘來訪，余笑其無國家而先成立臨時議會，何其顛倒若是，兩人亦自笑作事之荒唐也。」(1955.10.5)

4.文化活動：林獻堂一生從事的文化活動是多方面的，如聯合有志之士在日治時期創設今台中一中，以共榮會經費資助學生；組織櫟社、讀書會、圍棋會，和其子攀龍設一新會、一新義塾，凡此種種皆可見其文化活動之一斑。他一生中除了寫成二十多萬字的《環球遊記》外，還有《海上唱和集》、《東遊吟草》（日本岩波書局承印），尚有不少未收入集中的軼詩，上述作品可以在《林獻堂先生紀念集》中看到。至於其在光復後為魏道明主席任命負責文獻委員會修台灣通志的工作後，精心擘劃，遴聘人員，奠定今日台灣省文獻會的基礎，有關設立通志館、文獻會之詳細情形，亦散見於其1948~1949年的日記中。這些記載，可與《林衡道先生訪問紀錄》所談〈談台灣省文獻委員會〉一文相比較。

#### 四、日記的史料價值

林獻堂日記的史料價值在於：(1)它是當時人記當時事，有別於事後追記、有迴護自己空間的回憶錄及口述歷史。(2)日記中所載的活動，有不少是以林為主體，或是以他為重要人物展開的活動，如台灣民眾黨、自治聯盟、皇民奉公會、獨立事件、赴南京歡迎行政長官陳儀、參加台灣光復致敬團、援救滯留大陸之台胞回台、二二八事件、大戶餘糧收購、省文獻會成立，故記載不少第一手資料，可以重構或解決某些歷史問題。(3)圍繞在林獻堂週邊的人物而時時出現在日記中者，有些人也已出回憶錄，可以做比對，如楊肇嘉，他有《楊肇嘉回憶錄》、《楊肇嘉先生百歲冥誕紀念集》及部分日記（未刊稿），唯林獻堂日記所載較為詳細，可補其不足。如楊於1946年10月20日被政府認定為漢奸，被上海高等法院逮捕後，林獻堂日記記載了營救的經過，如：「楊基椿四日前歸自上海商保釋其父之事，約人來宅，天賦、松齡與之同來，協議提出

呈文。」(1946.10.27)逮捕日期、營救經過即為《楊肇嘉回憶錄》中所無；此外還有陳虛谷<sup>10</sup>、莊垂勝<sup>11</sup>；若未有著作出現，則光由日記中的記載已可拼湊出該人物的面貌，這些人中有羅萬偉、陳炘、林茂生、林熊光、林柏壽、洪元煌、林呈祿、黃朝清，當然也包括其夫人、二哥（烈堂）、五弟（階堂）、資彬、瑞騰等家人。有些人不常出現，但就片斷的記載已足以瞭解該人物的動向，如戰前赴大陸、戰後在上海組織台灣重建協會的柯台山、台灣義勇隊的創立者李友邦、曾任汪精衛政權中將職的藍國城。總之，凡是日治、戰後台灣人物的研究，非參閱林獻堂日記不可。(4)日記除了缺兩年外，共有二十七年，如此長時期的紀錄，在目前台灣史的研究資料中，其連續性、重要性尚無出其左右者。以下列舉幾個主題加以說明，使讀者能更深入地瞭解這部日記的價值。

(一) 皇民奉公會：到目前為止，國人研究皇民奉公會的不多，曾任皇民奉公會要職而留下回憶錄或口述歷史的有杜聰明、陳逸松、楊金虎三人。杜聰明無一字及之，<sup>12</sup>陳逸松在《陳逸松回憶錄》中談參加「皇民奉公會」的一些活動，<sup>13</sup>而楊金虎也因被任命為生活部長而在戰後備受冷遇。<sup>14</sup>陳、楊兩人並未深入地談，只一再說明當時任職的不得已。反觀林獻堂日記，他的記載自1941年4月10日被選為委員起到1945年6月17日皇民奉公會解散（保甲制度也同時廢止）時為止，期間他所參加的每一次會議、演講及放送（廣播），均一一列入；有時甚至還有演講內容撮要。由日記所載得知，當大東亞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台灣人的命運已不可避免地與日本人緊緊相繫，因此雖對日本政府的苛政有所描述如：「巡查帶壯丁搜索藏米，內子有糯米一斗，頗以為貴，又不敢密藏，以重罰，進退為難不知所可。」(1941.8.15)但也不免為了未被捲入戰爭而喜：「本日為大東亞戰爭一週年，皇軍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台灣遂免敵軍之攻擊而得平安過日，真大幸也！」(1942.12.8)這樣的感慨，與他前半生致力於民族運動好像不太協調，此一主客觀形勢

10 陳逸雄，《陳虛谷選集》（台北，鴻蒙文學出版社，民國74年）。

11 林莊生，《懷樹又懷人——我的父親莊垂勝他的朋友及那個時代》（台北，自立晚報社出版部，民國81年）。

12 杜聰明，《回憶錄》（台北，杜聰明博士獎學基金會，民國71年）。

13 林忠勝撰述，《陳逸松回憶錄》（台北，前衛出版社，1994年），頁230-235。

14 楊金虎，《七十回憶》（高雄，作者自刊，民國56年），頁61-62。

的改變，值得學者深刻探討；而此日記誠實無隱的記載，反倒成了瞭解皇民奉公運動之下台灣人變貌最好的資料。戰後陳儀欲追究參加皇民奉公會者，欲剝奪曾是皇民奉公會者擔任公職之權，這一措施不免令台人反感，楊金虎言：「日本時代雖受壓迫不能顯宗耀祖，尚有民權存在；不料光復祖國公職候選人之聲請權亦被剝奪，未免太酷刑也。」然而觀諸皇民奉公會在戰爭中的表現，遂使不明台情的陳儀對該會的作為大為反感才有此舉。後經丘念台向內政部呼籲該項措施並不合法，在行政院、內政部的指責下，陳儀才收回成命。<sup>15</sup>

(二)「台灣獨立」事件：或稱「台灣自治」事件。當日本投降後，部分士紳有鑒於治安維持的重要性，及未來何去何從頗感困惑，因此曾經開會商議，並往見台灣總督安藤利吉，此一事件被認為是日本少壯軍人諫山春樹等人密謀聯絡台灣士紳，鼓動獨立，因此戰後陳儀逮捕許丙等人。有關此事件，富澤繁的《台灣終戰秘史》、向山寬夫《日本統治下における台灣民族運動史》、當時報紙皆有記載。三年前中研院近史所出版的《林衡道先生訪問紀錄》，及即將出版的《許丙先生口述歷史及許伯埏先生手札》，分別由被逮捕的林熊祥、許丙之子林衡道、許伯埏來敘述此事，但卻不具全面性。然而不是被捕當事人的林獻堂在其日記中言簡意賅地逐條記載。先是1945年8月19日～22日往見安藤利吉和許丙、辜振甫、藍國城等人會談的情形。2月21日日記登載被捕的人除一般所熟知的許丙、辜振甫、林熊祥、簡朗山、徐坤泉外，還有林熊徵（翌日釋放）、陳焯、詹天馬、黃再壽、陳作霖，後四人於4月24日被釋放。

至於林獻堂本人則在2月20日被召到警總，接受調查室主任陳達元的詢問，問及獨立及其他之事，林一一辯白，第二天辜等即被捕。23日林要李翼中、李萬居勸陳儀勿擴大拘捕範圍及做無理之追究。5月14日許丙之妻來請援救。1947年7月8日，林獻堂被召到軍法處為已被當成戰犯處理的許丙等人作證。7月31日獨立案正式宣判，辜判刑二年二個月最重，許丙、林熊祥一年十個月。林獻堂在三人出獄後，都曾親往拜訪。

<sup>15</sup> 1, (2), 23, <台灣省二二八事件經過（有關皇民奉公會參加起事文件）>，1947年。藏南京二檔館。



## 五、日記的利用及有限性

誠如上述，林獻堂日記史料價值很高，但這並不意味他每一則記載均很翔實，其內容也有其有限性；至於使用的問題，因這部日記尚未公開，說到利用似有隔靴搔癢之嫌。

（一）日記的有限性：林獻堂在日記中每日所載約半頁，三百字左右，除非該日有特別之事，故有些記載失之簡略，有必要再找可以參考的第一手資料加以補充。舉例以言之：

戰後台灣糧食缺少，糧價高漲，1946年1月10日，政府解除米穀統制不給配給，霧峰庄民無糧可食；且原郡守黃周傳劉存忠縣長命，將霧峰農倉所存之粟以供國軍之用，庄民大為不平。3月14日以蔡繼琨、熊克禧兩少將為率，軍隊二十餘人拿短槍包圍農倉取糧而去，人民只好食用籤仔粉。3月17日，熊克禧、蔡繼琨兩人在原知事官邸召開座談會，林獻堂日記所載仍是輕描淡寫：「出席者朝清、茂堤、崇禮、金海、煥珪、水來、文權〔環〕、泉生外四名，當局出席者熊克禧、蔡繼琨、劉存忠。熊、蔡所言皆強硬，欲盡索農倉之米，不可以道理言論，爭論兩時餘，皆不歡而散。」

在《無花果》一書中，吳濁流引用某參加者對葉榮鐘復述當日的情形，場面充滿火爆：

……下午三時我到達官邸，園中噴水池邊站著數名的憲兵，執著上刺刀的步槍，台階上同樣有憲兵站崗，樓上廊門客廳門口也是一樣。這是向來所無的光景，……蔡少將站起來開口便說：我是陸軍少將，官並不小。我一向為國家的事是不怕死的，今天特地來到貴地向林獻堂先生要米，中部是台灣的米倉，霧峰又是米倉中的米倉，所以說霧峰沒有米是無人肯信的。有米無米，盡在林獻堂先生是否肯幫忙政府而定。說時態度傲慢而語氣尖刻。林獻堂先生聽著很不高興，他老人家說：政府搬去的米糧皆是老百姓的伙食米，他們現在都是糶黑市米維持生活。但因糧價飛漲，困苦異常，正在籲請發還所運去之米以舒困境。政府若沒有米可還老百姓，亦應結價給予價款；假使現在不能立即給發，亦應指定日期償還。政府一時向老百姓要米，而拿去之米分文不給錢，如此作法，不但老百姓無法維持生活，政府也無法維持威信。於是

熊少將怒氣滿面，坐在椅子上說：本人現在發燒三十八度以上，但是為著公務，死且不怕，這顧區區的病痛，今日之事，全看林先生答應不答應，若不答應，就請你老先生同我們上台北去。說時遲那時快，他說完最後一句話，同時用手向桌面一拍，他面前一只空杯跳起兩三寸。這一拍有分效，如響斯應，四個憲兵拿著上刺刀的步槍，排闥而入，神氣十足，來勢洶洶，在座諸人除兩位少將外，莫不為之失色，尤其是劉縣長左右為難，情形更為狼狽。還好，這一幕綁票活劇，終於在未完成的狀態下閉幕。<sup>16</sup>

(二) 日記的利用：林獻堂日記並未公開，因此能利用的研究者有限。葉榮鐘曾利用日記資料在林獻堂過世後編年譜，據說葉影印部分日記放在日本友人處，因此有部分留日學生撰寫相關主題時引用過。曾任台灣省文獻會委員的程大學先生為了寫林獻堂傳也曾向林博正先生借閱，但未見作品問世。1985年霧峰林家委託黃富三教授研究霧峰林家的歷史，曾提供全部日記，亦未見相關作品。目前為止看過且利用日記成書的只有台大城鄉所賴志彰，他在編《霧峰林家留真集》時曾借閱此日記。除了林家尚未公開這份日記，利用有困難外，日記本身也有不方便利用之處：

1. 人名繁多：日記的特點之一是林獻堂對來訪或參加某會的人名鉅細靡遺的記錄下來。如依例祭祖、生日、開會時的參加人數。1946年11月15日他生日時共有八十二個人前來祝賀，他一一寫下其名，令人歎為觀止。

2. 判讀人名困難：日記的人名通常只有名而無姓，同名的人容易混淆（熟讀日記就不致有此誤讀），如國城就有二人，一是人稱棒球先生的謝國城，一是前所述的藍國城。有時一個人使用不同的幾個稱呼，如其姪陸龍，又寫成六龍，或叫涎生；蘭生（林獻堂侄）之母許氏悅，有時寫成林許氏悅，大半都稱南街嫂，以別於其妯娌彰化嫂，侄林夔龍在改姓名時改為林孝祐。有時會寫錯人名，如林熊光的管家陳振能，誤寫成陳振凌；謝南光（春木）有時寫成謝南公；張文環常誤寫為張文權，許贊育（曾任霧峰教會傳道師）也常寫成許贊毓，陳嘉庚寫成陳甲庚，楊貴（即楊達）寫成楊桂，這些大抵都是因閩南讀音相同，故用不同的

<sup>16</sup> 吳濁流，《無花果》（台北，前衛出版社，1988年），頁182-183。

國字來替代。

3. 切忌斷章取義：日記中對某些人的負面批評，僅代表林獻堂個人主觀的看法，他只是忠實記載當時的感覺，並非故作惡意批評，因此在閱讀或利用時不能斷章取義。如他很疼愛林幼春之子培英，叔姪兩人甚為相得，擔任文獻會主委時也不忘提攜他。但是1946年6月30日他對培英的表現不甚滿意：「余勸其（培英）協力收公租以作修理戲台，他皆作不負責任之言，最後謂大花廳非倒不可，待倒，分幾枝木材以作燃料而已，其所言毫無顧大局而不近人情如是。」如果僅看這天的日記即斷言林培英不負責任，恐會失之偏頗。

## 六、後記

寫日記者不一定有死後出版的打算，也正因為如此日記才有其價值。不過也因日記記載原只供個人參閱，記載較為直接無隱，衍生的問題頗多，增加出版的困難。前年東洋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出版《許壽裳日記》，其中1946年6月26日他來台到1948年2月18日他身亡時為止的日記，豐富了光復初期的研究資料。沒有出版而成爲作傳最重要參考資料的有葉盛吉醫師（死於白色恐怖）的日記，楊威理曾利用日記完成《ある台灣知識人の悲劇：中國と日本のはざままで》一書，日記之重要性可見一斑。我個人也看過阮朝日先生的部分日記，據其女兒阮美姝女士面告，其父留有多數日記，但在二二八事件遇害後，其母傷心之餘將之燒燬，僅留下一小部分。如果阮朝日的日記能保存下來，對於台灣新民報社，戰後爲營救滯留大陸同胞返台之事，將會更清楚。

林獻堂日記是台灣最珍貴的私人資料，誠如葉榮鐘所言，這本日記應該是全體台灣人的，然而一者林獻堂在戰後有不少批評政府措置失當之處，復被宣傳與獨立黨關係密切，以致於家屬不敢貿然公開；二者日記中有批評他人之處，可能會引起當事人的子孫抗議；三者日記中有許多人名、包涵許多事務，要看懂這本跨越兩個時代的日記相當困難，需要找合適的人加註；四者日記中記載相當多林家家屬的個人隱私及家族中的糾紛，對是否出版，可能也未能達到共識。如果上述四個困難可以克服，相信林獻堂的《灌園先生日記》的出版指日可待。

# 「公共空間」及「公民社會」

## ——北美中國社會史的辯論

陳永明\*

自80年代開始，由於受到東歐的民主運動和政治發展所影響，中外不少社會史學者在探討中國社會演變的問題時，逐漸注意到政府以外的社會組織及其活動之重要性，並開始以此作為新的研究課題，分析它們與近代中國社會發展的關係。<sup>1</sup>部份美國學者在其研究中，尤喜歡引用兩個含義接近而又關係密切的政治社會學概念：「公共空間」(public sphere)及「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sup>2</sup>他們認為在研究中國社會史上引進這兩個概念，會為我們瞭解問題提供新的角度，有助我們「由下而上」(bottom-up)去分析明(1368-1644)、清(1644-1911)以來的社會變遷。然而，這種做法卻受到另一些學者的非議，北美學術界亦因此而出現了一場關於中國歷史上是否存在「公民社會／公共空間」的社會史辯論。反對者主要質疑，貿貿然將此等現代西方概念套用到傳統中國社會的研究上，是否契合歷史的實際情況？再者，他們亦擔心，若忽略了中、西社會演變上「貌同實異」的地方，而輕率地將兩者強作比附，會對讀者產生誤導。

\* 香港公開進修學院人文社會科學院講師

<sup>1</sup> 有關中國大陸這方面的研究，參考Shu-yun Ma, "The Chinese Discourse on Civil Society,"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137 (March 1994), pp.180-193.

<sup>2</sup> 梁元生：〈近年來美國之中國近代史研究趨勢〉，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編），〈中國近代史研究新趨勢〉（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4），頁115-118。

其實，「公民社會」這個概念，很早便出現在西方的政治哲學中，<sup>3</sup>不過，直至黑格爾（G.W.F. Hegel, 1770-1831）的時候，才發展成一套系統理論，用來指涉聯繫家庭與國家之間的活動空間。簡約而言，黑格爾認為，公民社會的出現，乃源於人類的自然和社會需要。它包括了法律和經濟制度，是個人在法律保障下，透過契約以謀求個體利益的經濟活動領域。在黑格爾的理論中，「公民社會」與「家庭」及「國家」，是組成倫理生活的三個要素。<sup>4</sup>其後，義大利共產主義者葛蘭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復對「公民社會」賦以新義，把它作為一切與制訂及傳播統治階級意識形態有關的私人或民間機構的總稱。葛蘭西認為，統治階級利用「公民社會」對被統治階級進行意識形態滲透，從而鞏固其領導霸權（hegemony）。因此，在推翻資產階級的革命中，他將「公民社會」視為無產階級通過陣地戰（war of position）以擴大勢力，最終奪取政權的戰略目標。<sup>5</sup>不過，近年西方史學界關於「公民社會」及「公共空間」的討論，主要乃受到德國社會哲學家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的影響。哈伯瑪斯認為，近代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已逐漸從市場經濟體系中，發展出一個由個人和非官方機構構成的公民社會，而在此亦產生了一個獨立於政治以外的公共文化領域。公民社會和公共空間的充份拓展，大大地促進現代國家制度的形成，並為資本主義體制的合法性（legitimacy/legitimation）提供了所需的基礎和論證。相反地，政府對公民社會和公共空間的滲透干預，再加上公共空間日趨商業化，喪失了社會整合（social integration）的功能，正是造成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合法危機的主因。<sup>6</sup>從黑格爾、葛蘭西到哈伯瑪斯，「公民社會」在定

<sup>3</sup> 關於此一概念在歐美的歷史發展，參考Jean L. Cohen and Andrew Arato, *Civil Society and Political Theory* (Cambridge, Mass. and London: The MIT Press, 1992), pp.83-176.

<sup>4</sup> Hegel,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trans. T.M. Knox (London,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122-155; Kenneth Westphal, "The Basic Context and Structur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egel*, ed. Frederick C. Beis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1993), pp. 257-259; Allen Wood, "Hegel and Marxism,"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egel*, pp. 417-419.

<sup>5</sup> Antonio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 ed. and trans. Geoffrey Nowell Smith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71), pp. 206-276.

<sup>6</sup> Jürgen Habermas,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trans. Thomas Burger (Oxford: Polity Press, 1989); Craig Calhoun, "Introduction:

義上的轉變，正反映了西方不同學者，在不同的時代和社會脈絡（social context）下，對人類社會未來發展的理解和冀望。

蕭邦齊（Robert Keith Schoppa）為最早在中國社會史研究中使用「公共空間」一詞的美國學者。他欲藉此說明，在清末民初時期，緊隨著政治及經濟環境的急劇轉變，浙江省的地方精英，如何透過新興的商會和志願團體等非官方組織，逐步奪取地方官吏的部份行政權力。蕭佩指出，由於滿清及民國政府均致力在地方上引進新的行政體制，以求改革地方政治，將地方行政理性化，因而大量扶植公共事務機構，這樣遂使往日原靠私人資助，屬於私人領域內之福利工作，逐漸轉化成爲公共領域的事宜。與此同時，地方精英亦透過對公共事務的參與而培養出強烈的政治意識，積極介入地方政治活動。<sup>7</sup>

蘭菁（Mary Backus Rankin）在其有關浙江地區於太平天國運動（1850-1864）後之政治轉型的研究中亦指出，由於戰後重建及對外貿易的發展，促使浙江一帶的精英社團數目不斷增加。她認爲，這些團體除了發揮其既定的社會功能之外，它們的出現，更爲社區精英份子提供了聚首一堂去議論時政的機會。地方社團及社區精英對當地事務的直接參與，導致清末民初浙江的公共空間不斷擴大。蘭菁強調，就整體而言，各省各地精英份子同時並進地朝全國規模發展的活動，正是清末政治社會上的特徵。此等活動最終更把公共空間中的活躍社團推向政治革命。<sup>8</sup>因此，她將公共空間的發展，視爲理解近代中國民族國家形成（nation-building）過程的鑰匙。

羅威廉（William Rowe）先後寫過兩本以漢口爲題的學術著作：第一本研究十八至十九世紀漢口的商業及商幫發展，並以此揭示當地社會結構的變遷；<sup>9</sup>第二本研究在十八至十九世紀的急劇變遷下，漢口社區所

---

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 ed. Craig Calhoun (Cambridge, Mass. and London: The MIT Press, 1992), pp. 1-50.

<sup>7</sup> Keith Schoppa, *Chinese Elites and Political Change: Zhejiang Province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Mass.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1982), esp. pp. 5-9.

<sup>8</sup> Mary B. Rankin, *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Zhejiang Province, 1865-1911*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15-30; 92-135.

<sup>9</sup> William T. Rowe, *Hankow: 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8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存在的社會矛盾。<sup>10</sup>羅氏這兩本互相關連的名著，乃另一個有意識地援引哈伯瑪斯「公共空間」理論來研究近代中國社會史的例子。透過對鹽業和茶業貿易的分析，他認為，隨著社會經濟的蓬勃發展及日趨多元化，太平天國後的漢口商業界，已處於近似西方工業革命以前，既都市化又商業化的資本主義社會狀態。而商幫與商人對自身所屬團體的認同及行會自治意識的高漲，更成為日後革命活動的潛在動力。<sup>11</sup>其後，他又比較了中國和歐洲的情況，認為整個十八世紀末葉至十九世紀末葉的漢口，與近代肇始時的歐洲城市有頗多相類的地方，例如，它們均為重要的貿易中心，發揮著控制遠程貿易的作用，肩負起負責統籌地域經濟分工的責任。<sup>12</sup>羅氏將中國詞彙中的「公」視作英語「public」（公共）的同義詞，認為十九世紀的中國都市，猶如十八世紀的歐洲都市，已出現了一次調和資本主義個人產權及政府絕對權力，平衡資本家和統治者兩方面利益的歷史運動。<sup>13</sup>

在美國學者中，持類似觀點的並不乏人。他們大都把清代中葉以後出現的非官方社團和公眾活動，視為中國公民社會的濫觴，並嘗試以此剖析近代中國社會的發展。例如傅士卓（Joseph Fewsmith）在對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上海政治社會的研究中提出，公共空間的擴張，實為精英商賈積極介入政治事務之主要原因；<sup>14</sup>斯特蘭德（David Strand）亦認為公共空間的出現，結合日益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正是民初北京民眾政治意識逐漸提高，並積極參與政治運動的主要原因。<sup>15</sup>此外，又如杜贊奇（Prasenjit Duara），儘管他批評運用葛蘭西的「文化霸權」（cultural hegemony）概念，在分析具體社會史問題上很容易會失諸空泛和抽象，但他顯然同意，在研究中國社會史時，有必要建立一套調和上

<sup>10</sup> William T. Rowe, *Hankow: 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9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sup>11</sup> Rowe, 1984, pp. 120-121; 156-157.

<sup>12</sup> Rowe, 1989, p. 3.

<sup>13</sup> *Ibid.*, p. 136.

<sup>14</sup> Joseph Fewsmith, *Party, State and Local Elite in Republican China: Merchant Organizations and Politics in Shanghai, 1890-1930*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5).

<sup>15</sup> David Strand, *Rickshaw Beijing: City People and Politics in the 1920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also see Strand, "Protest in Beijing: Civil Society and Public Sphere in China," *Problem of Communism*, 29.3 (May-June, 1990), pp. 1-19.

層文化 (high culture) 與普及文化 (popular culture) 的概念和理論，以分析國家政權和民間社會的互動關係。<sup>16</sup>杜氏提出的「權力文化網絡」(cultural nexus of power) 說，目的即在此。由於對社會上非官方組織及其活動的重視，中國社會史的焦點，已明顯地由過往集中於地方政府和士紳的研究，<sup>17</sup>轉移到宗族<sup>18</sup>、商幫<sup>19</sup>等官僚架構以外的 (extra-bureaucratic) 公共團體之上。

在芸芸美國中國社會史學者之中，提倡用「公共空間」來研究中國社會史的，以蘭菁及羅威廉最力。羅氏在其一篇名為〈近代中國的公共空間〉的論文中，介紹了哈伯瑪斯的公共空間理論，比較了語義上英語「public」一詞與漢語「公」的異同，並追溯了中國歷史上「公」此概念的源流。他認為，將哈伯瑪斯理論應用到中國史研究，尤其是中國社會政治史的研究，會有助分析和了解問題。<sup>20</sup>蘭菁在另一篇論文中，除追溯中國公共空間的歷史根源外，更意圖展示如何援引西方社會科學理論，促進對中國歷史問題的討論。<sup>21</sup>

不過，亦有史學家質疑這種類比方法。孔飛力 (Philip A. Kuhn) 即

<sup>16</sup> Prasenjit Duara,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Rural North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262.

<sup>17</sup> 早期中國社會史研究的典型作品，如Chang Chung-lai, *The Chinese Gentry: Studies on Their Rol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ese Societ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55); Chang Chung-lai, *The Income of the Chinese Gentr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2); Ch'ü T'ung-tsu, *Law and Society in Traditional China* (Paris: Mouton & Co., 1961); Ch'ü T'ung-tsu, *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 under the Ch'ing*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Ho Ping-ti,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 Hsiao Kung-chuan, *Rural China: 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0).

<sup>18</sup> 有關這方面的研究，可參考 Patricia Ebrey and James Watson, eds., *Kinship Organiz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Rubie S. Watson, *Inequality among Brothers: Class and Kinship in South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sup>19</sup> 有關這方面的研究，可參考Susan Mann, *Local Merchants and the Chinese Bureaucracy, 1750-195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Joseph W. Esherick and Mary Backus Rankin, eds., *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sup>20</sup> William T. Rowe, "The Public Sphere in Modern China," *Modern China*, 16.3 (July 1990), pp.309-329.

<sup>21</sup> Mary B. Rankin, "The Origins of a Chinese Public Sphere," *Etudes Chinoises*, 9.2 (Automne 1990), pp. 1-60.



認為，中國歷史上「國家對文字言論控制甚嚴」，而士紳、商董又與國家官僚組織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一向受到政府的贊助和保護。因此，地方上曾否出現過對舊體制挑戰的力量實有商榷之餘地。況且中國二十世紀初的體制變化，也帶有強烈的國家中心色彩，幾乎完全扼殺了公民社會的發展空間，所以，當時「雖有商業化與都市化」仍舊「缺少一套足資公民社會發展的政治或文化條件」。<sup>22</sup>此外，蘭菁及羅威廉的觀點，更遭到強調中、西社會文化有異的歷史學者的猛烈批評，在《近代中國》季刊中引發了一次以此為題的論戰。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在反駁蘭菁及羅氏的論點時指出，由於公民社會的出現及隨之而至的公共空間，皆與資產階級（*bourgeoisie*）的存在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因此，用它們來分析歷史上的中國社會並不恰當。<sup>23</sup>在審閱過羅威廉的漢口研究及蘭菁的浙江研究後，魏斐德不同意二人關於中國公共空間的結論，主要是因為他不認為清末民初有任何自發團體，足以挑戰統治者的政治權威。<sup>24</sup>另一位學者黃宗智（Philip Huang）在同期的討論中，探討了「公共空間」及「公民社會」兩詞在社會學上的含義，並以之與中國歷史情況作出對比。他認為，由於中國社會與哈伯瑪斯所描述的西方模式有很大的出入，故不宜強作比附。<sup>25</sup>黃氏在較早時已指出，儘管1900年以後中國社會上的公共領域的確不斷擴大，但整個社會並未由此帶來任何足以與國家機器抗衡的民間力量。<sup>26</sup>

回應魏斐德及黃宗智的批評，羅威廉強調，援引哈伯瑪斯的觀念及理論，既不意味將中國社會的發展與西方社會的演進等同，亦並非認為中國政治必然會逐步邁向西方式的民主。只是在分析過帝制中國晚期的

<sup>22</sup> 見 Philip A. Kuhn, "Civil Society and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conference paper, American-European Symposium on State and Society in East Asian Traditions (Paris, 29-31 May, 1991), 譯文見李孝悌、沈松橋(譯)〈公民社會與體制的發展〉,《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13期(1992年2月),頁77-84。此處引自譯文。

<sup>23</sup> Frederic Wakeman, Jr. "The Civil Society and Public Sphere Debate: Western Reflections on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Modern China*, 19.2 (April 1993), pp. 112.

<sup>24</sup> *Ibid.*, pp. 117-134.

<sup>25</sup> Philip Huang, "'Public Sphere'/'Civil Society' in China—The Third Realm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Modern China*, 19.2 (April 1993), p. 273.

<sup>26</sup> Philip Huang, "The Paradigmatic Crisis in Chinese Studies: Paradoxes in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Modern China*, 17.3 (July 1991), p. 321.

社會經濟特點後，他發覺晚清社會確實出現了若干與近代前期歐洲社會相若的特徵：高度商業化，並擁有一批自覺的城市商人階級。故此，借用西方社會學的概念去加以研究，無疑有利於建立一套分析、探討問題的體系和方法。<sup>27</sup>蘭菁亦在回顧了帝制中國晚期的政府與社會關係歷史後，重申她的主張，認為自明代開始，中國已逐漸發展出一個包含了政府及社會兩方面勢力的公共空間。<sup>28</sup>問題只是，中國的歷史情況和歐洲的有異。中國的公共空間主要來自政府與社會關係的發展，而歐洲的則來自經濟的發展而已。<sup>29</sup>

綜觀就「公共空間」及「公民社會」是否適用於中國史研究的辯論，正反兩派的分歧，主要來自雙方對這兩個含義複雜的術語有不同的理解。蘭菁及羅威廉傾向採取較寬的用法，故當發覺在英語中，難以找到相對應的詞彙以描述晚清至民初期間，在急劇變遷下所出現的新社會現象時，他們遂樂於借用此兩詞來指涉社會上官方以外的公眾組織和活動。當然，這種寬鬆的用法，是否有助我們對中國社會史的認識，卻仍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起碼，若根據蘭菁及羅威廉的標準，則中國歷史上的所謂「公民社會」，應否包括宗族、秘密會社等民間組織？而其出現時間又是否可以再向上推索？凡此種種，仍屬有待解決的問題。至於應從社會建制抑或文化層面去掌握問題，學者之間，至今亦未能達至共識。<sup>30</sup>如果引入新詞不但無助讀者加深對問題的認識，反而徒添誤解，則似乎大可不必。另一方面，正如魏斐德和德利克（Arif Dirlik）所見，蘭菁等人雖極力辯稱，這種做法並非要將歐洲經驗強加諸中國，但毋庸否認，當中卻仍舊隱含以西方社會發展作為標準，去量度中國的現代化

27 William Rowe, "The Problem of 'Civil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odern China*, 19.2 (April 1993), p.154.

28 Mary Rankin, "Some Observations on a Chinese Public Sphere," *Modern China*, 19.2 (April 1993), p. 158.

29 *Ibid.*, p. 177.

30 例如，有學者主張從文化層面去界定「公民社會」，見Richard Madsen, "The Public Sphere, Civil Society and Moral Community: A Research Agenda for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Modern China*, 19.2 (April 1993), pp. 183-197；亦有學者提出，在考慮「公民社會」的組成時，應把「流民」（floating population）列入考慮之內。有關的爭議，見 Dorothy J. Solinger, "China's Transients and the State: A Form of Civil Society?" *Politics and Society*, 21.1 (March 1993), pp. 91-122。

進程的意圖。<sup>31</sup>

顯然，對於那些反對採用具有黑格爾、葛蘭西主義含義詞彙，又或反對目的論（teleology）史學觀的學者而言，這種隨便套用西方概念以解釋中國問題是不值得鼓勵的。因為這樣會很容易產生誤導。例如，布魯克（Timothy Brook）在研究晚明宗教社會史時，便是為了避免誤解，不取「公民社會」或「公共空間」諸詞，而採用「士紳社會」（gentry society）來形容明中葉以後，士紳在政府控制以外的社會文化活動。<sup>32</sup>魏斐德和黃宗智等學者的顧慮固然有他們的道理。然而，若果在研究中過份拘泥於某些詞彙「本來」的意義，而忽略了詞義乃基於約定俗成，會隨著運用者的需要而不斷重新界定，則未免過於墨守成規。以「公民社會」一詞為例，由黑格爾到葛蘭西，再到哈伯瑪斯，其含義便一再更易，而對於近代自由主義，此詞的定義亦與上述三者所作的有所不同。所以，在討論應否在中國社會史研究上引入新詞時，焦點似乎並不在於該詞之「本來」意義，而在於經過重新界定之詞彙，是否足以概括其欲以指涉的特定社會現象，並促進讀者對此現象的理解。

<sup>31</sup> Arif Dirlik, "Civil Society/Public Sphere in Modern China: As Critical Concepts versus Heralds of Bourgeois Modernity," 《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4（1993年8月），頁14。

<sup>32</sup> Timothy Brook, *Praying for Power: Buddhism and the Formation of Gentry Society in Late-Ming China* (Cambridge: Th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and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1993), p. 27.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口述歷史叢書

### （56）女青年大隊訪問紀錄

陳三井、朱滄源、吳美慧訪問 吳美慧紀錄

女青年大隊成立於民國38年3月，係大陸變色前，陸軍總司令孫立人將軍由上海、南京等地招募來台訓練之女性部隊，同年10月正式於屏東阿猴寮接受訓練。經嚴格軍事訓練後，翌年10月，改隸於國防部總政治部第七組，再接受兩個月「後期教育」（即政治教育）後，畢業並分發至台灣、金門等地六個防守區為官兵做政戰服務工作。本紀錄乃就當年女青年大隊之部份隊職官、教官、隊員所進行之訪問。（精裝450元，平裝400元）

# 對民初中美科技交流的兩種詮釋：

評介 Peter Buck , *American Science and Modern China, 1876-193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與楊翠華, 《中基會對科學的贊助》(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1)。

郭文華\*\*

## 一、民國科學史中的中美關係

自晚清至今，中國新教育與文化觀念的變遷，有很大部分來自西式文化與西式教育的衝擊，西方科技也不例外。而此過程中，「維護國故」抑或「全盤西化」的論爭一直存在，顯示文化引進不能只考慮輸出的面向。此外，類似西方「船堅炮利」或西方科技應「中體西用」的聲明，更顯示科技交流除了知識內容外，尚有許多面向有待探討。Peter Buck (《美國科學與近代中國》，以下簡稱《美國科學》) 與楊翠華 (《中基會對科學的贊助》，以下簡稱《中基會》) 的著作，探討這段時期中國與美國的文教互動，充實長久來被忽視的民國科學史，並且在「科學—政治」的問題上，各自提出研究者的不同意見。

以研究視野與範圍而言，兩書出版雖相距十一年，卻有相似的關懷。在研究取向上，他們不但同時以中國與美國為比較對象 (《美國科學》，頁2；《中基會》，前言，頁4)，並且將這種對比放置在時序性的架構中。就內容言，楊氏以中美合作的基金會為素材，分析年代也與《美國科學》有出入，但是兩者的關心重點，均集中在1924年後至1936年「建國十年」間的科學發展，<sup>1</sup>尤其偏重政治議題要求較少的美國，在

\* 感謝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楊翠華女士與審查人的意見與指正。

\*\* 國立陽明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sup>1</sup> 如題目所言，《美國科學》的研究範圍從1876年到1936年。但從其架構觀察，第五、六章所處理的「科學會社」與「科玄論戰」，幾占全書之半，可知重點放在1919年至1934年前後的中美科學交流。又中基會從成立至遷臺雖自1924年到1949年 (參見《中基會》，前言，頁3)，但是觀其研究斷限，應可溯自1908年美方對第一次庚款的處理方式與基金會成立的經過 (參見

文教方面對中國的影響。如楊氏所言：

這些努力是成功或失敗的經驗？其經過是不是一種「文化帝國」的表徵？其模式是否有助於中國科學技術的「專業化」？對中國學術教育的「本土化」有什麼影響？（《中基會》，前言，頁2）

其問題意識與Buck相似。<sup>2</sup>

但除了問題意識相似外，兩本書在素材、觀點與寫作方式上均有差異。在素材處理上，Buck採取較多個案，而楊氏僅以中華教育基金董事會（The China Found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以下簡稱「中基會」）的成立與貢獻為討論對象；在觀點上，兩位作者對中美文化互動，有不同理解與評價；在寫作方式上，Buck以理論為架構，而楊氏則從經驗研究出發。以下就兩書的「敘述」與「結構」，分析他們的不同意見。

## 二、《美國科學》與《中基會》——內容與結構的分析

《美國科學》於1980年出版。全書分七章，大致以時間為序，介紹自傳教士進入中國，展開知識傳教，至中國宣布抗戰為止，美國科學與「近代」中國的演變。筆者將內容分為五個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一章，敘述全書旨趣及研究取向；第二部分是第二章，說明傳教士對科學傳教的看法，與進入中國的教會醫學；第三部分從第三章到第五章，說明美國科學觀念與科技移轉的改變，在「慈善」事業（philanthropy）形式外，加入政治性的科學輸出；第四部分從第五章到第六章，以赴美中國留學生的科學傳播與科學結社為討論對象，說明這些留學生傳遞的科學概念與方法，不但反映美國當時對科學方法論的論爭背景，同時質疑這些「移植」的方法論，對沒有類似背景的中國，是否有預期影響；第五部分是一個悲觀的結論，作者總結三個階段的探討，認為中國科學「現代化」的過程，其實一直在美國科學的輸出下游，無論就觀念（idea）

---

《中基會》，頁1）。

<sup>2</sup> 參見《中基會》，前言，註二引用《美國科學》作為探尋科學社群與美式理念制度移植的研究先聲，可見楊氏對此書的理解重點是：傳教士後美國如何影響中國科學社群及知識分子的形成。由此也可知兩者研究取向基本上相近。

或體制（institute）的主導權，均操之於美國。

就敘述的角度而言，這本書的陳述很簡單，僅是依時論序性的介紹，然而其論述結構則相當嚴謹。作者在緒言即開宗明義指出，本書是「一個比較性歷史的論述」，主題是美國科學與美國對民初中國引介的科學（《美國科學》，頁1）。如其所言：

我感興趣的，基本上是美國科學理念與機構如何植基於中國，其次才是對中國科學發展的支持。（《美國科學》，頁1）

因此，從「比較」的結構觀點審視，作者要比較的是「美國科學」與「移植自美國的中國科學」。兩者的關係，經由三種方式經營：一是早期傳教士到中國的科學宣教；二是「慈善」事業在中國，建立以美國菁英大學為標準的科學教育傳遞；三是資助華籍學生赴美留學，藉以輸出美國科學方法論的理念。

此外，作者也指出「科學」與「移植科學」間，由於社會認知的差異，使美國科學輸入中國時，呈現社會發展與科學間的衝突與爭執。作者指出：

本書主題與這些爭執相關，討論它們為何隨著（美國）傳遞科學到中國的問題而產生，及它們如何與美國科學的社會史相關連。

（《美國科學》，頁2）

因此，綜上所言，本書的結構可以用下表加以說明：

比較結構 傳遞形式 \	美國科學（社會\科學）	現代化中國（理念\機構）
傳教士科學	自然秩序等同於社會秩序	理念：中國人與美國之最大不同 在前者無法規範其生活 機構：醫學學校與醫院
庚子賠款 與洛氏基金會	社會：工業化、都市化與種族多元化 科學：專業化、分殊化與實驗室中心	理念：訓練科學菁英等於訓練社會菁英 機構：協和醫學院
留學生 與科學會社	社會：工業化、官僚體制與勞工區 劃進化模式的論爭 科學：科學知識的普遍性與其於社會之地位的討論	理念：國家力量參與科學發展 機構：科學會社與官方研究機構

觀察作者的取向與觀點，大致可歸納成兩方面：一是以比較方法分析兩個文化的社會與科學間的聯繫結構；一是以文化帝國主義的解釋基調，對文化與科學的移植作動向分析。<sup>3</sup>本書經由中國與美國、科學與社會、中心與邊緣等對比項目，生動地勾勒結構性的科學史。

同樣從文化交會與政治角力脈絡，思索中國的現代科學，楊翠華《中基會》呈現另一種觀點與寫作方式。作者以「機構史」的取向，探討因庚子賠款所產生的「中基會」，以沿革與貢獻的分析方式，對中基會科學活動作整體說明。全書構想如作者所表示：

本書即根據海峽兩岸所藏的第一手史料，試圖（一）：重新建構中基會的發展軌跡，（二）研究中基會在中國近代科學發展中的角色與影響，從而進一步了解中美文教關係的本質。（《中基會》，前言，頁4）

內容分為兩個部分：

第一部分是中基會歷史沿革與政策組織的縱向研究，涵蓋本書前三章，其主軸是中基會與政府之間的關係。……第二部份則對中基會與中國近代科學發展之關係作橫向分析，是本書第肆、伍、陸章的主要內容，焦點集中在中基會的事業目標：科學教育、科學研究、科學應用。（《中基會》，前言，頁4-5）

作者的企圖並不僅止於「敘述式」的歷史寫作架構。以批判觀點的結構看，在縱向研究部分，本書依時序將中基會的發展分成三個轉折——緣起、改組與存廢，議題則集中在人事、財務與方針。作者將中基會運作時，各方利益衝突的考量的政治議題，穿插其間。如基金會的成立、董事比例與產生方式等，作者直陳：

美國政府之所以不把這筆庚款餘數直接了當的退還給中國政府，而要求成立一個中美合組的董事會來管理，「老實說，就是表示對當時政府的不信任。」

雖然在董事人選方面還相當尊重教育團體的意願，但是北洋政府官員參與董事會以及董事中缺乏與南方政府有關係之成員，都成為日後董事會改組之根源。（《中基會》，頁18）

<sup>3</sup> 參見Peter Buck, "Order and Control: The Scientific Method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V (1975), pp.237-267.

又如庚款止付後的情勢分析，顯示政局動盪下，各派系與美國關係的考量，影響該會存廢的決定。橫向研究的結構以科學教育、科學應用與科學研究為討論範圍，看來好像與政治無關。然而，第三章討論基金分配原則與範圍，顯示中基會的補助對象與發展方向，不但決定於美方對科學的觀感，<sup>4</sup>也受到中國知識分子對「科學」的認知，<sup>5</sup>第四章則將基金會財務與人事的爭議，轉到基金使用方針的討論，方接續第五、六章的分項陳述。所以，第二部份雖是結構性的基金會介紹，但也可視為第一部份的延續，有其批判的視點。

綜合以上，筆者試將本書結構示之如下：

第一部份：

階段\影響力	中國國內	美國及中美關係
緣起	財務：用於地方建設或文教建設之爭 人事：希望由教育學術團體推舉	財務：退款用於中國文教事業 人事：傳教人士與政黨人士董事之限制
改組	財務：任鴻雋對科學發展的爭議 人事：南北政府之爭	人事：宣稱獨立於美國
存廢	財務：國府停付庚款 人事：裁撤基金會之議	人事：希望維持其永久存在

第二部份：

範圍\影響力	中國國內	美國與中美關係
科學教育	技術教育的實用性，培養師資	主張鄉村與普及教育與菁英示範學校
科學應用	純粹科學或應用科學之爭議， 科學與「社會」科學之爭議	對美所辦農醫院校的補助
科學研究	地方性與普通性科學優先，集中補助原則	對研究機關的協助與派遣學者來華

<sup>4</sup> 參見《中基會》，頁75美董事孟祿（Paul Monroe）的意見。

<sup>5</sup> 參見《中基會》，頁82-83外界對基金會人士的批評。事實上即使是基金會的董事之間，對基金會的定位與科學的觀念亦大相逕庭。



本書的觀點與寫作方式有兩個要點：觀點上強調「中基會」機構轉折的政治運作，但對其移轉的現代科學予以肯定；寫作上以「機構史」的敘述為主幹，但隱含批評的論述結構，不斷呼應主題。

總之，《美國科學》因著Buck批判的「比較」結構觀點，敘述依附在比較的架構中；《中基會》呈現出敘述的研究架構，但對許多爭議點並沒有忽略，兩個部分中各自有精采的論述閃爍其間，結構隱含在批判的敘述之內。

### 三、學科與取向的差異

觀察這兩本書的差異，不能忽略作者不同的學術背景。Peter Buck出身美國科學史重鎮麻省理工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IT）的「科學、技術與社會」（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研究中心，受教於Everett Mendelsohn及Babara Gutmann Rosenkrantz。MIT的訓練使他特別重視科學與技術、科學與社會的相關探討，其作品具有社會學分析的色彩；<sup>6</sup>相對說來，楊翠華無論是政治大學的碩士學位、紐約州立大學（Buffalo）的博士學位，到任職的中央研究院，均在歷史學領域中。因此，「科學社會學」與「歷史」相異的學科觀點，反映兩位作者看待這段史事的不同取向。

以文化帝國主義的觀點為例，雖然兩位作者都注意中美文化交流的政治作用，但Buck多了一層「依賴」的意含。例如前言中他表示「輸出美國科學片段的主軸是取決於美國，並非中國」（《美國科學》，頁4），顯示作者認為中國建立現代化科學的過程，對美國強烈依賴。這種將科學發展建立在單方向科技輸入的研究取向，是社會學者「依賴理論」的路數。雖然研究科技輸入有許多說法，<sup>7</sup>然其基礎均是政治經濟依附美國

6 這一點也可由Buck另一篇探討西方科學之於民國時期之中國的文章中可知一二，參見Peter Buck, "Western Science in Republican China," in Arnold Thackeray and Everett Mendelsohn eds. *Science and Values: Patterns of Tradition and Change* (New York: Humanities Press, 1974), pp.159-184。

7 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第三世界」國家為發展「科技」經驗所產生的種種主張。Nancy Stepan以巴西醫學為例，認為第三世界國家要發展出具自主性的「國家科學」（National Science），應將「基本科學」（Basic Science）和「應用科學」（Applied Science）緊密結合

的依賴關係，科技移植亦如是。如作者以一半篇幅介紹現代醫學的輸入，並以爲醫學正是「給中國最好的」，與社會史家的論述取向相同。<sup>8</sup>又如作者對中國近代科學困頓所下的結論：

我們對科學困頓、科學依賴與科學發展的觀點，是經由我們視爲大量依賴社會及政治的科學應有帶動社會政治發展之期望，所持續塑造而成的。然而實際卻幾與之相悖。（《美國科學》，頁236）

將政治社會與科學依賴的微妙關係加以釐清整理，才是作者用來說明「近代中國」形成的理論基礎。因此，結論反覆出現中國「依賴」，並不爲奇。<sup>9</sup>相對來說，楊翠華注意到《美國科學》中「文化輸出」的霸權意義，並在書中加以回應，然並未討論其依賴理論，顯示兩位作者取向的不同。

#### 四、敘述與結構的辯證

就「敘述」內容與「結構」鋪排來說，兩書各有所長。首先，在內容的說服力上，顯然楊氏較成功。在《中基會》的前言中，楊氏清楚地表示她的取材偏重「中國文教界」的想法與做法：

在眾說紛紜的爭論中，大多以美國的立場出發，從慈善家、教育家、教會學校等角度來檢視與評估中美文教關係之意義，基本

---

成一「系統」（System）方有可能，參見Nancy Stepan, *Beginning of Brazilian Science* (New York: N.Y. Science History Publication, 1981), p 159。但Michael J. Moravcsik則主張第三世界要發展「基礎研究」（Basic Research），認爲「基礎研究」爲「應用研究」的基礎，不但有較大發展性，且可爲後代建立研究傳統，進而由本地人才處理科技，參見Michael J. Moravcsik, "Technical Assistance and Fundamental Research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in *Criteria for Science in Undeveloped: Public Policy and National Goals*, ed. by Edward Shils (Cambridge: MIT Press, 1968), pp. 164-176。

<sup>8</sup> 參見Teresa Meade及Mark Walker合編*Science, Medicine and Cultural Imperialism* (New York: St. Martin Press, 1991)。本書強調資本主義國家藉由醫療與公共衛生計劃的推動施展權力，使「後殖民」國家仍然處於其帝國主義控制下，與Peter Buck對美國科學與醫學的理解如出一轍。

<sup>9</sup> 除了在結論中分出一節，專論中國的「困頓與依賴」（backwardness and dependence）之外，全章中還有多處用依賴一詞，形容醫學移植與菁英領導的關係（頁228-229）。

上，忽略了中國文教界的想法與做法，由中美兩國政教人士合組的「中基會」正是檢驗這些問題的重要環節。（《中基會》，前言，頁2-3）

也由於此，《中基會》的資料來源，雖大致集中在臺灣現存的中基會檔案與當時中國的報紙期刊，然不至令讀者有資料貧乏之感。反觀《美國科學》一書，作者對中文資料的掌握未能盡如人意，為其致命傷，也削弱其論證。以第四部份為例，作者雖然自承：

儘管我所要討論的是美國人對中國未來科學地位的觀點，但是我的研究中大約有三分之一放在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與其在中國所成立的科學會社。（《美國科學》，頁5）

而將討論集中在「科學會社」上，但是對他的研究架構而言，資料的缺乏幾乎一望即知，這也是學界批評該書的重點。<sup>10</sup>如David A. Hollinger以為：

Buck在處理（中美）關係時，對中國一方的解釋是無力而薄弱的。他僅依靠一本中國科學社的刊物《科學》，且對這些論爭中的內容，明顯的缺乏處理。<sup>11</sup>

Hollinger進而認為：用這些資料解釋傳教士與慈善事業或許可以，但要處理「科學的美國觀點」，實在不能令人信服。<sup>12</sup>另一個問題是對兩個文化傳統的過分簡化。如Furth認為作者以康乃爾大學或洛氏基金會的介入，說明美國科學與中國科學的建構，其中似乎沒有相關；將中國的文化化約成「儒家傳統」也過分簡化。<sup>13</sup>她認為：作為一個科學史家，Buck希望能夠矯正歷史家對現代化中國研究的缺乏，但是縱觀全

<sup>10</sup> 參見David A. Hollinger與Charlotte Furth對《美國科學》的書評（*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26 (1984), Iss 1, pp. 174-178，下簡稱Hollinger；*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86 (1981), Iss 4, pp. 901-902，下簡稱Furth）。

<sup>11</sup> Hollinger，頁176。

<sup>12</sup> 同前註。此外Furth也指出，把赴美留學生及其所傳入中國的科學會社，當成當時中國科學的「代言人」，顯然「忽視較早一代從西方傳教士引進科學理念的晚清改革者，一些科學家對科學與社會的觀察或由此而來，但作者並未討論及此」（Furth，頁901右欄）。

<sup>13</sup> Furth，頁901右欄。其實這種缺失頗為顯著，筆者懷疑Peter Buck是否充分運用了中文的原始資料。如其對科學主義在中國的發展與「經驗派」、「物質派」的劃分方式幾乎全用郭穎頤的見解（見D. W. Y. Kwok, *Scientism in the Chinese Thought, 1900-1950*. 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5），似乎顯示作者仰賴二手中國研究的情形。

書，「這個跨文化初步研究的問題，在於它把比較分析首先必須掌握的論述基礎弄掉了」。<sup>14</sup>筆者亦同意Hollinger及Furth對其資料處理的中肯批評。

就研究架構而言，《美國科學》似較《中基會》圓熟。楊氏雖然在前言從「文化帝國主義」、中國學術「本土化」等研究回顧中，展現出「了解中美文教關係的本質」的企圖心（《中基會》，頁2），然而其結論似乎沒有充分回答前言的問題，而僅侷限在中基會對中國科學的影響分析與貢獻（《中基會》，頁209-211）。能呼應前言的部分，只有討論其他庚款基金會功能不彰下，中美合作的中基會，似乎因其健全人事與組織，方能對中國科學發展提供貢獻：

在其他庚款或受戰爭動亂、或因人謀不臧、或受世界經濟與金融變化等因素之影響，而相繼無疾而終之後，只有中基會持續至今，仍然維持獨立而永久自存的組織，繼續支持台灣的教育與文化，其根本原因應該是基於它健全的組織與人事。（《中基會》，頁212）

但說明中基會對中國的影響較其他庚款委員會為大，並不同於中美文化交流本質的探討，且引文中「健全的組織與人事」在書中未有清楚交代。雖然在這段文字後，作者引用胡適的一段話作為其註腳，但這也只是說明美國對基金會的人事採取了不干涉的態度，以致流弊較少。反觀第一部份，作者指出國內的政治動盪影響了基金會的人事安排（《中基會》，第一章第四節）及國內其他人士對基金分配的質疑（《中基會》，第三章第一節），這些爭議在結論沒有呼應，而且也沒有進一步深論。此外，作者於第二部份雖將中基會的工作作清楚的介紹，但是其分配原則與爭議卻放在第一部份（《中基會》，第三章），因此第二部份的論述雖有就各項因素分析中美文教關係的企圖，但是這些想法零散地分布在第四至六章中，削弱了說服力。

相對而言，《美國科學》的章節環環相扣。在三個階段中，第一部份與第二部份是由建立協和醫學院的論爭加以扣合，第二部份則以留學獎學金與第三部份相扣。另一方面，美國科學與社會的進展也交織在這些論述中，交代了這些觀念轉折的起點與傳遞。這種扣合論述的特點，

<sup>14</sup> Furth, 頁902。

筆者以為有二：一者巧妙掩飾作者對這個複雜問題的掌握能力。捨去一些枝節的論題與活動（如五四運動），以理論為基調加以整合，使歷史發展脈絡特別清晰，或可說是作者的論述策略，使讀者極易掌握作者的論點。其次是對一些本來不相關的議題作巧妙聯繫，使讀者驚訝其特出的觀察。例如作者在處理第三及第四部份的轉折，以留學作為交換中美科學視野的手法，不僅交代出第四部份中國科學會社活動與美國科學與社會論爭的關聯，更巧妙的避開美國基金會在華主導權逐漸衰弱的事實，用「觀念傳遞」維持全書的統一性。

然而如前所述，由於其論述的取向強烈沿襲社會學者「科技輸出」的依賴理論，因此這本書不但有資料的問題，也有理論的問題。其中最大的就是依賴理論所強調經濟政治與文化的依存，往往忽視被殖民國家的文化狀態與文化依賴的管道。就本書而言，中國或許在「新式科技」方面，與當時的美國有許多差距，但是畢竟在其他方面與單純的「後殖民國家」截然不同，因此在論述「科學與人生觀」的爭議時，作者不但單純的將人生觀的一方化約成純粹與科學敵對的一方，更忽略即使所謂「儒家」對於科學知識，也有許多分殊的看法（《美國科學》，頁196-197）。這種忽略所顯示作者對中國文化的低估，不僅是資料不足的問題，也反映其理論對一個文化久遠的國家並不那麼適用。

此外，要用依賴理論時，也必須注意依賴程度的問題。雖然從中基會的董事與諮詢專家名單中顯示受美式科學訓練的學者居多，<sup>15</sup>科學發展也偏重於幾個大都市（《美國科學》，頁213），但並不足以說明近代中國形成與美國的單純依存關係。當然，在二十世紀初科學社群與科學發展的移動確自德國移向美國，<sup>16</sup>然而作為各國勢力角逐場的近代中國，沒有理由在科學發展上只受到美國影響，如清末民初以來大量赴德、日留學生，在回國任職後，亦對中國現代化科技有重要貢獻，但顯然遭到忽略。總之，作者在視野上侷限於美國觀點，使得在運用依賴理論探討科技移植的問題時，忽略了中國對外複雜關係所產生理論適用性問題。

15 《中基會》，頁13、頁79所列中基會中華籍董事與所聘用諮詢專家的名單。

16 關於科學研究社群的移動與科學家於國家地位的轉變，可參見Joseph Ben-David, *The Scientist's Role in Society, A Comparative Study*（臺北：雙葉書局翻印，年代不詳）。

## 五、結語

以上簡單將《美國科學》與《中基會》在內容與寫作方式的差異，大致做了說明。筆者想指出民國科學史研究中，各種不同取向反映相異觀點與詮釋歷史的問題。總結以上，Peter Buck科學社會學取向的研究，偏重章節的鋪排與呼應，有強烈的問題意識與完整的結構，反過來說，以史料填補理論與過分急躁地簡化、一般化問題是其缺失；楊氏歷史學取向的研究，在結構上偏重時間序列的陳述，因而問題的呼應失之鬆散，但對史料的嚴謹與敘述的約制，使其陳述紮實與可靠，是其優點。

作為中國科學史的研究者，在研究與學習上往往徘徊在「中國觀與世界觀」、「科學與歷史」、「西方理論與中國史料」等衝突的觀念中而無所適從。筆者以為，從以上相異詮釋的比較中，或許有可借鏡者。無論如何，科學史這個新興學科，在科學與歷史的邊界上開始得到學者的垂青，著實令人興奮與鼓舞。筆者希望日後國內能出現更多各種角度的研究與論述，也許那時才是對這些林林總總研究取向作出公論的最佳時機。

修改於1995年6月，再改於1995年8月

###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稿約

- (1)本通訊蒐集近代中國史研究之各項資料，俾供研究參考，園地公開，歡迎各界惠賜未出版之稿件，中、英文不拘。
- (2)本通訊為半年刊，每年三、九月各出刊一期，一、七月底截稿。
- (3)來稿除特約者外，以不超過五千字為宜，請依本刊格式用有格稿紙謄寫，電腦打字稿並附磁片尤所歡迎。
- (4)來稿請署真實姓名、詳細地址和聯絡電話。
- (5)本通訊編輯委員會對於來稿文字有酌改之權。
- (6)採用之稿件，致贈作者當期通訊三份。
- (7)來稿請寄台北市南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收。

# 典範的危機與危機的典範：

## 黃宗智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的綜合評述 評論座談會紀錄

時間：民國84年8月24日上午10~12時

引言人：范毅軍先生

出席者：王國斌、王樹槐、史蓮娜、呂芳上、余敏玲、張瑞德  
陳永發、黃克武、葉其忠、賴惠敏（依姓氏筆劃序）

紀錄：陳南之

范毅軍：今天我所扮演的角色，是開一個話頭，希望大家能踴躍發言。黃宗智（Philip Huang）主要的著作是《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北京：中華書局，1986；香港：牛津出版社，1994）及《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1350-1988》（北京：中華書局，1992；香港：牛津出版社，1994）這兩本書，至於《中國研究的規範認識危機：論社會經濟史中的悖論現象》（香港：牛津出版社，1994）一書是黃宗智近年來在雜誌上以英文發表的文章，由大陸方面翻成中文，香港牛津出版社將其結集成冊出書，並非新著。《中國研究的規範認識危機》談到的問題比較大，內容實為黃宗智對他以往研究成果的綜合評述與引伸，書中所提出的研究理念及看法在前兩本書中大都可以看到。

我覺得書有兩種寫作方式，一種是用很簡潔、流暢的文字，就能將很複雜、深奧的道理講得很清楚，讓大家容易接受，知道作者要講什麼；另外一種則是用很複雜的文字，來表達一些其實很多人都已經講過而且很平常的道理。舉兩個很強的對比，費孝通近年來有關江蘇農村鄉鎮企業問題及改革開放後他個人觀察的著作，就屬於前者；而黃宗智的書即屬後者。下這種論斷可能因為我對他的研究範圍不陌生，但也可能是我個人的偏見。一個學社會經濟史的人，對於相關研究或著作有相當涉獵的，看黃宗智的書，會覺得他所說的內容其實很簡單，大家或多已瞭解，只是經過他的分析方式和名詞重新包裝以後，反而被弄迷糊了。

為了方便討論，我先向各位報告前兩本書的內容摘要，再做簡單的批

評，接著請各位參與討論。

在《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以下簡稱《華北》)一書，黃宗智開宗明義的指出，農民具有三種性質，一是農民具理性，有如小資本家般精於算計，利用勞力，經營自己的農場，而且是為了謀取利潤而生產；第二，小農的家庭生產主要是為滿足其家庭消費，並非為了追求最大利潤；第三，小農經濟基本上是剝削與被剝削的封建經濟。黃氏並將華北農場分為經營式及家庭式二種。所謂經營式農場，指的是地主擁有面積100畝以上、200畝以下的田地，除了自己參加農作外，並有雇工助其經營；家庭式農場則是完全靠一己之勞力耕種，沒有雇工。經營式農場可因雇工工作不力，將其解雇，而家庭式農場的勞工都是自己家庭成員，這些人不能被解雇，所以小農式的農場在勞動力的運用上有其不合理的成分。

黃宗智經營式農場的概念應該受羅崙、景甦合著的《山東經營地主》這本書的影響很大。

黃宗智認為華北雖然存在經營式農場，畢竟沒有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而農民在家庭式農場運用過密化的耕種方式，只能維持最基本的生存條件，且因沒有脫離土地，也無法走向如西方社會的無產階級之路。所以即使華北經營式農場運用勞力較合理，仍與家庭式個人農場一樣，基本上都未能脫離傳統小農經濟的生產形態。

上述華北兩種農場皆起源於清初的圈地政策下的莊園，莊園後來逐步分解，形成經營式農場和家庭式農場，這是黃氏對華北農業經營歷史背景簡短的敘述。莊園經濟的分解及經營式農場、家庭式農場的發展，其前提是一種商業化的過程。華北農村存在小農階級不斷的分化，農民身分是流動的、會變化的，而變化的前提是商業化。商業化始於16世紀以來華北開始種植棉花。商業化引起人口增加，富農種棉花提高利潤，貧農種棉花則提高其維持生計的能力，所以富農(包括經營式農場)和貧農(家庭式農場)共同推動了農業的商品化。

到了19世紀帝國主義入侵之後，中國被捲入世界經濟體系，黃氏認為此舉並沒有使傳統的小農經濟崩潰、分解，走上資本主義或無產階級化之路，反而使得小農經濟過密化的經營方式更為加強。農業商品化更強化時，則小農經濟更強固，黃宗智的分析邏輯基本上是如此。

在商業化發展的前提下，黃氏基本認為小農的生活絕對沒有變好，而是越來越壞，特別是帝國主義市場經濟對中國小農的影響究為如何，這個



論點是黃氏與Loren Brant、Thomas Rawski、Ramon Myers等其他學者不時爭議的焦點，附帶提到這一點。

作者提到經營式農場不能進一步發展的原因。他認為地主如要自己參與經營，農地最多只能維持在200畝以下的面積。超過200畝以上，地主必須雇用更多的人力，甚至得雇工頭來管理農場，農場主可能認為這些工資的付出划不來。因此經營式農場面積至多維持在200畝以下，多餘的土地，農場主或者予以出租，或甚至搬遷入城，脫離土地，轉謀求功名利祿，而晉身另一個階層，脫離土地。這是黃宗智對於經營式農場為什麼不能進一步擴大經營規模的一種基本看法。

至於家庭式農場得以長期存在，則是小農採取過密化的生產加上手工業生產及受雇勞動所得到的輔助性收入，使得家庭式農場可以勉強維持一個家庭生計，雖然長期處在飢餓的邊緣。黃氏強調，小農為維持基本生存，往往投入過多的勞力，勞動力使用極不合理。事實上，只要能夠維生（survive），他可以利用各種方法，緊緊抓住一小塊土地，不願離開農村，這是家庭式農場能維持的主因。

其次，黃氏提到國家與農村之間的關係，兼及政治權力及農村內部組織的問題。在華北農村裡，家族的力量在村裡並不是很顯著，國家與農村的接觸主要靠鄉保，一個鄉保可以管轄二十個左右的村莊。

簡而言之，黃氏認為華北的小農經濟是以商品化發展為前提下，由於人口過剩或階級結構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他始終強調商品化是華北農村分解重組的主要動力。而商品化、人口過剩及階級結構的相互作用延續了好幾個世紀，形成了所謂內捲化、階級分化的雙重趨勢，此構成華北農村經濟的基本特徵。這樣的經濟體系非常脆弱，很容易受外力影響而顛覆。黃氏這種說法主要在imply後來共產黨何以在華北興起。

第二本《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1350-1988》（以下簡稱《長江》），作者野心蠻大的，整本書跨越六百多年的歷史，以1949年為分界，分為兩大部份。1949年以後的部份，主要是他在長江三角洲的一些田野調查紀錄，並隨時加入他自己的評論。

黃氏在《長江》書中提出一個很有趣的看法，長江三角洲自明清以來長期的商品化現象，帶來的並非小農家庭式農場的削弱，而是進一步完善化與強化。眾所皆知，長江三角洲商品化的程度要比華北高得多。黃氏認為當地在二十世紀商品化進一步顯著發展時，小農經濟型態亦隨之強化，

農村生產則更趨於過密化。也就是商品化程度越高，農村生產就更過密化。而特點是長江三角洲根本沒有華北那種經營式的農場存在，純粹是小農的家庭農場。原因是從勞動力的供應而言，黃氏以為江南地區工資昂貴，雇工經營農場是划不來的，所以長江三角洲不可能出現華北那種經營式的農場。

作者進一步強調過密化的結果造成單位工作日勞動力的報酬遞減，長江三角洲家庭式的農場，其商品化的加強及農村經濟的強化，主要是靠大量勞力投入。拿長江三角州與華北比較，華北的婦女一般較少參與勞動，江南地區的婦女、男女老少包括小孩都大量投入勞動，無視於邊際報酬的遞減，仍投入過密化的勞動。總之，從華北到江南，黃宗智反反覆覆的就是強調農作的過密化與內捲化。

一談到江南地區小農的市場行為時，作者又重複華北小農的基本性質，他認為小農經濟主要目的是為餬口，而非進入市場，謀取利潤。華北地區由於自耕農的比率比較高，相對而言，租佃比例較低，所以農業商品化主要由於小農為了謀生，為買而賣，販售自己生產的精緻糧食，換取較粗糙的糧食自用，即為了生存附帶謀利，而推動商品化。江南地區則因租佃比率較高，佃農繳交的地租歸商人或地主所有，屬於剝削式的商品化，而非趨向於資本主義式的商品化。這是黃氏對商品化的詮釋。

至於19世紀末期以來，帝國主義與農村經濟的關係方面。黃氏認為帝國主義入侵以後，影響較大者皆發生於城市中，而且是有正面作用的。相對於農村而言，與華北相同，只是導致小農成長進一步的過密化。帝國主義的入侵除了對城市有正面作用，並造成農村過密化之外，在長江三角洲地區亦形成新的經濟體系，即城市的工業發展，透過商人以為媒介，跟農村的過密化連結，使更強化。他並進一步指出，小農經濟何以在長江三角洲維持，甚至加強，乃是跟華北一樣，當地過剩勞力的投入，使過密化更形強化。

農村組織及農村與國家爭權的問題，作者以為江南地區的農村裡，宗族或家族的力量顯然較華北有作用。三角洲地區有力量較強的同族集團，村裡的同族集團影響力較明顯，而鄉保的力量則較為薄弱，村際關係不如華北地區那樣密切。

大體而言，黃宗智對華北和江南農村經濟的特徵，基本觀點同樣是生產過密化或內捲化，而過密化發展的前提則是商業化。

說來巧合，早在1982年我就發表過一篇〈華北農村聚落的形成及土地問題〉，我運用三個村的資料，而這些資料在黃宗智研究華北地區時所佔份量不輕。至於在長江三角洲的部份，我這幾年正從事上海、蘇州和松江一帶的相關研究，除了無錫沒有觸及外，恰好與黃氏的研究範圍完全重疊，有關的地方志或鄉鎮志書我也看了很多，在這樣的基礎上，我提出一些對黃宗智研究的看法。

首先，黃氏提出所謂「中國研究的規範認識與危機」，他認為當前中國經濟史研究多基於一個前提，即商業化會促進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及現代化，這樣的前提則源自西方的馬克思及亞當斯密。也就是說很多研究中國經濟史的人，受到馬克思及亞當斯密不當的影響，先入為主以為商品化必然會導致資本主義的發展。且不論學者是否普受馬克思及亞當斯密的影響，黃宗智對馬克思與亞當斯密學說的詮釋本身就大有問題。亞當斯密本身並沒有強調商品化會導致資本主義，亞當斯密的主要貢獻為提出市場經濟在英國社會扮演一個invisible hand的角色，以引導其經濟行為；基於對歐洲各國經濟的觀察，馬克思提出商品化的概念，但他也並沒有強調商品化必定導致資本主義化。資本主義社會的前提是商品化，但並不表示兩者有必然關係。黃宗智對商品化定義不清，又曲解亞當斯密與馬克思，在這樣一個前提下，其研究適足以進一步混淆而非澄清問題。

1993年，大陸方面舉辦了一個討論會，《中國史研究》、《中國經濟史研究》和《史學理論研究》編輯部邀請三十多位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史學者討論黃宗智的書。與會學者自己多認為他們並沒有以為馬克思或亞當斯密曾提出商品化會導致資本主義的說法，或受其影響。受其影響的說法純粹是黃宗智自己強加在這些人頭上的帽子，然後再說這些人是錯的。其實黃宗智提出規範認識的危機，完全是憑空想像出來的。而其如此獨斷之論，不僅造成誤導，對研究者亦不公平。

黃氏批評的其實正是他自己應被批評的。在書中他一再提到商品化沒有使中國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只有更加強中國小農過密化的生產方式。黃氏自己的規範認識危機正是他以為商品化必會導致資本主義化。他本人相信不論在華北或江南地區，商品化會導致資本主義化，結果沒有，所以中國有其獨特的經濟發展模式。這就是黃宗智多年來的研究要點。

至於商品化又是什麼？黃宗智這兩本書商品化的前提如此重要，卻不見他在書中慎重處理過有關「商品化」的問題。華北地區的商品化始於清

初以來的種植棉花，此說引自從翰香對華北農村植棉的研究，他甚至說從的研究超過西嶋定生的研究，是很了不起的貢獻。其實那只是一篇paper，我本身對那篇paper持保留態度，而黃宗智利用這份二手著作，就大發議論說華北棉花普遍種植引發商品化，或高度商品化。可是他從來就沒有明確指出過「商品化」到底是什麼意義。

商品化內容本身相當複雜，但在黃宗智的書中看來，好像只不過是市場裡出售的東西多了一點，就是商品化。商品化所帶動的諸如政府政策、市場制度的健全、財產權的保障，商品流通是否順暢、有效率，交易成本能否降低，這些複雜的內容，黃宗智隻字未提。他只不斷提醒你商品化。但秦漢就有商品化，隋唐時期也有商品化，日本人甚至說宋代有商業革命，是否在當時就隨之會產生資本主義？明清時代華北商品化程度如何，江南的商品化又如何，這麼重要的前提他卻完全沒有處理。因此其整個立論基礎，根本是非常空洞的。這是黃宗智在理論方面重大的缺陷。

其次是過密化、內捲化的問題。黃氏自己在書中也很清楚地提到過密化實際上就是勞動力邊際遞減，這是一個很重要也很普通的經濟學原理。從經濟學角度來看，這是極為普通之事，在西方及其他地區都曾發生，英國工業革命前農業生產就經常面臨這種困境。可是到了黃宗智手上，用過密化和內捲化等詞彙來詮釋華北和江南地區的農村經濟發展，我覺得反而造成認知的混淆。其實是很簡單的道理，被他說得複雜極了。一般學者對小農經濟傳統的說法就是男耕女織，生產緊緊的跟土地結合在一起，勞動力和家庭副業都沒有走出這樣的格局。這種說法對研究中國經濟史學者而言，已經成爲一種常識，這被黃宗智用新名詞重新包裝一遍，讀者辛苦地解讀過後，恍然道理不過爾爾。

黃氏有關過密化或內捲化的分析，其實犯了很大的錯誤。我舉例言之：黃氏始終強調勞動力和土地的關係，他指出江南地區的養蠶種桑，勞動力投入所得到的邊際報酬較種稻還要划不來，這是他引李伯重的研究數據所做的詮釋。但他根本沒有考慮到種稻的土地本身就是一種成本，養蠶者通常不需要將土地成本計入，雖然其勞動力投入較密集，養蠶、紡紗織布者免除土地成本支出，報酬難道不會比種稻好嗎？在中國的農村裡，土地是生產極重要的一種成本，而影響生產報酬又絕非只有勞動力的付出與土地，還有很多其他外在因素。舉現在的例子說，王永慶要蓋六輕，頭幾年根本是賠本經營，處於負債狀況，且必須不斷投入資本，提列折舊，但

並不表示將來沒有發展，而是投資以待將來得以累積更大的資本。我們必須從這個角度來考慮一個生產事業的運作，而不能只看王永慶現在雇了幾個人，賠了多少錢，不能單純以勞力因素論斷報酬之高低。養蠶種桑亦同，產品將來投入市場後，如果市況佳、利潤好，可以累積更多的資本。黃宗智對於生產因素的考量非常狹隘，翻來覆去地強調土地和勞力的關係，對於市場等外在因素，各種有利、不利的影響，包括生產成本都未加以深入考慮。

黃氏對1949年以後的農村發展，還是用過密化概括之。作者舉工分值為例，所謂工分值即每個勞動人口參與勞動後給予評分，每得一分可以換算為多少錢，亦即勞動力的報酬率。黃氏就工分值估斷，認為1949年以來每個人的勞動平均回報是越來越低，因為土地有限，人力投入越多，工分值降低，農民實質報酬減少，這適足以證明過密化的現象。但在1993年的討論會上，大陸學者即對黃宗智此觀點加以批評。他們說農民所得工分值實際上已經扣除成本和上繳國家的稅收，沒有把這部份算進來，就斷言工分值在降低，這個前提根本是錯的。

至於黃氏劃分華北經營式和家庭式農場的作法，我個人覺得這種劃分方式容易造成誤導。其實黃宗智自己也講過，相對於歐洲中古的莊園或大農場機械化的經營，華北的農場經營方式基本上是以小農經濟為基礎，只是有的較富有，有的比較窮。同在小農經濟的基礎上，人為、武斷的劃分經營式農場和家庭式農場，對於瞭解華北小農經濟的特質又有什麼貢獻？

黃宗智整個研究重心在土地和勞動力的關係。我個人覺得中國小農經濟的問題不僅於此，更在市場因素，關鍵在市場是否有效率及流通順利與否；如湖南或安徽的米運到長江三角洲，米價成本已經上漲不下五、六倍之多，癥結在此。三十年代文獻中，經常看到「穀賤傷農」或「豐收成災」之類的字眼。稻米收成後，不論是小農自賣或化為地租由地主轉賣，畢竟是一種商品，商品如何流通，是很重要的因素，然而黃宗智對此始終不談，完全忽視。

關於華北和江南鄉村組織權力結構的問題，黃宗智對村本身的組織架構並沒有交代清楚，華北多旱地，村民聚集而居，一個村不論在戶數或人口都較江南的村來得多。江南多水田，村庄多是散村，可能三五戶、十幾戶在一起，並不集中。如黃氏文中所提華陽鎮，鎮這個單位，對於市鎮研究者而言，通常以為就是以華陽鎮區為主，事實上當地人稱鎮還包括其周

圍的散村。所以黃宗智拿華北兩個村來作比較，其實是兩個不同基礎的單位，以基礎不同的單位來比較其組織、權力結構或宗族影響力，完全沒有意義，體制完全不同又焉可作一種輕率的比較呢？

黃宗智很強調具中國特色的經濟發展的道路，強調1949年以後農村集體化對促進農業發展的貢獻。改革開放以後，他強調鄉村手工業的發展對改革開放起的重要作用，並隱約提及與城市的關係。黃宗智的主要觀點是農村本身的工業化、自主性，進一步和城市掛鉤，農村的過剩勞力透過工業化的道路得以輸送出去，導致改革開放的成功。他特別強調鄉村手工業的主動積極貢獻。

費孝通曾為文指出，在文革期間，鄉村工業的開頭是大城市主動送下來的。大城市主動把一些不合效益或因城市動盪不安無法繼續生產的工業移植到農村，農村完全是由外在因素被動接受工業；黃宗智則強調，農村工業的自主性發展。實不知黃氏罔顧事實、如此強調的動機何在？

另外就研究材料的運用方面舉例，黃氏對於十九世紀後半江南農村市鎮變化的問題，曾以表顯示該鎮何時興起、衰落，受何因素影響等，我可以跟各位講，黃宗智那個表的解釋錯誤極多，某個鎮興起和衰落時間、原因，黃氏完全混淆。類此錯誤在黃的書中不止一端。此不一一列舉了。

**黃克武**：黃宗智是怎麼搞錯的？是他看錯書還是用了不當的地方志，或是判斷錯誤？

**范毅軍**：簡而言之就是以偏概全，斷章取義。以前例言之，他以十九世紀後半的地方志材料編製成表，而沒有考慮到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前期或更早的演變，以此妄下結論，難免失之武斷。我個人取材時間就從該城鎮出現的年代直至1980年代，觀察六、七百年來在不同時期的發展趨勢，錯誤當可稍減。

**賴惠敏**：我可以證明范先生的說法沒有錯。今年七、八月我到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看資料，該館人員開玩笑地說，用不著那麼認真逐年、逐件的看檔案，像黃宗智先生都挑著看，每隔了三十年才挑幾件看。我笑稱自己笨，非得徹底看個首尾，否則抓不到重點。

黃宗智討論清代前期的小農經濟和莊園經濟，大部分是引用大陸學者的研究論文。這些論文在六、七十年代寫成，多半有一套歷史分期的理論背景，講農奴社會轉為雇工社會等等。事實上，他們討論清代的莊園幾乎都沒有閱讀內務府的檔案，所以對莊園的組織和內容不清楚。舉例來說，

作者引用李文治、楊學琛的研究說清代莊園和旗地，約佔全國可耕地74,000萬畝中的2,000萬畝。事實上，400萬畝的皇莊中，有許多屬於牧場地，並不是可耕地。就內務府會計司的檔案記載，清初的皇莊大約有五百多個，隨著歷朝皇帝分封給諸皇子，到清末時只剩下兩百餘個。每個莊園的面積是18頃，半莊為9頃，如此算來皇莊再怎麼多也達不到400萬畝的地步。

其次，作者稱清代莊園為「經營式莊園」，究竟是誰在經營？莊園組織中莊頭也只是奴僕身分負責收租，莊園裡有壯丁和莊頭家的親丁，同樣是皇室的奴僕。這些奴僕人口滋生快速，以致於乾隆皇帝釋出大量壯丁為民籍。我們從內務府莊頭處檔案，或者會計司檔案看來，關防衛簿冊乾隆朝以後莊園的佃戶仍稱莊丁、親丁。其中莊頭處的戶口清冊多達數千冊，記錄每個莊園中壯丁家庭歷史，從乾隆朝到光緒朝有一百年以上。名義上，莊頭、親丁、壯丁仍屬於皇室奴僕，並非雇工。只是在乾隆年間對莊園收租方式改變，由對丁課稅改為對土地課稅。其次，由實物租改為貨幣租，造成莊園佃戶身分隸屬內務府關係逐漸鬆弛。乾隆年間另一項改變就是莊園的佃戶長期耕種莊園土地，可以典當自己耕種的地畝，造成土地權的多元化。

另外，黃宗智將清代華北農村視為莊園經濟，那也不正確。我們看《中國農村慣行調查》幾個河北、山東地區的村落，有些村民對莊園制度一無所知。這顯示清代圈地所造成的旗地與民地交錯的複雜問題，也不是大師揮筆一畫所能概括的。我很高興在這個研究環境裡，可以笨笨的看檔案，慢慢地寫文章，不用提出什麼偉大的理論架構。

**王樹槐**：我認為范先生評論得非常對，黃宗智先生的思想或詮釋方法有問題。就史學方法而言，黃氏以工作日生產率來看問題，和Thomas Rawski等人以人的平均生產量不同，黃氏以此為基礎，得出與他人不同的看法。如果說他有何貢獻，大概是在研究方法上較細密而已。但是他有些觀念極不合邏輯。黃氏說有些人認為商業化必定走上資本主義。其實商業化只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要條件之一，而非唯一條件，既然不是唯一條件，絕對不能說「商業化必定走上資本主義」。這樣的論斷，似未注意到邏輯問題。

其次，勞動生產率的發展，在經濟學上最簡單的說法是邊際報酬率的遞減，一定單位面積的土地上，再增加勞動力將使報酬率成拋物線狀下

降，作者好像認為那些研究經濟史的人連這點都不懂。工業化和城市化是否相隨的問題，其實城市與鄉村的發展，未必同時發生，因城市化對鄉村的影響有好有壞，不能以偏概全。如果不談歷史事實，就憑假定來思考問題，很容易看出作者把他人的想法一點也不用邏輯基本觀念來評論。他人是否如此說，也頗有問題。

黃氏將亞當斯密和馬克思看成一類，說他們都用英國的經濟經驗作為立論基礎。兩人所討論的範疇不一樣，就馬克思而言，可能如此，他看到英國資本主義不好的一面，而建立共產主義學說。而亞當斯密所討論的是經濟理論，不是建立在英國資本主義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其基本假定「大多數人是自私的」，由此而引申出價格論、競爭論；因為如果人不自私，價格高低對其有何區別，也沒有競爭的必要。而黃氏將英國經濟發展經驗視為亞當斯密的立論根據。他要推翻亞當斯密的理論，就必須推翻「人是自私的」的基本假定。實際上他不能推翻。既然不能推翻，則亞當斯密與馬克斯不可同一而論。這種作風和考慮問題的方式令人不敢苟同。

大陸的發展基礎在於鄉村工業化，工業化採用資本主義的方式。前些日子我看到一則報導，可能是過去鄉村工業化帶來一些成就，但去年一年，卅萬個鄉村工業倒閉，其失敗原因，實值得深入檢討。一個缺乏民主、法治的國家，鄉村工業能維持經營與發展，實有其困難。今天要解決中國的經濟或人口過密問題，工業化當然是必然的道路，資本主義式的工業化必須以法治和民主為後盾。

黃氏還強調研究歷史必須先從歷史事實下手。這點學歷史的人大都知道。學理僅供參考，不可能完全套用既有模式。除了考證歷史外，還必須知道其他學科有些什麼觀念，可以幫助我們以不同角度思考，絕不是先有結論，再找事實填充。黃宗智最大的問題在於不借用理論。我認為理論的用途主要在提出問題，探索問題，如何approach，不是提供答案，也不是為了理論去找答案。我們生活在這個時代裡，具備這個時代的知識背景，提供我們提出問題、找尋答案的方向；而幾千年前的社會背景與我們目前社會不同，古代人看問題的方式或研究方法自有不同。以往地方志裡對天災人禍發生，另有一套解釋，認為那是一種上天的懲罰，我們如果也以這種角度視之，豈不開玩笑？總而言之，看黃宗智的書，就如范先生所言，令人相當失望。

**史蓮娜**：我想請問平均一戶小農家庭人口數大約是幾個？



**范毅軍**：傳統看法，中國的家庭大約是以每戶五口來估算。平均每戶人口以三至八人佔最多數，十人以上屬於少數。取五口之數亦非絕對，僅做估算而已。

**陳永發**：我只是就有關中國共產黨史的部分略表意見。在這部分中，我想黃宗智想要表達的是以下這個論點：中國大陸實行農業集體化政策以後，因為走入指令性計劃經濟的歧路，所以農業部門的過密化問題比傳統農業還要嚴重。在鄧小平時代，中國大陸實行包產到戶政策，恢復家庭農業，但是家庭農業並不必然比集體農業有效率，集體經濟仍然有其優越性。鄧小平時代的鄉鎮企業就是證據。由於鄉鎮企業的發展，中國的農業終於走出「有成長而無發展」的陷阱，而這個鄉鎮企業便是以集體所有為主的。

關於這個輪廓，我基本上沒有太大意見，但是關於黃宗智如何證明這一論點以及他在論證過程中造成的印象，倒有一些不成熟的看法，願意和大家共享。

第一、黃宗智的論述，似乎為了強調毛澤東對農業建設的貢獻，有意漠視了土地革命的暴力本質。黃宗智強調他所研究的薛家埭和沙井村的土地改革都是和平的，和韓丁(William Hinton)所研究的張村不一樣，我想他沒有說錯。問題是：在1950年代初期的決策中，中共中央反對「和平」土地改革，鼓吹階級鬥爭。所以我們有理由問：到底薛家埭的土地革命是典型呢？還是張村的土地革命是典型？這兩個問題非常重要，因為這和我關懷的另一個問題息息相關：中共的黨組織能夠深入薛家埭的各自然村，這究竟是因為中共的權威和指令所造成的被動性，還是因為參加階級鬥爭所引發的主動性呢？

第二、黃宗智似乎過分強調毛澤東和鄧小平兩個時代的連續性，所以他說在毛澤東時代，農業部門推行集體化政策，但是家庭農業仍然健在。而在鄧小平時代，雖然推行包產到戶政策，但鄉鎮企業則是以集體所有為主。關於這一個論點，我基本上雖然同意，但仍然覺得，與其強調兩個時代的連續性，不如強調兩個時期的斷裂性：在毛澤東時代，當激進路線當政時，家庭農業，包括自由地、家庭副業和農村自由市場，是遭受嚴重打擊的對象，而在其他的時候，家庭農業雖然存在，但缺乏理所當然的正當性，僅視為彌補集體化農業不足而不得不加容忍的現象而已；但是在鄧小

平時代，家庭農業的正當性受到國家肯定，理論上已不再是政治歧視的對象，而可以堂而皇之地發展。

另外，黃宗智在提出前述論點時，主要目的是針對有人把集體所有制等同於社會主義，家庭農業制等同於資本主義，而要有所釐清。可惜他並沒有清楚地告訴我們，什麼是資本主義？又什麼是社會主義？所以讀者依稀中覺得，他也承襲了他所批評論點的基本前提：家庭農場就是資本主義，而集體所有制也就是社會主義？其實，問題那如此簡單。對中國大陸當前政經體制稍有理解的人都知道：毛澤東時代鼓勵自力更生，鄧小平時代追求市場利潤。即便如鄧小平所強調，追求市場利潤不算是資本主義的經營方式，是否表示：只要鄉鎮企業是集體所有，便證明中共實行的還是社會主義？這個問題見仁見智，不可能有固定答案，但是值得深入探究。

第三、黃宗智對毛澤東的革命採取完全正面的評價，所以在批評農業集體化政策時，把農業集體化的問題歸結於推行指令性的計劃經濟。似乎毛澤東推行農業集體化而不推行指令性計劃經濟，中國的農業就不會出現高度過密化的問題了。問題果真如此嗎？中共從實行統購統銷政策以後，農業政策便不得不走向集體化的道路。理由很簡單，國營商工業體系無法和上億的人農民直接打交道，農業集體化則可以減少國營商工業體系直接打交道的單位。中共的農業集體化政策，從一開始便和推行指令性計劃經濟聯在一起的，兩者不能分開考慮。尤其不能把農業集體化的毛病完全歸咎於指令性計劃經濟，而說農業集體化的政策本身毫無問題。

第四、黃宗智在家庭農業和集體農場的兩個選擇中，無疑是偏向後者的。所以在討論農業集體化時代的農業只「有成長而無發展」的現象時，強調這都是因為沒有扼止住人口成長所致，好像在中國大陸農業集體化和人口快速成長不必然是同時發生的。黃宗智在理論上確實可以把農業集體化和人口快速成長區分成不相干的兩回事。可是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中，毛澤東加速農業集體化，甚至展開大躍進，成立人民公社，其中最重要的考慮便是動員勞動力從事大型水利的興修。由於這種策略突顯的問題是勞動力不足，所以毛澤東在1958年發動大躍進以後，還會對他在反右運動中原已放過的一馬——亦即提倡新人口論的馬寅初——展開文字圍剿。其實，黃宗智自己也承認，農業集體化後，人口隨即以比較高的成長率成長；中共的農業集體化政策既然本身便是人口快速成長的動力，又如何將兩件事分開，只要農業集體化的好處，而不要它的壞處呢？

第五、黃宗智一再強調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對中共農業的貢獻，幾乎令人忘記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他以華陽橋為例子，強調大躍進期間大興「水利、鄉村工業和資本化副業三方面的巨大進步」。但是從他所舉的奶牛場和梨園兩個例子來看，我們只知道它們源於大躍進時期，而真正的大發展則是在1980年代。再說水利方面的建設，恐怕沒有人能夠完全否認大躍進時期水利建設的貢獻，問題是黃宗智並沒有提供具體的資料，告訴我們大躍進期間薛家埭究竟興建了那些「平常時期」不可能興修的水利工程，而其實際成效又如何？同樣的，黃宗智強調大躍進的災難，原因半在錯誤管理，半在自然災害。他以薛家埭經驗為證，說薛家埭從1960年到1962年都發生自然災害。問題是：薛家埭的經驗在中國是否典型？而我們從黃宗智對薛家埭經驗的描寫中，也無法斷定三年減產，究竟是因為劉少奇所說的「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還是毛澤東所想像的「七分天災三分人禍」？關於文化大革命，黃宗智強調薛家埭在工業方面「有類似於大躍進的新進展」，但他沒有告訴我們這一個新進展究竟是源於毛澤東文化大革命政策的內在邏輯，還是文化大革命所沒預料到的後果，他也沒告訴我們薛家埭的農機廠和襪廠是如何發展的，如果沒有鄧小平的市場改革，這兩個工廠當時會像1980年代發展那樣快嗎？

第六、關於工分制，也有可以補充的地方。黃宗智關於毛澤東時代只有成長而無發展的說法，是很難懷疑的，但他根據工分值來討論單位工作日勞動報酬遞減現象，這確實值得商量。中共實行工分制以後，農民按照工分分配集體所得。這裡的工分值只是就「分配」的集體所得來計算的，但是實際所得之中，除了用在再生產的部分以外，還有公積金和公益金之類等未分配的所得。如果把不分配的實際所得排除在計算之外，則如何證明單位工作日的勞動報酬在持續遞減中呢？再說，工分制中帶有強烈的平均主義性質，如黃宗智所指出，農民中有不少的浪蕩工存在，那我們如何保證在工分計算的過程中每一個工的投入都是真正等值的呢？再說，黃宗智很清楚的指出，1979年許步山橋生產隊工分值的增加是因為政府提高農產品的收購價錢所致，這裡我們馬上就連想到另外一個問題：亦即這一年工分值的增加是否代表單位工作日勞動報酬的增加呢？難道產量減少，農民不可能因為政府提高收購價格而得到比較高的工分值嗎？

**張瑞德：**黃宗智這兩本書的英文原著在美國得過很重要的獎項，因此很可以代表美國的學風。中國近代農業面臨報酬遞減的現象，在黃氏以

前，早已有Dwight Perkins、Mark Elvin、趙岡等學者提出，不過每個人所用的材料不一樣，說法亦稍有不同。引言人具體指出黃氏運用材料錯在何處，很好。另外一個例子是，黃氏在比較自耕農和雇農收入時，所用的只是一個村莊某一年的材料，我們不知道其他村莊的情形如何，也不知道此一村莊其他年代的情形如何。所用材料如沒有代表性，即易流於以偏概全。

美國學界的優點在鼓勵提出大的說法，但是用以支持這個說法的資料，往往不夠充分。國人的缺點，則在於只知作細小的研究，只能見樹而不能見林。兩種學風如何截長補短，是值得思考的方向。

**王國斌：**很高興看到台灣對於黃宗智的書也有很細膩的評論。在研究方法上，我們可以說黃宗智史料運用有缺點或不足，也可以說他在理論上或解釋現象的方法有些問題。另外，黃氏說明中國經濟史上幾個現象時，看他的書，以為他是第一個有這麼新看法的人，我認為這是值得商榷的。他不太承認他的看法跟過去有何關係。比方說，黃宗智對於人口過剩問題的看法與趙岡的某些看法其實很接近。

談到第三本書，我覺得他開始講得似乎很有道理。大家都同意，即研究中國史要從中國史實開始，無庸置疑，但是問題在哪？黃氏主張要把西方的研究成果及分析方法都放棄，這種作法其實是有問題的，也是不可能的。我們的研究方法永遠受外面影響，沒有一個人能說我只是看中國經濟史上的史實，沒有受外界影響，也沒有人能說，我完全不必看其他東西。因此他所說只要看中國的不要看西方的，只會讓研究者更盲目而已。身為研究中國經濟史的人，最大的希望和最終的目標就是讓中國經濟史的研究成果，在世界經濟史上佔一席之地，讓西方研究歐美等地區的經濟史學者也承認中國經濟史的發展有其特殊性，並與其研究成果作比較。然黃宗智在《中國研究的規範認識危機》一書中所倡言的，卻和這個目標背道而馳。

**王樹槐：**剛才提到生產報酬率，大家都把政策、價格與生產報酬率連在一起，實際上不是這樣算的。生產報酬率與政策、價格無關，是以單位面積生產量來計算的。

**陳永發：**我自己是個經濟史的門外漢，要評論黃宗智的書，我還不知從何下手。很多人認為他的書很重要，我也蒙他贈送了幾本，於是檢出來細看。看過之後，還認為作者的觀點蠻有意思的，不會覺得它們有什麼問題。後來自問為什麼第一次看的時候沒有發現問題，我認為這是對於大的

政治環境如何影響我們思想這一個問題太缺乏反省。像黃氏一提出內捲化的觀念，我也沒有細究其形成過程，就囫圇吞棗的接受。不過看黃宗智的《華北》，還是覺得內捲化的問題到共產黨統治中國時代已經解決，恐怕是不對的。就我所知，共產黨一向強調密集農業，而且勞力密集，所謂運動，就是勞力密集，勞力缺乏就搞運動，藉以提高生產規模。看黃氏的《長江》時，集體化果真帶來類似問題，而且勞力更密集。中國大陸上有一句話形容農村經濟，說集體化過程中增產不增收，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另外，我還看過一份文章，它說中國大陸上的農民減少一半，農村生產力還會提高，難道這些話說的不是內捲化嗎？

在《長江》書中，鄉鎮企業成爲中國明日的救星，不過爲了維護毛澤東時代的集體化成就，整本書特別強調集體化過程對後來的影響。但是作者在書中並沒有提到城鄉工業的限制，它所帶來的破壞、污染以及人口失控等負面影響，整個問題非常複雜，不如我們想像中簡單。黃書中隻字不提鄉鎮企業的破壞性和侷限性，給我的感覺是，鄧小平施行的既非資本主義，亦非社會主義式的經濟，而是有中國特色的經濟路線，好像已經走出一條路來，希望果真如此。

最根本的問題是，我們置身於這個時代環境中，對所受的影響，因爲沒有充分反省，對某些事物有固定的看法，認爲有些事情就是這樣，不去仔細想它，像黃書所說的工分值問題，是證明毛澤東時代農業過密化的關鍵部份是否成立？猶待商榷。但如果沒有仔細思考，便會覺得理所當然。

**范毅軍：**黃宗智書中還有個「以糧爲綱」的笑話。黃宗智認爲全中國所有地區都種糧食，才可稱爲以糧爲綱，如果只有百分之八十種糧食，百分之二十種蔬菜、水果，就不是以糧爲綱。像這種事情，根本沒辦法和黃宗智再討論下去，他的common sense很奇怪。

**陳永發：**這確實是一個很嚴重的失誤。共產黨曾喊出「以糧爲綱」的口號，全國一刀切，當時是自然經濟，追求的是每個地區的經濟自主，在這樣的目標下，糧食成爲農業生產的重點。可是共產黨走的也是指令性的計劃經濟，除了吃飯，還要佐以菜餚，炒菜就得要油，所以就算是「以糧爲綱」，也會有經濟作物的生產計劃。受「以糧爲綱」的影響，地方幹部在選擇作物，多半會選擇糧食作物，但也不得不根據指令性經濟計劃栽種經濟作物，只是經濟作物所佔比例較少而已。等到進入市場經濟，「以糧爲綱」的口號廢止後，很明顯的，經濟作物的種植面積絕對提高了。黃宗

智認為「以糧爲綱」就是全國統統種糧食，其他作物一概不種，絕對沒有這回事。他還拿這點來反駁人家，說人家講錯了，其實人家完全沒有錯，跟他所說的也沒有矛盾。

**范毅軍：**和田清編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一書中的序言中，有一段很有趣的追憶。大意是和田清請教加藤繁，身爲一個外國人，能夠把中國歷史研究得和中國人一樣好嗎？加藤繁的回答非常有意思，他說就純知識來講，我們絕對不會比中國人差，只有common sense或文化直覺方面趕不上中國人而已。其實很多研究是要依賴文化直覺判斷的。

目前全世界研究中國明清社會經濟史作得最好的恐怕是日本人。有人說日本人研究問題範圍很窄，但是我要告訴各位，單看某位日本學者的研究成果，你會覺得他的研究領域狹窄，然日本學界多是師徒一脈相傳，把這個教授門下所有學生的研究成果總體觀之，會發現這個學派的研究領域絕對不窄，而且自有其廣闊的看法。

我個人以爲，在明清社會經濟史方面，要趕上日本人的成就，包括中國大陸的學者，都還要很長很長的時間。這不單是努力的程度問題，眼光、學風和基本態度都與日本人相差甚遠，再很多年可能都趕不上。至於西方學者，可以趁王國斌在台灣，找機會再作討論。

綜合評述黃宗智的書，我講一個小故事。大概在1987年左右，有一天Evelyn Rawski到Stanford University，我和她在商學院餐廳聊了一個鐘頭，其中大概有四十分鐘是在批評黃宗智《華北》的那本書。最後我問她，既然我們都同意他的書有這麼多問題，爲什麼還能得獎？Evelyn Rawski說，這還是一本好書，可以引起如此廣泛的討論。

事隔多年之後，重讀黃宗智的書，關於Evelyn Rawski稱其爲好書，大不以爲然。如果透過黃宗智的書，想多瞭解中國明清社會經濟史或1949年以後的發展，代價與收穫將非常不成比例。如果各位日後教書，他的書可以作爲另一種示範，至於要真正學到東西，1949年以後的部份可以參考費孝通的著作，他的書值得一看再看。

不過在此倒值得一提的，是我當年與Evelyn Rawski對談後的直覺感受。那就是西方學術上有一個了不起的批評傳統。不管對任何人包括老師的研究成果，你都可以批評，但也不吝於肯定它的貢獻，這種傳統讓人受益良多，非常愉快。不像中國學者，可能批評到最後變成絕交。我相信今天座談會的發言都是建設性的批評，希望多少能夠扭轉一點這種積習。

## 新書評介

康熙皇帝一家。楊珍著。北京，學苑出版社，1994年10月，438頁。

近年來清帝列傳，從努爾哈赤到宣統帝，為大陸坊間書店流行的暢銷書。有些眾所熟知的皇帝，其傳記尚不只一本。這些傳記的共同點是以清實錄為主要參考資料，寫各個皇帝如何被選定為皇儲，即位後又如何治理內政、外交等等。《康熙皇帝一家》也趕上了這個風潮，不過作者的用心卻是不同的。

本書作者楊珍女士，早先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上班，後來任職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現為副研究員。她在檔案館時隸屬滿文部，長年與滿文資料為伍，所以對康熙朝的滿文檔案如數家珍，十多年來她辛苦地累積自己翻譯的滿文奏摺，才寫出與眾不同的歷史。依照清代宮廷的習慣，有關皇子、皇孫的事情，絕少用漢文來寫作。由於文字的障礙或者翻譯費時等因素，一般研究清史的學者，很少觸及皇帝家庭歷史，皇帝宮廷生活鮮為人知，也因此更顯出本書的可貴性。

《康熙皇帝一家》一書，共分九章，還有四個附表。第一章描述康熙幼年時期，康熙出生後被送出紫禁城外避痘，和父母分居兩處，到順治十五、六年出痘後回京，他的父親順治皇帝迷戀董鄂妃，並生死相許。康熙的生母佟佳氏地位不高，在宮廷中長期被冷落，於康熙即位後不久病故。所以康熙年老回憶幼年生活，感慨地說：「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歡」。第二章作者描述早年失怙的康熙皇帝幸得慈祥的祖母孝莊文皇后照顧，悉心栽培他，一方面教導康熙學習史書；另一方面傳授康熙為政經驗。康熙帝號稱「少年天子」，他能順利清除鰲拜集團、平定三藩，實際上是倚賴孝莊文皇后之運籌帷幄。康熙皇帝和孝莊文皇后祖孫相處三十餘年，感情深厚，在康熙的《聖祖御製文集》中表露無餘。孝莊文皇后是皇太極的皇后，歷經三朝，康熙從她那裡學到幹練的政治經驗。這種治國經驗的傳承，奠定清初康雍乾盛世的基礎。第三章敘述康熙嫡母孝惠章皇后，即順治的皇后，一位平庸、與世無爭的皇后。康熙

對她極為孝順，譬如康熙帝出巡時，總為嫡母送來當地特產，並賦詩。同時由作者引用的滿文奏摺，我們也瞭解孝惠章皇后盡己所能地關懷皇兒。康熙母子相處六十餘年，關係相當的融洽、和諧。第四章則寫康熙的后妃們。康熙的后妃共有55人，作者花很大篇幅討論后妃的家世、帝妃相處情況，譬如康熙南巡或行圍時，寫信告訴妃子們各地見聞，以慰藉與世隔絕的深宮女子。

本書第五章討論康熙的皇子們，也是本書的重要章節之一。康熙算是歷代皇帝中生育最多的皇帝，共有55位兒女，第一位皇子允禔和最後一位皇子相差44歲，說明康熙的生育期很長。康熙皇帝相當重視皇子的養育和教育，從皇子們追憶寫成的《庭訓格言》一書，看出康熙培養皇子允文允武，煞費苦心。不過作者也指出，康熙皇帝忽視對皇子的品德教育，使他們養成驕縱習氣，對師長、大臣缺乏尊重，這是康熙對諸子教育中較薄弱的環節。本章中有些作者獨特見解，第一、作者從滿文奏摺中看到康熙與諸子間的親密關係，作者分別用「天倫之樂」、「憂心忡忡」、「無時不在的關懷」、「睹物思親」、「熱愛皇父」、「慈父戲兒」這樣的標題來描述父子間的親情。第二、作者描述康熙如何利用皇子分班值宿大內的方式，訓練他們辦事能力。原來康熙皇帝每年去熱河避暑的五、六個月中，皇子分班值宿大內，已形成一項不成文的規定。康熙晚期缺乏重要的輔政大臣還能順利推行政令，完全仰賴諸皇子的治國才幹，這也顯示出康熙晚期對諸皇子的倚重。第三、作者引用許多的滿文朱批奏摺，認為康熙於廢太子後，屬意皇十四子允禎為王位繼承人。關於康熙晚期的儲位問題，很多研究清史的學者都提出不同看法，最主要在證據不足，作者推測以允禎為繼承人的說法，似乎亦陷入史料不足的困境。

第六章敘述康熙的20位女兒，其中有一位是領養的，其餘的19位女兒有10位女兒早卒，有9位獲得封號並且下嫁。作者對於下嫁公主的生活著墨頗多，從中可以瞭解清代貴族婦女生活面貌。譬如后妃、公主讀《內則衍義》之類的書籍，學習三從四德。第七章討論康熙的兄弟子姪，康熙和皇兄福全手足情深。一方面由於福全個性唯謹唯慎，對弟弟處處謙讓；另一方面康熙對兄長也極盡厚待與優寵。對於福全的子孫們，康熙也關懷備至，譬如為他們種痘等等。相對來說，康熙對待兄弟常寧和常寧之子態度略有不同，可能是他們也捲入諸皇子爭奪儲位的漩渦。



雖然如此，康熙對侄子、侄孫還是持著寬厚的態度，以致於諸侄子等人養成放縱不拘的貴胄習氣。第八章討論康熙母家的外戚，生母佟佳氏來自漢軍正藍旗，是清初征戰南北的功臣佟國賴之女。雖然康熙帝不斷提拔母家的親戚，卻有不少外戚捲入王位繼承問題，導致康熙與親戚們關係緊張。第九章敘述傳奇性的人物——蘇麻喇姑的一生，她是孝莊文皇后的隨身侍女，聰明伶俐，曾經制定清代的衣冠飾樣。康熙年幼時，由她負責教導滿文。作者從內務府官員奏報宮中食用豬肉、蔬菜數額，來瞭解蘇麻喇姑在宮中地位，也饒富趣味。本書作者耗費於史實考證的工夫相當深厚，蘇麻喇姑僅是一位名不見經傳的人物，她都能累積點點滴滴的滿文資料，將蘇麻喇姑一生綴補成篇，指出她在清宮史上的重要貢獻。由此可見作者是一位敬業的歷史學家。

這本書的優點是網羅各種史料，來描述康熙的家庭生活，有起居注、傳教士的報告、滿漢文奏摺、清人筆記文集、官方文獻等。雖是嚴謹的歷史著作，也幸未淪於經院學究式的八股文章。作者娓娓道來康熙帝從小到大，各個成長階段。康熙早年被祖母呵護長大，娶妻生子後，如何照顧家人。把康熙皇帝寫成一位有血有肉的君主，他內心中的喜怒哀樂躍然紙上，讓讀者瞭解康熙帝原來也就是活生生的人。這樣的寫作手法相當引人入勝，雅俗共賞。作者不厭其煩地描寫康熙家庭和樂的一面，讚揚康熙所營造的溫情世界，由此顯示出女史寫作的細膩層面。

我們從這本書可以瞭解康熙皇帝是個多情的人，但他不像父親順治帝那樣，與董鄂妃生死相許。也不像賈寶玉對身邊女子泛愛、不知節制。康熙的愛謹守儒家所說的：「發乎情、止乎禮」。譬如對他的皇后、妃子們，給予必要的關懷，卻也不特別恩寵。妃子也不會因受寵而僭越等級。他為人子、為人夫、為人父，都克盡職守，努力維持大家庭的和諧關係，達到儒家的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準則。

作者從康熙的感情世界來描述他的家人，是不是非常合適？我們就康熙後期的諸子繼承風波來看，從情感來討論康熙一家，似乎有所欠缺。因為康熙兩度廢掉皇太子允礽，以致康熙去世時，繼位問題成為謎題。諸皇子間權力衝突往往不是親情所能掩飾的，我們從《雍正起居注冊》上看到雍正將他的弟弟允禩、允禵幽禁高塔中，狂亂致死，那有什麼手足之情？另外，從《清史稿》王公年表中統計，宗室王公緣事革退的人數，自康熙20年到39年有30人，40年到60年被革退者有24人。被革

退的王公多半係和康熙同祖父或同曾祖的愛新覺羅氏，他們被革退後不但喪失尊貴的爵位；同時財產充公，奴僕入官，失去經濟來源，這豈是康熙「手足懿親」該有的表現？本書中作者對於康熙廢掉皇太子允禛的前因後果沒有很詳細說明，也許她有意再寫一本著作詳加討論吧！尤其像康熙諸子與王公大臣結黨，那麼複雜的事情恐怕也得再深入研究才能說得清楚。

歷史學家畢竟不是醫生，講到一些病症問題，很多時候是作者自己的猜測而已。譬如作者以為康熙在年輕時候盡心服侍祖母，及守喪過哀以致種下的年老時候高血壓及心臟病的病根。（頁44）後來又說康熙年老時手顫、頭暈目眩，是腎虛陽衰徵象，並說康熙此時品嚐到早婚多妻所帶來的苦果。（頁164）如果說康熙腎虛陽衰，那麼又如何解釋康熙在53歲到63歲期間生了五位皇子，而且無一早卒。（頁161）雍正之母烏雅氏素有痰疾，因康熙逝世，舊恙舉發，遂至大漸，作者斷定她患氣管炎、哮喘一類病症。（頁149）如果係氣管炎、哮喘，應該屬於慢性疾病，不至於在幾個小時內就病逝？關於痰症，也有可能是中風所引起的，說不定烏雅氏患的是中風。對於這些皇帝、皇后的病症，或許作者可查閱中國第一檔案館所藏的清代太醫院的醫生處方。

作者本身經歷文化大革命的磨難，還能寫出那麼溫馨細膩的歷史著作，表示作者是一位性情中人。雖然她引用的史料有侷限性，以致無法看出康熙家庭中親子、兄弟權力鬥爭的冷酷一面，但瑕不掩瑜，本書仍然值得一讀，作者投注十餘年的時光專心翻譯滿文檔案，才能發現像康熙皇帝內心的世界，其實不過是一位仁慈的君主。康熙不斷地學習儒家的精神來治家、治國，作為未來君主治國的典範，開創康雍乾盛世的契機。許多歷史學家描述康熙時，不免論及他的豐功偉業，本書作者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康熙皇帝，顯露他更平易近人的一面，不愧為新穎的歷史寫作。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賴惠敏□

***Zhou Enlai: The Early Years.* By Chae-Jin Le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241pp.**

在中共的芸芸開國元勳中，周恩來的公眾形象要算是最少姿采和最具傳統風範的。他沒有陳毅的詩意豪情，沒有賀龍的剛烈雄猛，也沒有鄧小平三起三落的傳奇性，更沒有毛澤東那種「數英雄還看今朝」的狂放不羈。相反，周恩來自「參加革命」以來，一直平步青雲，成為中共政壇稀有的「不倒翁」；他待人處事從來予人以穩重嚴明、慈厚溫和的印象。與中南海袞袞諸公相比，他的私生活更顯得嚴謹，沒有遺下多少風流韻事，招人話柄。

這幾年，專肆批判揭露中共領導人的陰暗面的作品大行其道。即是周恩來也得到毫不例外的對待。艾蓓的《叫父親太沉重》便是透過私生女的敘事角度，以小說的筆觸揭露他的一段不為人知的婚外情。但真真假假，至今仍是一個謎。周恩來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物？

李教授花了十年時間寫成的《早年周恩來傳》，頗異於目前流行的揭密傾向；作者筆下的周恩來溫文儒雅，聰敏好學，充滿個人魅力。但此書也不同于大陸黨史的「歌德」傳統，沒有把周恩來描繪成「永遠正確」，從生下來開始便是領導群倫、救國救民的革命英雄。同時，比起其它一些海外的周恩來專家（如許芥昱、Dick Wilson），李教授相當幸運。這幾年大陸不少重要檔案陸續解凍，他得以看到大批剛開放的珍貴資料。所以《早年周恩來傳》是一部材料豐富、立論中肯的好書，有助於我們進一步了解周恩來的生平。

此書只著眼於周恩來的早年生平，寫到他在歐洲遊學參加革命為止。在這短短廿六年間，作者分成四個階段：童年（1898-1913），求學「南開」（1913-1917），負笈東洋（1917-1919）以及「五四運動」時期。這個按照思想演變及成長經歷而分期的敘事結構，簡單明晰。

周恩來的童年生活頗為坎坷。他在1898年3月5日出生於江蘇省淮陰縣的一個官宦世家。但到其父親一代時，家道已經中落。未滿週歲，周恩來便被父親周貽能過繼給即將去世的叔父。在傳統大家庭的環境下，他與生母及養母同居一室，再加上呵護備至的乳娘。周旋於她們中間，李教授指出：他自小便養成善知人意，排難解紛的能力。另外，由於周

父懦弱無能，長年在外為生活奔忙，沒有為兒子提供「男性權威」的典範，導致他以後在潛意識下一直尋找「假父」代替（surrogate father），缺乏強勢領袖慾，無法獨當一面。

12歲時，兩個母親先後去世，父親又無力撫養，周恩來便被送去奉天投靠在那裡當官的伯父周貽賡。周貽賡待這個聰明伶俐的姪兒如己出。但對幼小的周恩來而言，這畢竟是寄人籬下，加上要面對陌生的北國環境，他成熟得很快。他不久便在當地的小學以出色的寫作能力和溫順的性格，贏得了老師的鍾愛，並同學間建立威信。

在這裡，我們清楚看到了作者的研究方法。李教授在資料的整理和考證上很見功夫，發掘了不少鮮為人知的史實（特別是周恩來並非過繼給一般傳說的周貽康）。而且，他在這些史實的基礎上提出了一些頗有新意的觀點。例如：儘管周恩來早年喪母，父親又少盡責任，周恩來卻從來沒有因此而像廣泛流傳的變得慍怒和憤世嫉俗。相反的，他同情失意落魄的父親，對其孝順如一。他也因為長期受到叔伯輩的愛護和照顧，對傳統家族制度深為認同。所以作者認為少年周恩來是一個儒教信徒。

然而，李教授只注重資料的累積、爬梳，忽視理論。其實撰寫人物傳記不單需要史識，也需要理論素養，才能把傳主的意識演變和歷史意義提昇出來。正由於作者缺乏特別是心理分析學的知識，他對周恩來的童年經歷只能夠總結出一些浮光掠影，甚至牽強附會的論點，沒法有系統地歸納出這段經歷與其日後形成的思想性格的結構性關係。比如：為何在成長期缺乏「男性權威」的周恩來會在成年後難以獨當一面，而同樣缺乏父愛的瞿秋白卻是鋒芒畢露，年紀輕輕便當上中共總書記，而自小喪父的蔣介石更是領袖慾特別強烈？為何與兩個母親一起生活便會自然產生出「和稀泥」的性格？

周恩來15歲時（1913）考入天津南開中學，四年後畢業。他以出眾的儀表、謙和的風度和漂亮的文采成為校中廣受尊敬的學生領袖。但不像早年的毛澤東或蔡和森，他這時期對實際政治不感興趣，只熱衷於學術活動，在思想上，他明顯是受到校長張伯基的影響，傾向於精英模式的自由主義，相信中國的復興端賴於國民道德的提高。為了實現理想，他立志於追求學術真理。同時，周恩來在以後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性格特徵，也在這時期開始形成：他待人處事負責周到，務求一絲不苟，卻又

不露鋒芒，只愛躲在「幕後」默默工作；他謙讓儒雅，人緣極佳，就連校董嚴修也想把女兒許配給他！

中學畢業後，周恩來去日本留學。與大多數留學生一樣，他先到「東亞預備學校」修讀日語，希望在一兩年後考取公費，進入「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或「第一高等學校」深造。當時蘇聯十月革命爆發不久，社會主義成爲日本知識界的辯論熱點。剛離國門的周恩來很快便對日語失去了興趣，終日沉迷在研讀有關社會主義的各種書報（特別是河上肇的暢銷書）。他不大適應日本的文化環境，生活圈子很窄，來往的都是「南開」的校友；也沒有參加當時留學生中間各種鬧烘烘的政治活動。

這時期有一件事影響了周恩來的一生。大陸的黨史學家（如胡華）一直認爲他在1919年回國是爲了直接參與「五四運動」，但根據李教授的研究所得，周恩來回國其實是與政治無關。相反，他離開日本是因爲他三次考試皆名落孫山，再加上經濟困難，故決定回天津入新辦的「南開大學」。這是一個典型的歷史必然性例子：假若他能順利考上第一高等高校，憑藉他過人的天資和文采，或許會變成一個大學者，那麼中國現代史將會大大改寫了。

周恩來在「五四運動」時期的活動，早有詳盡的研究，此書也沒有太多新發現。李教授相信，周恩來的另一個重要轉變是發生在歐洲。1921年他出獄未幾便遠赴倫敦和巴黎求學，但與在日本時一樣，他因外語欠佳和經費不足，再次與大學無緣。但這次他卻決定放棄學術追求，轉而全力投入共產主義運動。這年春天，周恩來在張申府的引薦下加入巴黎中共小組。張申府本來是北京大學的哲學講師，早有文名，是得到陳獨秀的委託到歐洲開展活動，張自恃學問好資格老，爲人高傲，與大部份活躍份子格格不入。惟獨是個性謙讓，待人誠懇的周恩來能夠與他合得來，也同時得到其它黨員的支持愛戴，所以在1923年2月，當「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正式成立時，年方25的周恩來被選爲執委會書記，正式開始他長達半世紀的政治生涯。

《早年周恩來傳》以豐富的資料，清楚勾勒出周恩來的早期經歷，並有力地證明了他的儒家意識。但正如前述，此書對少年周恩來的內心世界和思想形態缺乏深入細緻的分析。縱讀全書，我們始終難以了解爲什麼他會轉變信奉共產主義？我們更不知道他的童年經驗如何影響他日後的政治性格？我們也不知道他的感情生活以及承受挫折和作抉擇時的

內在緊張 (inner tension)，只希望李教授能夠出版「下集大結局」，深入探討周恩來在成年以後的思想生平，解答這些疑問。

□University of Illinois Urbana 歷史系·傅葆石□

**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呂芳上著。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71)，1994年8月，503頁。

五四運動發生七十年來，褒貶毀譽隨時空起舞，至今尚未形成主流性的定評。然而，至少有一點是所有研究者都能承認的，那就是：五四運動是中國政治、社會、文化全面地從傳統走向現代的分水嶺。

五四首先以學生運動的方式呈現，學生作為中國社會中一個新興階層而言，則是社會變遷過程中的新產品。呂芳上教授在《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一書，開宗明義地說，五四運動之出現，與受西式教育之「新學生」階層之興起，有著直接關係。這是呂教授一個很重要的觀察，這表示，五四及其後類似的運動，即呂教授所謂的「後五四學生運動」，本質上都是「新學生」的一種新理念運動，因為是學生運動，所以是純潔的，卻也是粗糙的；因為訴諸理念，所以雖然每個人都在關心現實，最後卻不免要走入烏托邦。

「新學生」與舊日士大夫的不同，除了人數和受教育內容有極大差異之外，最主要的，還是在於是否具有「現代性」(modernity)這一點上。依據S. N. Eisenstadt的分析，「現代性」這個概念，五、六十年代的學者和七十年代的學者，在解釋上就有顯著的變化。而兩個世代的學者都能同意的「現代性」特質，則共有三點，即社會流動 (social mobilization)，結構差異 (structural differentiation)，和不停參與的要求 (demands for growing participation)。<sup>1</sup>這三項特質，舊日社會固然也不是完全沒有，如何炳棣教授即曾有專著證明明清士大夫的社會流動性

<sup>1</sup> Shmuel N. Eisenstadt, *Tradition, Change and Modernity*. (New York: J. Wiley & Sons, 1973). Also, "The Changing Vision of Moderniz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Wilbur Schramm and Daniel Lerner, eds., *Communication and Change: The Last Ten Years and the Next*. (Honolulu: The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76), p.41.

頗強，<sup>2</sup>而歷史上士大夫自身對社會的參與及對平民的動員，更是眾所周知的事。但是，由於教育普及，專業化和社會多元化程度的巨大差異，五四時代的新學生，在對「現代性」特質的掌握上，是遠超過舊日士大夫的。這基本上解釋了，為什麼以士紳階層為骨幹的辛亥革命，只能是一次政體變革，一般社會大眾均未受波及，遑論參與；直到以「新學生」為主力的五四運動爆發，整個社會才開始進入群眾動員狀態，<sup>3</sup>加速邁向現代化。

五四及「後五四」時期的學生運動，與中國社會現代化之間，既然有著如此密切的關係，學運，這個「反官方」而又未受我國學界普遍注視的課題，實在值得我們再三致意，否則，整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研究，便少了運動的主人翁，徒見上層建築，而無視其根基了。

呂教授的《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一書，運用中國國民黨黨史會檔案，及浩如煙海的報章、雜誌、年鑑、史料輯集、專著等，將民國8年到18年間的學運，作整體勾勒，從成因、性質、規模、過程、內部權力運作、社會力量互動，到具體影響，無不源源本本，首尾有據。其中「浙江一師」風潮及「女師大」事件兩個個案研究，更是深入纖微。所謂嚐一臠而知鼎味，讀了這兩個個案之後，對書中所統計的五四及後五四時期248起學運學潮，其錯綜複雜的內情，當能有所體會。書中所附各種統計數字及圖表，尤具參考價值。

但本書又不只是研究學運本身，長達四百多頁的篇幅，有一半在探討學運與政治勢力之間的關係，對北伐前後國民黨、共產黨和青年黨三黨爭取、操縱「學運權」的史實，有詳實的描寫，對國民黨推行「黨化教育」和在這場「希望戰爭」中終於落敗的命運，亦有客觀分析。書中引述蔡元培在國民黨中全會上要求取消青運之提案說：「本黨之青年運動，則在運動學生，使犧牲其課業，犧牲其學校之秩序，以專一從事於激動之工作，可謂有義務而無權利。」（頁407）學運被政黨如此利用，

2 Ping-ti Ho,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

3 群眾動員是經濟和政治現代化的必備條件，動員程度常被視為測量現代化程度的重要指標，如投票即為政治動員的一種具體行動。這方面的重要理論，可參看Daniel Lerner, *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4). Lucian Pye, *Politics, Personality and Nation Building*.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2) 等。

難怪整個二、三十年代學潮迭起一無寧日，也難怪一代青年多有意氣而無實學。學生又是中國現代化運動的先鋒，先鋒既有勇無謀，氣剛而識陋，現代化大業之顛沛箕箒，其來有自。呂教授書中大量引用這類「內幕性」史料，讀之發人深省。

在正常狀態下，學運，無論規模如何龐大，在本質上都應該只是一種非常態的突發性事件，五四運動剛一發生時，就是這樣一種「正常」性質。然而，由於五四學生運動「戰果輝煌」，在其後頗長的一段時間裡，軍閥政府急欲壓制，新興政黨急欲利用，帝國主義侵略與社會貧窮愚昧則一如故我，遂使中國二、三十年代的學生運動欲罷不能，由偶發事件變成「常設業務」，學生不但建立了類似西方工會一樣的全國性組織動員能力，更設官分曹，創設農、工、商、婦女等各部，意圖領導農運、工運、婦運。是則學運本身經自我膨脹後，早帶有社會運動和政治運動之性質，而成爲民間社會（civil society）一股常態力量。這股力量，已不是東漢太學生或明代江南生員所能比擬的。<sup>4</sup>

五四知識分子大都帶有強烈的浪漫性，<sup>5</sup>作爲知識分子階層中的「謝公生小偏憐女」，五四學生參與政治和社會運動時，少不免會帶上烏托邦主義（utopianism）色彩。如1919年底。從湖南第一師範學校畢業的毛澤東，就在《湖南教育月刊》上發表〈學生的工作〉一文，說：「我數年來夢想新社會生活，而沒有辦法」，「今春回湘」，「乃有在岳麓山建設新村的計議。」毛氏的「新村」，是要將「舊的家庭、學校、社會」，這些「屬於舊時代的、無從改良的組織」，都唾棄不顧，而重新建立「新家庭、新社會」，創造「新生活」，建立「模範村」。<sup>6</sup>

五四時代規模最龐大、引起爭議也最多的一次學生「新生活」實驗——工讀生互助團計劃，最能代表這種烏托邦傾向。工讀生互助團在北京

4 明代江南生員的「學運」，有許多地方與五四及後五四的學運相似，可資比擬。有關資料，可參看傅衣凌，〈明代後期江南城鎮下層士民的反封建運動〉，收於氏著，《明代江南市民經濟試探》（台北：谷風，1986），頁129-144。宮崎市定，〈明代蘇松地方の士大夫と民衆〉，《亞細亞史研究》4（京都：京都大學東洋史研究會，1964），頁321-360。

5 See Leo Ou-fan Lee, *The Romantic Generation of Modern Chinese Writer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6 毛澤東，〈學生的工作〉，原載《湖南教育月刊》一卷二號（1919, 12, 1），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澤東早期文稿編輯組編，《毛澤東早期文稿，一九一二·六～一九二〇·一一》（長沙：湖南出版社，1990）。



初發起時，有些贊助人如胡適、陶履恭等，以為這只是學生的半工半讀計劃，「靠自己的工作去換一點教育經費，是一件極平常的事。」但執行計劃的學生領袖如王光祈、施存統等人，則抱著遠比打工求學更為遠大的野心，他們要試驗克魯泡特金式的「無政府互助」生活，團員每日工作六小時，讀書三小時，收入歸公，生活費由團體供給，團員須脫離家庭、婚姻、學校，以示與「舊秩序」徹底決裂。他們認為，這樣可以將「中國人個個都造成一個完全的人」，從現在的小組織實驗開始，「希望將來底社會都變成工讀互助團，就是成爲一個工讀互助團的社會。」<sup>7</sup>

學者早已指出，從柏拉圖的理想國一直到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烏托邦思想大都過份強調人類「大同」，尤其是強調意識形態之普遍劃一，因此容易流入集權主義（Totalitarianism），如 Lewis Mumford 所說：「有太多的古典烏托邦思想，以威權主義之理念爲基礎，傾向專制，形成過份集中、僵化的政治系統。」<sup>8</sup>工讀互助團和後來左翼的共產主義運動，右翼的藍衣社、「新生活運動」等，在建立威權主義的「烏托邦共和國」這一點上，其精神是相通的。

李澤厚以爲，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基於「救亡」的迫切需要，才放棄了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等「啓蒙」理念，以集權方式拯救國家民族，使「救亡」凌駕於「啓蒙」。<sup>9</sup>其實，在學生和知識分子普遍地要以烏托邦主義解決問題的時代精神下，「啓蒙」和「救亡」的理念之間，是不會有清楚的定義和界限的。以工讀互助團爲例，它的最終目標是教人做「人」—這當然是「啓蒙」的理念，但實現做「人」的方法，則是要有嚴格克己以謀團體幸福的紀律和犧牲精神，這便又成了不折不扣的「救

<sup>7</sup> 有關新村和工讀互助團之詳情，可參看拙著，〈中國近代新村運動及其與日本的關係〉，收入拙著，《新思潮與傳統》（台北：時報出版公司，1995），頁235-282。

<sup>8</sup> Lewis Mumford, *The Story of Utopias*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62), p.4. 關於烏托邦主義與集權政治的關係，並可參看 J. L. Talmon,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 Democracy* (New York: Praeger, 1965). Waldeman Gurian, "Totalitarianism as Political Religion," in Carl Friedrich, ed.,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Grosset and Dunlap, 1964), pp. 119-137. 吾師馬思樂先生對此尤有所發揮，見 Maurice Meisner, *Marxism, Maoism and Utopianism*.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2)。

<sup>9</sup> 李澤厚，〈啓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收於氏著，《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台北：風雲時代出版社，1990），頁1-54。

亡」意識。從嚴復開始有系統地輸入西方近代思想和價值觀念以來，一直到中共建政，包括胡適在內的中國知識份子，並沒有一個人要宣揚西方任何一家純粹而完整的自由主義或個人主義學說。嚴復譯述約翰·彌爾（John Stuart Mill）的*On Liberty*（中譯《群己權界論》）一書，所發揮的除了十八、十九世紀英國自由主義思想外，也混融了儒家「絜矩之道」和宋儒「爲己之學」<sup>10</sup>。胡適在提倡「易卜生主義」和杜威（John Dewey）思想的同時，又用更熱情的筆觸宣揚社會不朽說，要人犧牲一己的小我，以成全社會的大我。<sup>11</sup>這說明了，近代中國並沒有類似西方那種純粹人文啓蒙的理念，「啓蒙」、「救亡」、「烏托邦」之間，一直是沛然一體的流露，一經切割，便有見樹不見林之虞。

學生運動本身既帶有濃烈的烏托邦色彩，則它和新興政治勢力之間，恐怕不只是一種單向利用和被利用關係（當然會有這種成份），而也是一種兩情相悅的自然結合。就學生的立場而言，他們是自動自發的在追求「新生活」和「新秩序」，而當時國民黨和共產黨的號召，正好與學生的要求相符合，所以他們樂於參與，勇於犧牲，雖槍林彈雨而不顧。這也解釋了呂教授書中所提到的，爲什麼當蔡元培抱著對青年學生的歉疚之情，提案要求國民黨中央取消青年運動時，學生反而會有受到侮辱之感。因爲從學生的觀點看來，他們是在滿懷理想的驅使下，義無反顧地自願參與的。說他們被利用，他們自然覺得受到強烈羞辱。從這個角度看來，政黨利用學生的熱情和理想以遂一己之目的，固大有可議；但若果漠視青年的烏托邦訴求，以取消青運的方式阻截學生對社會的參與，則後果更將是災難性的。五四及後五四的歷史，不幸正在這種軌跡上發展。

呂芳上教授對國民黨黨史資料的掌握和精闢理解，在民國78年出版的《革命之再起》一書中已展露無遺。本書基本上仍以黨史資料之充份運用爲主，而將方向集中到青年運動上。筆者近年來以新文化運動爲主要研究對象，而較集中於思想學術層面，所以對呂教授這本研究學生運動的專著，除了肯定其重建歷史真相和詮釋歷史意義的貢獻外，也想從思想史的角度提出一些看法，供呂教授參考。個人覺得，呂教授如果繼

<sup>10</sup> 參看拙著，〈嚴復自由觀的三層意義〉，《漢學研究》13卷1期（1995: 6），頁43-59。

<sup>11</sup> 胡適，〈不朽：我的宗教〉，《胡適文存》第一集第四卷。

續研究學生運動，似乎還可以注意一下學生運動從明清以來的特質和變化，再從明清以來中國現代化進程這個大格局著眼，找出學運在近代史上的深層定位。呂教授在這本書裡，比較注重發掘政黨通過青運政策和經濟支持利用學運的史實，這當然是令人深感興味的重要史實。但正如上面所提到的，學生並不覺得自己在被利用，他們認為自己在為民族（或全人類？）的前途奮鬥，在為真理作見證。顯然，學生組織在仰賴政黨政治和經濟支持的同時，它們和政黨之間，應該還有不可被忽略的理念結合，這理念結合的力量，解釋了學生最後為什麼投向延安而非南京。我們今天都知道這些理念不過是個烏托邦。但是，正如近代烏托邦研究之父 Thomas More 所指出的，烏托邦乃是「希望超過期望」的一種模範，它的目的，正是要超出人類所能實現的現實，在現實之外，建立一個道德模型來批判現實。<sup>12</sup>學運本來就是對現實的批判，它的烏托邦色彩是必然的。一個有健全機能的社會，一定會有適當的位置可以安托烏托邦，只有當社會機能不健全或不發揮功能時，烏托邦才會直接侵入現實疆界，而發生災難。

□漢學研究中心·周昌龍□

***Passivity, Re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 Intellectual Choices in Occupied Shanghai, 1937-1945.* By Poshek Fu.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261pp.**

誠如本書作者在引言中所說的，長期以來，中西史學界對抗戰時期淪陷區的研究，始終未脫政治史的範疇。這與歐洲——尤其是法國——對納粹佔領時期的多方面探討相比，的確失之於偏狹。本書正是打破這種局限的一項新嘗試。

作者以戰時上海為中心，分析上海的文人（包括詩人、小說家、劇作家和散文家等）在日本佔領下所面臨的政治和道德抉擇。透過這樣的分析，作者不但希望呈現戰時上海的社會和文化面貌，而且希望探索知識分子在政治壓迫下的自處之道，其寓意固不僅限於一時一地而已。

---

<sup>12</sup> Thomas More, *Utopia*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afts, 1949), p.8.

在觀察淪陷時期的上海文人時，作者借用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描述明清之際士大夫政治態度的三種模式：隱遁、守忠、變節，而歸納出「消極」、「抗日」、「通敵」三類表現，並各以一名或一伙文人為代表。全書除「序論」概述上海淪陷經過、「餘論」重述書中主要論點外，即根據上述歸納而分成三章，每章自成首尾，結構清晰。

上海於1937年8月13日起爆發戰事。作者指出，「八一三」實為八年中日戰爭的真正開端（頁171 註5）。戰事持續三月，至11月12日華界全部為日軍佔領，但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仍受西方各國「中立」立場的保護，形成「孤島」。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變後，日本對西方各國宣戰，租界也隨之淪陷。此後將近四年的時間裡，上海全部在日本控制之下，這就是本書歷史背景的大要。

戰時滯居上海的文人中，作者以王統照為「消極」（passivity）的典型。王統照參加過五四運動，其後寫詩也寫小說，戰前一年才從青島移居上海。戰事初起時，他沿承五四的自由人文主義傳統，對抗戰的道德意義抱持理想化的觀點；華界淪陷後他避居租界，繼續鼓吹抗戰。作者認為王統照以抗戰為中國「精神再生」契機的思想，可以稱為「抗戰啓蒙」（resistance enlightenment）。但王統照的「抗戰啓蒙」強調個人的道德自主性，與戰時上海抗日文化人的集體主義傾向格格不入；另一方面，地下抗日鬥爭的「以暴止暴」也使他失望。不久租界淪陷，王統照遂退出政治及文化活動，僅在開明書店作一掛名編輯，隱姓埋名，「蝸居」到抗戰結束。

「抗日」（resistance）的代表則是李健吾。李健吾是山西革命烈士李歧山之子，自20年代起即醉心戲劇，但戰前所寫的話劇劇本大半均未搬上舞台。從「八一三」到上海淪陷的這段時間，他參加旨在鼓舞民心士氣的「抗戰劇」的演出，深受啓發；華界淪陷後，他便在租界中繼續編寫宣傳抗戰的話劇，作為一種「精神上的反抗」（spiritual rebellion）。當時大部份的「抗戰劇」為了迴避租界當局的干涉，紛紛從中國歷史裡找題材，以古喻今；而堅持五四以來自由人文主義的李健吾，卻對這些歷史劇中提倡的「忠臣烈女」觀念難以苟同，故漸感失意。直到租界淪陷，他才活躍起來，編、導、演了許多譯自西方的話劇，成為上海戲劇界的領導人物。這些話劇多暗含抗日訊息，李健吾也因此於1945年被日軍逮捕，但他受刑不屈，終於獲釋。

作者所描寫的最後一類淪陷區知識分子，是為《古今》半月刊撰稿的「通敵」(collaboration)文人。《古今》創辦於1942年3月，發行人是朱樸，實際負責編務的則是周黎庵和陶亢德。這些人都支持汪精衛的「和平運動」，朱樸尤其與汪政權的首腦人物周佛海關係密切。不過作者指出，《古今》派的文人並非都有明確的政治立場，當時上海已全部淪陷，許多文化人或為了謀生、或懼於日軍淫威，或貪圖一時名氣，為這個受到汪政權支持的刊物撰稿，但他們絕少在文章中為日本或汪政權作宣傳。《古今》上的小品文，充滿了作者稱為「遺民」(anachronism)心態的傷感、懷舊氣息，他們自比為苟全性命於亂世的「遺老」、「遺少」，藉回憶前朝往事的方式排遣心中的苦悶與愧疚。

作者對這三種上海文人的分析相當透徹。他不但對這些作家的作品進行細緻的解讀，而且參考大量回憶錄及檔案資料（並訪問當年的抗日文人柯靈），對這些作家所身處的歷史環境，作了頗為完整的介紹。所以本書各章雖以人物傳記為主軸，卻也附帶描述了淪陷時期上海的某一側面。如第一章介紹新聞和出版界，第二章介紹話劇運動，第三章介紹經濟生活等，故本書篇幅儘管不大，內容倒頗豐富；既是思想史，又是社會文化史。

但本書也有若干值得商榷之處。最主要的一點，是書中所選的三個人物，不能完全表現作者作歸納出的三種行爲：消極、抗日、通敵。王統照在隱匿之前，也曾提倡抗日；李健吾在「孤島」時期也曾一度消極，而且後來在舞台上抗日，仍帶有營利色彩；《古今》派既未替日汪宣傳，通敵的程度便很有限，而他們以魏晉名士自況，實在也有消極的意味。更進一步分析，王統照若非得到開明書店的津貼，難保不會在《古今》之類的刊物上賣文餬口；《古今》派的文載道若非不幸被捕，為了保護妻子而在獄中妥協，可能始終堅持抗日；李健吾雖曾因為不滿劇團老闆勾結日汪而辭職，但終有其他劇團可賴以謀生，而且後來一旦被捕，出獄後便如驚弓之鳥，匆匆離開上海。如此看來，三人都是在無可奈何中求生存，最後置身於不同的政治立場，亦非出於明確的政治抉擇，多半還與各人的機遇有關。

作者在引言中承認，書中所列的三種模式只是理想化的典型，不一定反映複雜的歷史現實；其所舉的實例，常屬於模稜兩可的「灰色地帶」。話雖如此，如果實例與典型之間距離太大，難免使人懷疑典型的

適用性。

從另一方面看，本書對戰時上海文人的政治意識與理念，又似乎解釋得不夠。為何有些人堅持抗日？作者僅指出抗日的動機「是一複雜問題」（頁189 註41），未作深論，但在淪陷區內抗日，必須付出相當大的代價，其心理實在值得探討。同理，《古今》派在鐵蹄下委曲求生，本來無可厚非，為何竟有那樣深的「罪惡感」（作者語）？難道他們認為自己都該當烈士？此處所反映的，或係民國時代知識分子對政治忠誠和對個人與國家分際的特殊理解——亦即作者一再強調的「公共道德」（public morality）觀。這種「公共道德」觀的內容究竟如何？其中儒家傳統與五四新文化的影響孰重？作者於此未能充分注意，甚是可惜。

此外本書尚有一些小疵，如附註中所引的若干期刊未列入參考書目、正文中提到的許多人名（包括李健吾在內）不見於中英名詞對照表、汪精衛的南京政權誤譯為Reformed Nationalist Government（此一般指「維新政府」），以及在談京戲時將麒麟童與周信芳誤認為二人（頁191 註61）等，但這些細節均不影響全書的價值。

總之，本書為抗戰史的研究指引了一個新方向，將吾人的眼光從政府、政黨和政策轉移到受政治環境所支配的個人，並藉此反映了淪陷區的實況，值得治中國近代史者的重視。

□St. Michael's College 歷史系·王克文□

幼幼：傳統中國的襁褓之道。熊秉真，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5年，200頁。

《幼幼》是一本可讀性很高的書，書中所描述的我國傳統嬰幼兒照顧內容既詳盡且豐富，證諸當代西方生物醫學，許多作法不但正確無誤，而且在乳養與哺育方面其詳實細緻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作者是史學家，而我不是學史的，因此無法在史學的基礎上批評。我自己的背景是醫療社會學，在進入社會學之前有兒科相關的臨床及教學經驗，所以我僅就個人的背景角度提出意見，以就教於識者。

除了介紹我國傳統的「幼幼」之道，本書還企圖「利用我國傳統幼科醫籍及其中的案例，嘗試整理出過去千年以來中國兒科醫學的發展以

及育嬰方式的演變」(頁2)。自幼科的發展而言，作者發現「明代中國在幼科醫學上的成就，承先緒而啓後學，無論在專業化或普及化方面都斐然有成。在醫學知識的鑽研，和臨床醫技的發展上，亦有具體進步」。「不同於以往一般研究中國科學史者的看法：中國科學的黃金時代是唐宋，而後則呈現停滯及衰微。至少就本書中的中國幼科學而言，我國醫學(科學的一支)是進步的，而不是停滯的」(頁21)。科學及科學發展的辯論無論中外存在已久，究竟科學的進展是如培根(F. Bacon)所說的累進的(Chalmers 1988)?還是像孔恩(T. Kuhn 1962)認為是革命的?「科學社群」的活動(如專業化)是否理性科學?醫技(科技)的發展是否等於科學發展?甚至中國為什麼沒有發生科學革命等等，都經過熱烈辯論。在此本書提供了一個新的領域——中醫幼科。作者認為我國社會由於「傳嗣」觀念，以至傳統幼科「發軔於宋代，蓬勃於近世」(頁177)，因而其發展的軌跡不同於我國醫學及科學的其他方面。同時作者亦利用南方與北方醫學理論的變異、儒醫理論派別與「傳醫」臨診實用醫學的差別、以及「蒸變說」的議論紛紛等，顯示中醫不是「一灘死水，亦有辯疑與變化之動力」(頁4)。科學家間的對話與討論波普(K. Popper 1959)認為是科學發展的最重要的依據。個人以為史家發掘出昔時的爭辯對話的確令人振奮，但是若依照本書的線索來重畫我國科學發展的軌跡則還嫌不足。如果作者將本書的發現做為起點，繼續努力，我想未來的豐碩成果將是可以預期的。

將中國幼科科學的發展與我國社會「重子嗣」、「孝道」、「傳嗣」等觀念相連(頁23)，是企圖以社會價值解釋中國醫學。「在文化的畫布上勾勒出醫學發展的藍圖」是醫學史大師Sigerist(1965)的理想，也唯有與文化相連，醫學才有意義。個人以為本書有這樣的企圖，對這樣的工作也有貢獻。醫學是文化的一部分，是人類為解決生老病死的痛苦才發展出來的對應方式，要想瞭解醫學知識與其文化背景間的關係，傅珂(M. Foucault)的作法值得吾人參考，傅珂(1973)在「診所的誕生」中引入語言及觀念系統的歷史研究。他研究醫院、精神病療養院、分析醫學、精神醫學中用來表達概念思考及討論方式的「論述」(discourse)之形成過程，設法找出觀念的歷史根源(Cuff, Sharrock & Francis 1990:132)。

在區域性方面，本書闡明中國醫學不是單一的，中國幅員廣大，醫

學在空間及地理上有差異不難想像。本書作者不但試圖將幼科的發展與中醫的發展相連，並企圖以南方醫學理論解釋中西醫學的衝突（頁51）。依據作者的說法：南方醫學重本草與溫補養陰之道，反對機械性的生理、病理理論，尤其鄙夷外科。北方醫學較陽剛，強調機械性的「攻下」政策（頁39）。西醫東漸首先接觸的是南方醫派，其格格不入可想而知。中西醫學對立之原因誠然不止一端，但是作者如此的解釋仍頗具意味。

第四章討論新生兒照顧之演進，其中臍帶處理、呼吸道的清潔、保溫及急救方面的演進，讀來引人入勝。四、五兩章的嬰幼兒照顧部分，是與西方生物醫學最接近的部分。人類新生兒出生之時所面臨的困難是相同的，照顧的需求也同樣是殷切的，可能因而發展出相同的新生兒照顧。這樣的類同基本緣於實用的臨診醫學。據此作者判定「傳統中國的醫療文化，並非一味偏執於陰陽五行之理論，也有其務實的一面」（頁177）。

其實所有的醫療均包含有宗教、經驗及科學成分，不同的是各種成分所佔比例的多寡不等而已。中醫很早即脫離宗教及巫術，其發展主要依賴經驗，而經驗也是實證及經驗科學的基礎。

將醫學回歸到現實生活以後，可以解決許多事情，譬如中西醫學之間的問題。作者亦有如此的企圖，她要「與探究西方科學史者共同思索中西醫學孕生之文化歷史與生物環境雙方面背景之異、與價值之同」（頁51）。

中西醫學在理論層次幾乎無法對話，但在實用層面有時卻幾乎相同。比方如果我們對照讀一本西方兒科醫學發展的書，在摸索發現斷臍方法與臍風之間的關係，以及找尋正確可靠的斷臍方式上，相信一定也會讀到與本書相類似的曲折故事。

中西醫學除了因思考架構不同而致綜合歸納成的醫學理論不同之外，醫療專業也往往爲了遂行其專業化的目的而將醫學知識神秘化（Liu 1983:10）。在剝除了中西醫學各自神秘的面紗之後，兩者之間的對話才可以發生，也才可以談中西醫學的融合問題。

在中西幼科發展之比較方面，作者認爲：十九世紀以前西方相關書籍，未嘗多留心幼兒衛生保健，更未嘗對新生兒照顧作專門討論。「西方接生多由產婆爲之，產科醫籍中對新生兒的討論相當粗略，相形之下



傳統中國醫界在新生兒照顧方面所花的心血與獲致的成果，確實相當突出」(頁99)。對十九世紀以前的西方幼科書籍個人沒有涉獵無法置評，至於傳統中國社會到底有多少人由中醫(多為男性)接生，我也不敢確實回答，但是傳統社會由於兩性接觸的禁忌，我想產婆接生的情況可能不下於西方。Dunn也說過傳統中國的助產專業相當發達(1976:146)。

新生兒照顧的發展與我國人口發展之間的關係，作者非常關心。本書曾經三度提到「新生兒照顧的進步及知識的普及，特別對臍風的認知及新生兒斷臍及事後的臍帶護理，對近代中國人口成長的影響可能相當重大」(頁3)；「臍風見解上的突破，和斷臍、護理技術上的改善，即可能意味成千上萬新生兒性命的拯救」(頁99)；「育嬰的知識……最終結果，則均反映於中國人口長期的變化上」(頁178)。作者認為我國幼科的成就與人口成長之間的關係迄今尚未受到研究者的重視，不過我想在人口的登記不詳實、影響人口的變數太多……的情況下，欲將人口與某項醫學知識或技術上的突破之間的關係整理出頭緒，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第五章的乳養與哺育，其內容比今日西醫兒科的教本還要詳實細膩。不知與中國發達的飲食文化之間有沒有關係？是一個值得思考的有趣課題。

第四、五章筆者以為可以作為醫學院教學的參考書。目前的醫學教育非常呆板，完全忽視學生邏輯思考及自我學習能力的培養，幾乎可以說是醫匠訓練。自歷史中學習我國醫學前驅走過的道路，不但可以增加學習的興味、啟發思考，也可以培養謙虛，畢竟我們只是知識洪流中的一部分，不是最聰明的也不是發展的頂點。同時如果我們希望進步，那麼「我們如何得知」比「我們知道什麼」要重要的多。

五十年代以後西方生物醫學由於囿於機械理論及細菌學說，對當前社會的諸多重大傷亡疾病不但束手無策，而且由於「社會醫療化」的結果，造成社會及個人的許多傷害。未來社會的保健發展趨勢，已經不再堅持純科學的道路，對傳統及替代醫學中的經驗及智慧也不再全面反對。醫學回歸到文化的層面以後，也許才能真正解決我們生老病死的痛苦。再者目前由於醫療組織大型化及制度化的結果，醫療更形非人性化，醫病關係更加支離破碎，西式教育下的醫生根本不瞭解病人怎麼想，病人也聽不懂醫生說的話。筆者認為本書不只可供醫者參考，用以擬訂更人性化、更合乎民情的兒科照顧，最終對醫生及病人間的溝通及

醫病關係的增進應當也會有貢獻。

第六、七章的嬰幼兒生理及成長發展是中醫比較弱的一環，尤其在解釋方面。但是同樣的生理發展，為什麼中西醫觀察歸納的結果會形成如此不同的理論？此類理論發展的過程機轉如何？其與東西方不同的思考方式、文化背景是否有關？順著如此的思路推敲下去，也許會有新的重大發現，未來說不定還能作為中西文化其他方面思考的借鏡。

身為一個史學家，作者的最大企圖自然還是：「在醫理及醫案中窺探當時的生活、自醫書裡窺探古史裡的社會」。見微知著是史家的看家本領，史料的有限性也使得史家不得不大膽推論，但是依賴史料解釋當時的社會恐怕有相當大的困難，正如作者所言：「醫學發展與大眾醫療行為之間存在著一種相當複雜的（互動）關係（頁21）。歷史上的醫學的進步與民眾健康改善是相關而不互等的兩個現象」。醫籍的進步不保證民眾一定得到好的醫療，好的醫療也不代表民眾就能享有健康。即或如此，本書依然為我們開了一扇窗，讓我們得以一窺窗內的世界。又作者在引言中曾表明企圖透過「醫案」，去認識過去民間照顧嬰幼兒的實況（頁2），醫案雖然可能仍屬少數人的生活，但是可以有更接近現實的描述，可惜本書對醫案的討論較少。

另外本人還有一些小小的不同意見，譬如本人認為「兒童與成人不同的觀念」指「兒童不是具體而微的成人」，「兒童與成人不同」觀念的出現，如同近代女性主義下「女人的身體與生理與男人不同」、「女人不是男人加上什麼或減去甚麼」的觀念一般新穎。所以才會在兒科上引起重大的震撼。（頁5）

醫學研究本應是科技整合的工作，作者的目的也「旨在與其他有興趣於發覺醫學史或文化史本身軌跡的人，一同尋思醫學流派的發展過程」（頁次51）。在本書中我們看到，因為作者是史學家，研究醫學沒有包袱，所以本書的許多發現不但清新可喜而且屢見新猷。作者自己也一再為新發現歡喜，我想本書的寫作不但是有意義的工作，而且對作者個人而言也是愉快的工作。由此可見科技整合無論對學術的貢獻，或對研究者個人的學術好奇心及成就滿足方面，均有好處。至於不同領域的對談，即使雞同鴨講，也比各自閉門造車好，筆者個人欣見本書的出現，同時希望在不久的將來能看見作者更多更好的作品，也希望看到不同領域的合作研究出現。

## References

1. Chalmers A. F. (1988) *What is the Thing Called Science?*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2. Cuff E.C., Sharrock W.W. & Francis D.W. (1990) , *Perspectives in Sociology*, Unwin Hyman: London
3. Dunn, Fred L. (1976) *Traditional Asian Medicine & Cosmopolitan Medicine as Adaptive System in Leslie, Charles (ed.) Asian Medical System: A comparative study*, California University: Berkeley
4. Foucault M.(1973) *The Birth of the Clinic : An Archaeology of Medical Perception*, Tavistock: London
5. Liu C.T. (198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edical Profession and the Modern State is essentially symbiotic*, in *Essays in Medical Sociology*, Wenjing: Taipei
6. Kuhn T. S. (1962)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7. Popper K. R. (1959)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London

## 中文參考資料

1. Sigerist H. S. (1965) 《人與醫學》，文星：台北

□國防醫學院人文及社會科學科·劉仲冬□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檔案調查報告

#### (1) 台灣所藏中華民國經濟檔案

林滿紅主編

本書分由統計及文獻方面，調查報告台灣所藏中華民國經濟檔案的形成背景與重要內容。統計部份述及1949年前後的統計制度及統計資料。文獻部份包括政府行政機構及民意機構的檔案，也有民間及其它檔案。

除了檔案調查報告之外，本書也說明檔案應用所涉及的公文體例問題，並以實例說明如何利用散布在不同地點的檔案，由中華民國某個時點的經濟問題切入，探討其政治、社會、文化意涵。由於是以整體的角度進行調查，本書除可供經濟史學者參用之外，也可為一般歷史學者及政治、社會、企管、法律等社會科學家之研究指南。

## 大事紀要

# 近代中國史研究大事紀要

(1994年5月～1995年9月)

陳南之\*輯

(1994) 5.20 由上海中山學社主辦的「孫中山與海外華人國際學術研討會」在上海舉行，會期四天，40位中外學者出席會議。會中就孫中山與海外華僑；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海外華人在經濟、政治、教科文方面的發展；全球華人如何迎接亞太世紀的來臨等三大議題進行討論。

10.26 浙江省蕭山市政協於蕭山市舉行「湯壽潛學術討論會」，與會代表50餘人，提交論文40篇，此乃有關湯壽潛的第一次全國性學術討論會，會議圍繞湯壽潛的思想、活動及其性格等主題展開討論。

12.2 「洋務運動史國際學術討論會」在福州經濟技術開發區的馬江大廈召開，由福建社會科學院主辦，福建師範大學歷史系、福州市社科所等單位協辦，會期三天。此次會議討論重點在洋務運動的社會、經濟、文化環境，並兼及洋務運動的成效，及其在福建的成敗等議題，與會學者整體上肯定洋務運動。

12.19 世界海外華人研究學會籌辦之「五十年海外華人比較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暨世界海外華人研究學會第一屆會員大會」，於香港大學舉行。來自19個國家和地區的代表180餘人出席會議，其中大陸學者約佔三分之一，發表論文130餘篇，會期三天。與會代表就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華人經濟活動的變遷、移民模式、在居住國的參政、泛文化與民族性、家庭結構與性別問題等五個專題分組進行討論。

12.20 廣東省社科聯主辦「紀念丘逢甲誕辰130周年學術研討會」，

---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臨時助理

於廣東梅州市召開，會議就丘逢甲抗日護台的愛國行爲、教育思想、古詩詞特色等問題進行深入研討，會期三天。

(1995) 1.5 中國社會科學院與誠成企業集團聯合主辦「中國國際漢學研討會」，在海口市舉行，會期五天，中外與會學者80餘人，提交論文近70篇。會議主題爲：一、中國文明的起源、形成和發展；二、中國傳統學術與思想文化的專題研究；三、國際漢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代表們並分「歷史與考古」、「思想與文化」兩組演講和討論。

3-4月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主辦尋根系列專題演講，主講者、講題及日期如下：(1)簡榮聰：〈開放大陸探親以來海峽兩岸譜牒文獻之概觀〉(3.30)；(2)洪敏麟：〈編輯族譜經驗談〉(3.31)；(3)林瑤琪：〈從族譜探討台灣移民史對本土文化關係〉(4.6)；(4)楊緒賢：〈姓氏與堂號源流〉(4.7)。

4.4 美國亞洲學會第四十七屆年會於華盛頓舉行，會期五天。

4.21 「五十年來台灣的歷史學研究之回顧研討會」，東海大學歷史系、新史學雜誌社主辦，會期三天，發表論文17篇，與中國近代史相關之議題如下：(1)李紀祥：〈五十年來台灣地區《史通》研究之回顧〉；(2)王明珂：〈誰的歷史——五十年來在台出版的自傳、當代人物傳記與口述歷史〉；(3)丘爲君：〈戰後台灣學界對經世問題的探討與反省〉；(4)林崇熙、傅大爲：〈關於台灣「科學史」研究的一些回顧與檢討〉；(5)戴寶村：〈戰後初期的台灣史研究學者與其著作之分析〉；(6)詹素娟：〈族群歷史研究的「常」與「變」：以台灣平埔族群研究爲中心的討論〉；(7)林富士：〈台灣地區的「道教研究」概述(1945-1995)〉；(8)李貞德：〈超越父系家族的藩籬——台灣地區「中國婦女史研究」(1945-1995)〉；(9)吳智和：〈五十年台灣明史研究之回顧〉；(10)賴福順：〈五十年台灣清史研究之我見〉；(11)黃一農：〈明末清初天主教傳華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12)周惠民：〈台灣對德國史學之認識〉。

4.22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國史館、國立故宮博物院、中國歷史學會假國立政治大學公企中心聯合舉辦「黃季陸先生行誼事功討論會」，四位報告人及講題分別爲：(1)李雲漢：〈黃季陸先生與中國革命〉；(2)遲景德：〈黃季陸先生與民國史研究〉；(3)胡春惠：〈黃季陸先生在教育上的認知與事功〉；(4)孫子和：〈黃季陸先生的政治理念——中山思想的傳揚者與實行者〉。

4.29 「南台灣文化發展與變遷」學術研討會，由國立成功大學歷史

系所主辦，會期二天，發表論文14篇。報告人及題目分述於後：(1)傅朝卿：〈歷史性都市環境、歷史性地標與都市意象之變遷——以台南市為例〉；(2)陳坤宏：〈客家農村聚落之空間結構分析——以屏東縣內埔鄉內埔村為例〉；(3)蕭百興：〈清中葉(嘉慶、道光、咸豐年間)台灣「府城」空間變遷的論述——「台灣府」作為「內地意識」萌芽下經濟富厚的文治中心〉；(4)鄭兒玉：〈行民主制度開路先鋒之長老教會〉；(5)林美容：〈從南部地區的「巖仔」來看台灣的民間佛教〉；(6)陳梅卿：〈伊江朝貞與其在台之傳教事業〉；(7)陳信雄：〈澎湖歷史的分期與特色〉；(8)許雪姬：〈唐傳宗與鼎盛時期的唐榮鐵工廠〉；(9)梁華璜：〈明治時期的天皇體制與乙未侵台——北白川能久之死〉；(10)胡紅波：〈由民間文學觀點看《思想起》的演化〉；(11)趙美貞：〈1945年後台南地方報業的發展與變遷——以《中華日報》為例〉；(12)葉寄民：〈日據時代的「外地文學」論考〉；(13)戴文鋒：〈海關醫報與清末台灣開港地區的疾病〉；(14)謝國興：〈鹿耳門的媽祖信仰與正統之爭〉。

4月 中國復旦大學韓國研究中心和韓國韓民族運動史研究會主辦「韓國獨立運動」國際學術討論會在復旦大學舉行，來自韓國、日本、大陸及台灣的學者50餘人出席，宣讀論文30篇。與會論文內容大致可分為韓國獨立運動與中國的關係、韓國臨時政府在韓國獨立運動中的歷史作用及韓國獨立運動的史料研究三部份。經由此次會議交流，將可拓展韓國獨立運動史新的研究領域，對填補近代中韓關係史的空白亦有助益。

5.4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主辦「第一屆全國歷史學學術討論會」，主題為世變、群體與個人，會期三天，共發表論文23篇，與中國近代史相關者如下：(1)黃俊傑：〈當代歷史變局下的儒家詮釋學——徐復觀對古典儒學的新解釋〉；(2)黃一農：〈明末中西文化衝突初探：以天主教徒王徵娶妾和殉國為例〉；(3)徐光台：〈明末清初西方「格致學」的衝擊與反應：以熊明遇《格致草》為例〉；(4)李朝津：〈梁啟超的民族主義——由群體改向民族〉；(5)王業鍵：〈通貨緊縮與太平天國革命〉；(6)李達嘉：〈晚清商人的民族意識〉。

5.12 淡江大學歷史系主辦，國史館、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等單位協辦之「台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社會、經濟與墾拓」，假淡江大學舉行。會中宣讀論文20篇，報告人及題目分述於後：(1)莊吉發：〈清代閩粵地區的人口流動與台灣的社會衝突〉；(2)布羅夫：〈俄羅斯學者對台

灣歷史的研究)；(3)葉振輝：〈二十世紀前半的台灣經濟〉；(4)羅漁：〈天主教傳入台灣的歷程〉；(5)查時傑：〈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的一個家族——以屏東吳葛家族之發展為例〉；(6)蔡相輝：〈日據時期的北港朝天宮〉；(7)陳學文：〈明清時期台灣蔗糖業的發展〉；(8)卓克華：〈嘉義市城隍廟的史蹟研究〉；(9)楊仁江：〈赫德與台灣燈塔〉；(10)M. Rubinstein：〈Statement Formation and Institutional Conflict in Mazu Cult: Temples, Temple-created Media and Temple Rivalry in Contemporary Taiwan.〉；(11)陳清香：〈台灣寺廟十八羅漢像探討〉；(12)鄭志明：〈盧勝彥與靈仙真佛宗〉；(13)鄭梓：〈「光復元年」台灣社會圖像之一——以《台灣新生報》、台灣廣播電台、台灣電影攝製場為中心之探討〉；(14)費世文：〈進退兩難之境：光復初期台灣菁英之心態與地方自治〉；(15)B. Brooks：〈Taiwan in Japanese Empire: American View〉；(16)簡筌簧：〈日據初期台灣北部抗日硬漢——簡大獅〉；(17)蔡錦堂：〈皇民化運動前台灣社會教化運動的展開——1931~1937〉；(18)石萬壽：〈南化鄉溪東庄的興廢〉；(19)M. Rubinstein：〈The State of Taiwan Studies in United States: An Overview〉；(20)周獻華：〈施琅與台灣〉。

5.23 「漢人宗教研究的回顧與前瞻」小型研討會，由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文化組主辦，發表論文4篇，報告人及題目分別為：(1)王見川：〈漢人民間教派研究的回顧：以鸞堂為例〉；(2)祖連輝：〈日據時期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的研究〉；(3)張珣：〈光復後台灣人類學漢人宗教研究之回顧〉；(4)謝世忠：〈漢人民間信仰的本質理論：英文論述中的幾個主要模型〉。

5.25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主辦「家族與台灣地方發展」學術研討會，會期二天，發表論文8篇，報告人及題目如下：(1)林舟：〈Family Factories in Taiwan—The Use and Abuse of the Family Metaphor〉；(2)黃卓權：〈曲栗埔尾黃家在政權變動期的肆應與影響〉；(3)吳學明：〈清代一個務實拓墾家族的研究——以新竹姜朝鳳家族為例〉；(4)黃朝進：〈「銀牛相觸角」——從鄭、林兩家互控案看清代竹塹的家族與社會〉；(5)黃富三：〈官紳關係與地方發展——板橋林家與清代北台山區的發展〉；(6)蔡采秀：〈板橋的家族與地方都市發展——板橋林家和海山劉家的比較〉；(7)劉素芬：〈十九世紀台灣中部商品化農業經營——以龍井林家為例〉；(8)陳志榮：〈五股陳家與北部基督長老教會的發展〉。

5.26 東海大學社會系、國科會人文處社會組合辦「台灣社會學研究的回顧與前瞻」國科會專題計劃成果研討會，發表論文18篇及二場專題演講，分就網絡與階層、社會主義之轉型、宗教、貧窮、性別、人口、文化、原住民等議題進行討論。會期二天。

6.1 中央研究院中美人文及社會科學委員會、美國學術團體總會及社會科學研究總會贊助，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中國研究中心主辦的“Becoming Chinese: Passages to Modernity and Beyond, 1900-1950”國際學術會議，會期四天，發表論文9篇。（詳見本期「學術會議」）

6.11 「歷史學學門現況與發展研討會」，由國科會人文社會科學處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聯合主辦，會中以歷史學學門人力資源現況簡介及一般史、外國史、近代史、台灣史等領域之研究現況與展望為主題展開交流、討論。

7.3 「十九、二十世紀之福建與台灣——交往與對照」(Fukien and Taiwan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Contacts and Contrasts)研討會，於荷蘭萊頓大學召開，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主任黃富三應邀發表論文：〈林維源與劉銘傳之開山撫番政策——清季台灣官紳合作模式之研究〉。

7.14 由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贊助、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持之「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計畫，舉辦學術座談會，宣讀11篇論文。部份論文收錄在《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三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輯出版，1995年8月）。

7.28 廈門大學主辦「台灣史學術研討會」，於江西廬山舉行，會期五天。

8.9 「西藏檔案國際研討會」於拉薩舉行，由大陸國家檔案局主辦，會期三天。

8.12 「傳統社會與當代中國社會史」學術研討會於河北省戴河舉行，該會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主辦，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贊助，會期三天，與會學者60餘人，發表論文30餘篇。（詳見本期「學術會議」）

8.15 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主辦「台灣近百年史研討會（1895-1995）」假中央圖書館國際會議廳舉行。發表論文26篇。

8.18 「抗戰勝利五十週年國際研討會」於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舉行，二十世紀中華史學會、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海外華文作家筆會、哥倫比



亞大學東亞研究所等單位主辦，會期二天，發表論文43篇。出席學者分就政治；國際關係與外交；文化與教育；社會與經濟；軍事；戰爭罪行；抗戰文學；情報、醫療與作戰；華僑與抗戰等多項議題進行討論。

9.1 中國近代史學會、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主辦，政大歷史系、政大東亞所等單位協辦、贊助之「慶祝抗戰勝利五十週年兩岸學術研討會」假中央研究院學術活動中心舉行，會期三天，宣讀論文59篇。（詳見本期「學術會議」）

9.3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與中國社會科學院聯合舉辦「紀念抗日戰爭勝利50周年學術討論會」，以抗日戰爭的勝利與中華民族的振興為主題，進行討論，會期五天。

9.6 「魯汶大學南懷仁基金會第五屆國際會議」，由比利時魯汶大學南懷仁基金會主辦，會期四天，共宣讀32篇論文。本屆會議主題為「低地國與中國關係史」。

9.13 「歐洲思想與二十世紀初年中國的菁英文化」學術討論會在法國Garchy舉行，會期四天，共有來自台灣、中國、日本、德國、法國、瑞典24名學者與會並宣讀論文。

### ※ 編 後 語 ※

本期通訊新闢「問題與討論」欄，主要是針對中國近代史學術議題而設，除了陳永明先生撰文介紹北美中國社會史學界有關「公共空間」與「公民社會」的辯論、郭文華先生就民初中美科技交流的兩種詮釋加以析論之外，本刊在近史所同仁熱心襄助下，特於八月下旬就黃宗智先生這幾年在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方面所提出的若干看法及方法學上的一些問題，作了綜合性的討論與評述。這是本所第二次嘗試以座談會方式帶動學術討論的風氣，顯而易見，形式方面仍嫌不夠周延，探討問題的角度應該還可以更為寬廣。今後，我們希望透過各方學者的積極參與，能使《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成爲一個名副其實大家交換訊息、切磋學問的園地。

在此，我們感謝本期作者惠賜稿件，也特別要向負責處理全書電腦編排的陳南之小姐以及協助文字校對的同仁們深致謝忱。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二十四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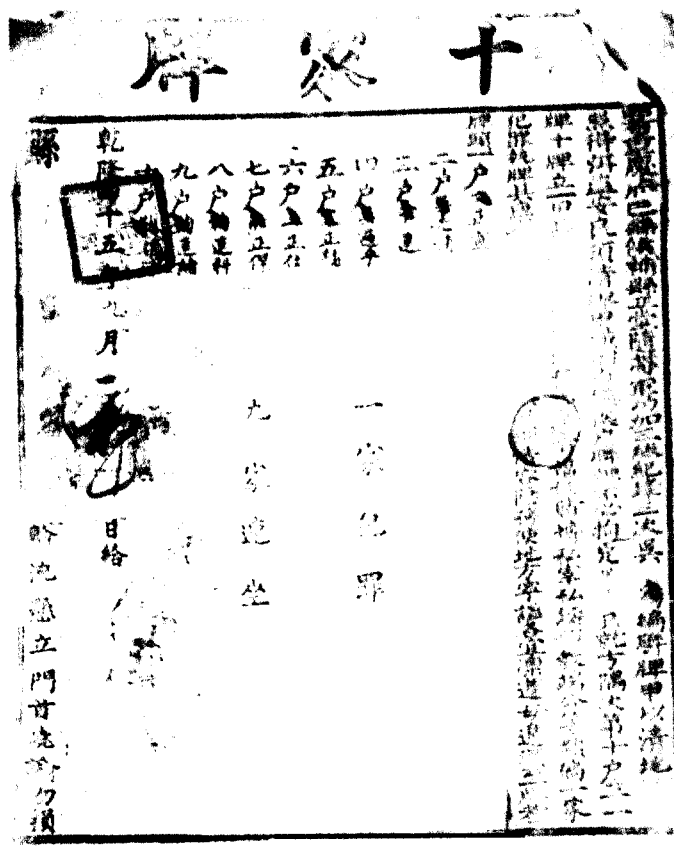
民國八十四年六月出版，上下兩冊      精裝1300元   平裝1200元

- 陸寶千：馬浮之易學——儒學新體系之基礎
- 黃克武：嚴復對約翰彌爾自由思想的認識：以嚴譯《群己權界論》（*On Liberty*）為中心之分析
- 程一凡：經世家顧炎武的史學精神
- 魏秀梅：清代之鄉試考官
- 王爾敏：王韜生活的一面——風流至性
- 熊秉真：疝——中國近世兒童的疾病與健康研究之二
- 楊翠華：任鴻雋與中國近代的科學思想與事業
- 張啓雄：民初中俄蒙恰克圖會議的名分論爭與交涉——外蒙國號帝號年號及政府名義的改廢
- 黃福慶：九一八事變後滿鐵調查機關的組織體系（1932-1943）
- 張淑雅：金馬撤軍？——美國應付第一次台海危機策略之二
- 賴惠敏：清代皇族的經濟生活
- 王樹槐：江蘇省第一家民營電氣事業——鎮江大照電氣公司，1904-1937
- 唐啓華：北洋政府時期海關總稅務司安格聯之初步研究
- 李宇平：一九三〇年代中國城鄉問題的思想淵源——所得全面低減說與所得分配不均說的爭議
- 林滿紅：台灣與東北間的貿易（1932-1941）
- 陳慈玉：戰時日本對華北煤礦的統制（1937-1945）——以太原集團和膠濟集團為例
- 張瑞德：抗戰時期國軍的參謀人員
- 李恩涵：日軍在山東的「掃蕩戰」與「三光作戰」（1937-1945）
- 羅久蓉：歷史情境與抗戰時期「漢奸」的形成——以一九四一年鄭州維持會為主要案例的探討

函購九折，郵撥帳號1034172-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帳戶



▲ 培育中國近代史人材不遺餘力的野澤 豐教授



▲ 民國時期的木牌檔案 (四川省檔案館藏)

## 本期要目

慶祝抗戰勝利五十週年兩岸學術研討會

「求變求新的中國——二十世紀前半期的歷史經驗」學術討論會

學人簡介——野澤 豐

引進·借鑒·變化——8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近現代史學鳥瞰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現藏國軍檔案概況

〈林獻堂先生日記〉的史料價值

「公共空間」及「公民社會」——北美中國社會史的辯論

典範的危機與危機的典範：黃宗智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的綜合評述

新書評介五本——

楊珍著：《康熙皇帝一家》

Chae-Jin Lee: *Zhou Enlai: The Early Years*

呂芳上著：《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

Poshek Fu: *Passivity, Re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  
Intellectual Choices in Occupied Shanghai, 1937-1945*

熊秉真著：《幼幼：傳統中國的襁褓之道》

